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论文集

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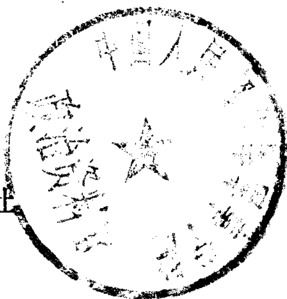
福建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论文集

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福州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论文集
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8.5印张 2插页 203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50
书号：2173·21　　定价：0.85元

前　言

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二大”精神，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形势下，我们迎来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日。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强大无比的生命力。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所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已经不仅仅是人类的美好的理想，而且已经在一些国家并将在愈来愈多的国家中成为现实。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领导广大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得来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毛泽东思想。而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这个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

中国革命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在我党的历史上，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发生过两次历史性的转变，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另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过十年内乱，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经历一次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几次历史转变的经验充分表明，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但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作为理论基础的。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活的灵魂，也是我党制定历次正确路线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哲学思想十分丰富，毛泽东同志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各个方面，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是人所共知的。还必须指出，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是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中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因此，它是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哲学的这个特点和优点，是需要我们很好地学习和研究的。

近几年来，我省哲学界在开展学习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值此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汇集出版这一本论文集，一方面作为对马克思的纪念，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次检查与总结。

今天，我们在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斗争中，特别需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而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我们要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是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在这个学习和研究中，逐步学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更好地为完成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明祖凡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目　　录

前言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党的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林振坤（ 1 ）
毛泽东同志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林仑山（13）
学习毛泽东对国情的分析
——兼论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邹永贤（29）
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贡献………………池超波（47）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逻辑
——毛泽东在实践中运用辩证法的光辉范例………商英伟（66）
学习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体会…………………马　鸣（83）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范例
——从"毛粒子"说起…………………………………林可济（98）
毛泽东关于全面性的哲学思想………………………陈　军（114）
毛泽东同志的波浪式发展观及其实践意义…………陈依元（127）
学习毛泽东关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论述…………姚安泽（136）
坚持主体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学习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体会…………………凌厚锋（151）
学习毛泽东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姚经桃（166）
试论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作方法的思想………………丘一平（182）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思想…………………………………………………翁世盛（199）
毛泽东同志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

的理论……………………………………………………陈金振（217）
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理论………………周勇胜　洪成得（236）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伦理思想
的精华…………………………………………………沈忠俊（251）
后记……………………………………………………………（266）

266/14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党的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

林 振 坤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①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每当党的政治路线正确，革命和建设就顺利发展，反之，就遭受挫折和失败。因此，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乃是决定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胡耀邦同志在建党六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说："六十年来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要有一个能够确立和坚持这条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新制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路线。这几条总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制定这些正确路线的理论基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正确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并取得胜利，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即既要懂得为什么要革命，又要懂得如何进行革命，从而能够提出正确的理论、纲领和战略策略。党的政治路线作为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规定的总任务和总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下略）第278页。

政策，它解决的就是如何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前仆后继，历经了八十年之艰辛，却始终没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人民从俄国人的创举中，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普遍真理，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就在于走俄国人的路。但是，解决中国革命怎样进行的问题，却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党在理论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在组织上同共产国际有隶属关系，在实践上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因此，解决中国革命怎样进行的问题，就同如何对待马列主义理论，如何对待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和指示，如何对待苏联经验有着直接关系。在这“三个对待”中，核心是怎样认识和解决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必须要有马列主义指导，而马列主义一般原理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得出的，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是他们所没有遇到的。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进行革命，靠背诵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就是中国革命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但是，党内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从而产生了在中国革命怎样进行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和不同政治路线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党的杰出领袖，坚持把马列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作为研究中国社会，探索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解决中国革命理论和路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陈独秀、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都是脱离中国

的国情。特别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教条主义者照搬照套共产国际决议和马恩列斯的片言只语，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作了主观主义的分析，企图超越历史阶段，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九一八”事变后，又把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同蒋介石反动统治有矛盾而主张抗日的第三势力（中间势力），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在革命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他们照搬照套苏联的经验，坚持“城市中心论”，不断地组织城市起义，强迫弱小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这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招致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失败，并使白区工作遭到全面的破坏，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因此，不同这种教条主义作斗争并克服它，就不可能真正把马列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正确解决中国革命怎样进行的问题。因而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首要的和根本的问题。

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反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出发点，两种根本不同的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质上就是两条哲学路线的对立和斗争。恩格斯曾强调：“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① 教条主义的要害，就在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原则。尽管他们并不直接反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基本前提，但是，他们却在认识路线和工作路线上，颠倒了物质和意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而陷入了唯心主义。因此，要彻底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就必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11页。

把它提高到哲学上来认识，必须批判这条错误路线，才能解决问题，才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内的这种教条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写的决议中，第一次指出主观主义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他说："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① 一九三〇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一次从哲学上总结了党内路线斗争。他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在于离开实际调查进行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这就进一步从两条哲学路线对立的高度来揭露主观主义的实质，并针对教条主义在"三个对待"上的错误，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主观瞎说和懦夫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必须把上级机关的指示同斗争中的主客观情势结合起来，反对盲目照搬的形式主义。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正确路线和斗争策略，"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他把这些称之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② 这篇光辉著作明确提出把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并把马克思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89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19—25页。

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化为无产阶级政党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包含了后来所概括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认识中国社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科学方法的哲学概括，标志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这说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应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为着解决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核心问题，制定党的路线和策略的需要而产生的。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纠正了教条主义者先冒险后逃跑的机会主义军事路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胜利完成了长征。这个时候，党面临着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要求我们党从指导思想到路线、方针、政策，都要有一个适应新情况的转变。在实现这个转变中，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王明，这个时候又照搬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和指示，犯了类似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说明，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解决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又成为顺利地完成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倡导全党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身体力行，亲自给干部讲哲学，组织学哲学小组。他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总结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中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并进行哲学概括，先后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这些著作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又突出地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知和行，以及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从哲学高度论证了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

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真理，并作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概括，特别是这样三个方面：第一，阐明了认识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认为不仅要研究一般规律，尤其要研究特殊规律，指出主观指导和客观实际是否相符合，这是犯不犯错误的根本界限，揭露了"左"倾和右倾、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认识论根源及其特征，强调指出，把主客观统一起来，这是争取革命和战争胜利的关键。第二，精辟地论述了如何在实践基础上，遵循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运动去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实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并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① 第三，科学地阐明了在事物发展中，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原理，并把辩证法用于认识论，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即"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② 的科学论断以及一套坚持共性个性相联结，具体地分析矛盾特殊性的科学方法。这些重要的概括不仅阐明了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哲学基础，而且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标志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进入成熟阶段。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同志不断地探讨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运用于解决旧中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更好地相结合。一九三八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强调，为了更好地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必须开展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和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三位一体的任务，学会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之具有民族形式、"中国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72、295页。

作风和中国气派”①。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一九四一年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同志把他所阐发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以及根据这些原理所制定的思想路线，正式概括为“实事求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后，通过延安整风这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扫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使这条科学的思想路线为全党所掌握。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就是随着这条思想路线的确立而解决的，这就是党的“七大”所制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运用于解决中国革命的经验的哲学概括，是具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党的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实事求是的核心和出发点，它是我们党最基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客观事物不仅是具有内在规律的发展过程，而且是处在普遍联系中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因此，实事求是地研究事物就必须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从分析事物的内在矛盾及其同周围事物的联系中，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坚持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原则。实事求是强调了人民群众的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要求我们“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②因此，它又是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科学认识路

① 《毛泽东选集》第5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759页。

线。总之，实事求是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认识路线又是工作路线，也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这一思想路线对于解决党的政治路线的意义在于：第一，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正确的政治路线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列主义理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它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它们属于具体领域的理论学说，如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等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制定，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化为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制定正确路线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理的指导下，运用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武器，对旧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阶级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等基本问题，使根据中国的特点应用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有了可能，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实现了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相结合，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路线提供了根本依据。同样，建国初期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路线，也都是实事求是的产物。第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又是正确理解党的政治路线，统一全党认识的基础。世界观的统一是最根本的统一。实事求是既是制定正确路线的理论基础，又是正确理解这些路线的指南。这条思想路线的确立，就为全党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统一全党认识的基础，是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的党的指导思想和总路线上来的可靠保证。第三，实事求是也是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锐利武器。实事求是就是反对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的产物，它不仅要求制定政治路线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且要求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也必须在实践中做到主客观情势相结合，这就为我们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指导，并成为反对歪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倾向的斗争武器。从民主革命的历史看，正是因为有了这条科学的思想路线，并通过延安整风，使这条路线为全党所掌握，才能正确地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达到了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才有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并制定了“七大”的正确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和团结，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

从党的“七大”到党的“八大”的十一年时间，我们党始终坚持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顺利地实现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制定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以“一化三改”为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到一九五六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是我党历史上取得辉煌胜利的十一年，它说明了，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我们就能够通过实践达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制定正确的路线，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党的“八大”总结了“七大”以来的辉煌胜利和宝贵经验，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但是，由于这个时候我们党对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准备不足，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也是不深刻的，因此，“八大”提出的正确路线和许多正确的意见

得不到贯彻。虽然在这个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任务，也写出了《论十大关系》等光辉著作，并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观点和工作方针，但是，就整个说来，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同志由于胜利而不谨慎起来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当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觉这种“左”倾错误之后，曾几次着手纠正，但是，由于思想路线没有端正，结果不仅“左”倾的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恶果。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其根本错误就在于违背了马列主义原理，脱离了中国实际，脱离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轨道。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两年时间里，虽然党和国家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在思想路线上陷入新的教条主义，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因此，从指导思想到路线、方针、政策都继续着“左”倾错误，使工作上出现了徘徊，经济建设上还出现了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洋跃进”。使党和国家摆脱这种“左”倾错误，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首先也是靠端正思想路线，这就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党的十二大胜利完成的又一次伟大的历史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我们党就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文

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影响很深，危害很严重，因此，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就必须对“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在进行这一艰巨工作中，必然要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由于我们党自觉地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一方面敢于对自己的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恰如其分的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又正确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使我们的思想从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下解放出来；并敢于在马列主义原理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三十二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比较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确立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例如，实事求是地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果断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平反了冤假错案，实事求是地解决了一系列历史遗留的问题，创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确定了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特别是抓住农业这一环，实行了各种联产责任制，恢复和扩大了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了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副业和集市贸易等，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村面貌很快发生了显著变化；采取了有力措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进行国家和党的制度改革，等等。正是由于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党的“十二大”所确定的方针任务，都是三中全会以来正确路线的充实和发展，其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切合实际，解决了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十二大”的光辉成就，是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和发扬的实事求是思想

路线的产物。所以，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把“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做为胜利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的主要标志的第一条。他强调指出：“党所以能取得上述许多方面的胜利，归根到底，是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原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的科学原理。……党正是集中了人民的意志，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把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引上康庄大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一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哲学思想则是实现这一结合和制定正确路线的理论基础。在民主革命时期，随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产生和成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才实现了马列主义同中国民主革命实践相结合，并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于我党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也就科学地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但是，在解决马列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和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上，却经历了一个人人记忆犹新的曲折过程。所有这些都说明，什么时候坚持毛泽东哲学思想，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政治路线就会正确；什么时候背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就要出问题，革命和建设就要遭受挫折。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掌握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这样，我们才能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正确的理解，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坚持共产主义方向，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所确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同志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林 仑 山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哲学概括，并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同志所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可以说是这种哲学思想的集中表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第一个基本方面，它不仅仅牵涉到毛泽东思想的个别原理、观点，而是贯穿在整个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是党的思想路线。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起来，……叫实事求是。”胡耀邦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到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文试图从毛泽东同志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意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谈谈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

实事求是就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什么叫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实事’就是客

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在这里，坚持“实事”，就是坚持从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出发，而不是从人们的主观愿望和想象出发，也就是要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不是无视规律或去主观臆造“规律”。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坚持“求是”，就是不停留在客观事物的现象上，而是要去研究和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物质和意识、客观和主观关系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又具有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的特色。

毛泽东同志特别注意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问题，认为这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关键。他认为，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要比较地会办事，要比较地多打胜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②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首先面临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我们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中国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③

是从中国国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始终贯串着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以陈独秀、王明等为代表的一些人则坚持从主观愿望或概念出发的主观主

---

① 《毛泽东选集》第759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63、596页。

义的思想路线。他们或者认为既然现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而革命的领导权只能落在资产阶级手里；或者认为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资产阶级（不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革命的对象。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了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动摇的、不可靠的同盟军；而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可见，政治路线上的分歧，实质是思想路线上的分歧。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既是我们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① 又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②

毛泽东同志不仅强调要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规律出发，而且强调要"求"。就是说，要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并用来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这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问题。我们辩证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一个带根本性的区别，就在于它在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承认了意识对物质的巨大能动作用。毛泽东同志坚持和发展了这一基本观点，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又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否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关系到革命和建设的成败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810、1203页。

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在《矛盾论》中，他进一步明确提出精神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观点。他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②毛泽东同志这些观点，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实事求是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为了做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认为这是区别对待理论的主观主义态度同实事求是态度的一个根本标志。大家知道，一切唯物主义者都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坚持从物质到精神、从客观到主观的认识路线。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由于离开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了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科学实践观引入了认识论，才找到了社会实践这一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唯一途径，和检验主观和客观是否相符合的唯一标准。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66、300—301页。

毛泽东同志以马列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在《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深入地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用实践观点把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这些认识论的重大问题贯串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毛泽东同志强调了实践的决定作用。他发挥了列宁关于“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思想，把实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显著特点之一。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他还正确地解决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问题，认为一方面，实践、直接经验是最重要的，因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而另一方面，人又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但是，在我为间接经验的东西，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①这样他就直接把矛头指向轻视实践、轻视直接经验的教条主义者。

其次，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认识的发展过程。他充分地发挥了列宁关于“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②的思想，明确提出认识的过程由两个阶段构成，即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并对两个阶段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首

① 《毛泽东选集》第26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1页。

先强调理论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他说：“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① 同时强调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因为只有理性认识才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性。他说：“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② 这样就深刻地论述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毛泽东同志还对认识发展的总过程作了概括，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③

毛泽东同志还把认识的辩证过程的原理应用于实际工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他认为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④，只有经过调查，掌握了大量感性材料，才能为我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提供基础。我们不仅要调查，还要研究，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才能达到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可见，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直接体现，搞不搞调查研究，是关系到真实事求是还是假实事求是的问题。

第三，关于真理的标准和真理发展规律问题。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并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重视社会实践的最重要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67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67、273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第18页。

的原因之一。当人们对外界有了认识之后，就必须判明这个认识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真理还是谬误，它应该由什么来检验，这个问题在革命转折关头，在那是非不分、真理和谬误混淆的情况下显得特别重要。实践之所以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因为主观认识本身不能判明自己是否同客观相符合，而客观世界本身也不能告诉我们主观是否同客观相符合，只有社会实践才具有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检验主观是否符合客观的特点，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①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追求真理、进行革命的过程中，还强调要正确处理真理和错误的关系，并且提出了真理和错误的斗争是真理发展的规律。他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②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强调真理发展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强调要正确对待错误，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一样，错误也具有两重性，只要我们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外界的规律性，我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毛泽东同志常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错误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由于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6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

问题在认识论中是如此重要，所以"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把它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基本点。

第四，强调理论的巨大能动作用，坚持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在强调实践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引用列宁说过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来说明掌握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同时他进一步指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①因此，"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②他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因此，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为万古不变的教条，而只能是指导我们革命行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同志从认识论上分析了我们党内部和革命队伍内部思想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根源，明确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③"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的事情，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而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则仍停留在旧阶段，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前进，同样是离开了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这样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④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63、498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72页。

毛泽东同志这一科学结论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分析中国革命重大实际问题的哲学概括。它对端正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有效地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革命和建设实践起着重要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实事求是就是共性和个性相联结

实事求是不仅要求我们正确认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而且要求我们深入认识客观事物本身的辩证法，特别是关于共性和个性的“联结”。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同志也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毛泽东同志从自己亲身参加和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中，认识到掌握战争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重要性。他说：“战争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①他批判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强调研究特殊战争规律的重大意义。他说：“战争的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②那么，什么是中国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54—155、157页。

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呢？毛泽东同志指出："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① 毛泽东同志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指导路线和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原则，从而引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

随后，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不仅对军事问题，而且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问题进行总结，把它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说明。毛泽东同志先阐述矛盾普遍性的原理，然后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他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② 他还强调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矛盾及其本质。而为了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他还进一步指出要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矛盾的特殊性，这就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83页。

看。所有这些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最后，毛泽东同志从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相互联结上说明了这一关系的实质及其重大意义。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共性是绝对的，然而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

毛泽东同志不仅把共性个性问题作为矛盾问题的精髓，而且把它引入认识论，作为解决认识秩序问题的依据。他明确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有可能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②所谓“从特殊到一般”，是讲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中，先接触和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然后进行概括，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所谓“从一般到特殊”，是讲从认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84—285页。

到实践的过程中，用取得的各种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作为指导，继续深入地研究个别的、特殊的事物。所以，特殊——一般——特殊，与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这里是从认识对象看问题，着重讲的认识特殊事物与认识一般事物的秩序。这个认识秩序是毛泽东同志在与教条主义作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教条主义者割裂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既不知道马列主义一般原理是从哪里来的，又不懂得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他们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的认识论根源之一。

毛泽东同志还把共性和个性相联结的观点化为我们的工作方法，即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他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①他认为这种方法是我们共产党人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采用的方法，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实事求是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坚持实事求是还要求我们从认识的主体方面进行分析。人的认识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是广大群众的事情。因此，要做到实事求是，既离不开个人，更离不开群众，离不开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或者说领导走群众路线。在这一方面，毛泽东同志也有大量的论述。

① 《毛泽东选集》第852页。

首先，毛泽东同志强调实践就是社会的实践，群众的实践。他提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而人民群众则是实践的主体。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 又说："知识来源于群众。"② 离开了群众的实践，就无所谓认识，更谈不上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

其次，毛泽东同志把群众路线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统一起来。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③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就是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就是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的过程。这样，就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毛泽东同志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法。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

① 《毛泽东选集》第9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854页。

是，群众路线。”①又说：“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②这一观点，在我国当前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矛盾大多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群众路线的方法也就是民主的方法，只有发扬民主，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从哲学高度说明了发扬民主在认识论上的意义。他说：“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好象是一个加工厂，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因此，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来。

第四，毛泽东同志也一贯重视领导者的认识活动的意义。因为领导是群众智慧的集中者，是群众实践的指导者。领导的认识活动和群众的认识活动是一致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的统一。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的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③我们讲的群众路线，也可以说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路线。所谓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求领导要深入群众，深入实践，搞好调查研究，将群众的意见化为领导的意见；所谓到群众中去，就是领导要用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正确的系统的意见，向群众作宣传，并组织带领群众去实践，在实践中考验和丰富这些意见。可见，只有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才能做到实事求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57、45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853页。

是。也可以说，实事求是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综上所述，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贯穿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它从哲学基本问题入手，彻底唯物而又辩证地解决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概括出了从客观到主观，又从主观到客观的认识规律；随后，从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出发，解决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概括出了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认识过程；然后，又对认识的客体作了分析，解决了认识特殊事物和认识一般事物的辩证关系，概括出了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秩序；最后，从认识的主体看问题，解决了领导的认识活动和群众的认识活动的辩证关系，概括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把列宁关于“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①哲学上这两条基本路线的思想，从各个方面进一步具体化，并加以充分发挥，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什么时候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什么时候革命事业就顺利发展，就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违反了这条路线，革命就遭受挫折，就失败。特别是在革命的转折时期更是如此。在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期间曾发生过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从思想路线上看，都是由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战胜了主观主义路线的结果。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党的八大曾提出正确的路线，但后来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产生了主观主义和个人崇拜的错误，以至于党的八大路线不能得到坚持和实行，反而受到批判，终于导致了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

“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实现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破坏，以及我们党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中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上来，首先就在于我们党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党的十二大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阶段。今后，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完成十二大提出的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争取在本世纪末，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奋斗。同时，我们也完全可以预计到，当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解决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也必将把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大向前发展。

学习毛泽东对国情的分析

——兼论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邹 永 贤

国情，是制定路线、战略策略的根据。认清国情是认清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基本根据。对国情问题是否予以应有的重视，怎样才能正确地分析国情、认清国情？关键在于是否坚持唯物主义，坚持唯物辩证法。在这方面，我国革命的历史已经有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毛泽东在他的科学著作中关于这个问题有过许多论述和精采的分析。学习毛泽东对国情的分析，研究他在解决认识国情问题中的认识路线和方法论，仍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围绕着中国国情问题有过多次争论。有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有共产党人内部的争论。在这一点上中国革命的历史与俄国革命的历史很有相似之处。

当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到俄国时，马克思主义者就与民粹派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

于俄国的国情。民粹派根据他们对俄国国情的认识，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俄国，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仅仅是偶然的现象，俄国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完成粉碎民粹派的任务是由列宁完成的。列宁之所以能完成这个任务，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他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大量的经济调查，对俄国社会经济制度，俄国的阶级结构进行了深刻的分析；针对民粹派提出的问题，论证了无产阶级能够起领导作用的经济基础，论证了农民中的两种倾向，即革命性和业主倾向的经济基础，然后作出结论："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完全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则。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政治和经济问题上去。"①因为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的，所以他能击中民粹派的要害，从理论上、思想上粉碎了民粹派。

民粹派被粉碎后，又发生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关于策略问题的争论。孟什维克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最主要的也是脱离俄国的国情。他们从当时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推论出俄国资产阶级应当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这种力图从关于俄国革命的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的方法，列宁斥之为："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②在这里，列宁是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来批判孟什维克在国情问题上的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以中国国情特殊为借口，胡说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中国不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梁启超到国民党反动派都曾经这样说过。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以中国的国情的真实情况，批驳了这种谬

①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158页。

论，

但是，在原则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可以用来改造中国社会，这并不等于对国情问题的认识已完全解决。在中国共产党人内部，围绕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与策略的争论，始终牵涉到如何对待国情，中国的国情的特点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这里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态度，两种不同的认识。毛泽东是一种态度，一种认识；而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陈独秀和“左”倾错误的王明是另一种态度，另一种认识。毛泽东十分重视国情的研究，把分析国情作为考察革命问题的出发点、制定战略策略的根据，努力把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而陈独秀、王明对国情的研究很不重视，他们在制定路线和战略策略时是从书本出发，从抽象的一般原理出发的。

为了真正认清国情，做到真正从国情出发，制定路线和战略策略，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中国国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正是这种调查研究的产物。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从经济结构和政治态度上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得出了“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① 的科学结论。分清了敌友，为制定正确的民主革命的路线、战略策略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还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主客观因素，强调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客观的物质基础是旧中国的特殊的经济

① 《毛泽东选集》第9页。

政治状况，是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则强调了要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要注意国家和民族的特点，也就是国情的问题“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①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开始从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向实际作调查的重要性，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结论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② 这里，毛泽东已经把认清国情问题与革命胜利问题联系起来了。在《实践论》、《矛盾论》中，就进一步从世界观的高度总结了国情分析的方法对革命工作的重要性。在《论持久战》中，关于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分析，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国情的一次深入的、有所侧重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在《中國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不仅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而且从理论上阐述了认清国情与认清革命问题的关系。他说：“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③

正因为毛泽东在分析国情上进行了如我们在上面所已经看到

① 《毛泽东选集》第157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2—2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96页。

的那样艰苦卓绝的工作，所以他才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即对中国的国情有透彻的认识，从而能够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从分析国情入手，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终于找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这些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概括，并且明确指出："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采取了与毛泽东相反的态度，他们从来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对中国国情没有真正了解，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时，不是从分析中国国情出发，不是以对国情的正确认识为自己立论的根据，而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用这种主观主义的方法，当然不可能探寻到客观存在的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特点。

陈独秀、王明等右倾和"左"倾错误的代表者，不进行调查研究，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史实俱在，人所共知，无庸赘述。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从来都没有分析过国情。应当看到，他们在议论中国革命问题时，也曾经罗列了不少中国的情况，似乎也是从国情出发。可是得到的结论却与毛泽东的正确论断完全不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分析国情既有一个材料的可靠性、全面性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否运用了正确的分析方法的问题。并不是掌握任何一点情况，进行任何一种分析，都可以得到关于国情的正确的结论，达到认清国情的目的。

例如陈独秀，他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

---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页。

社会各阶级》中，对中国的社会情况，就有不少描述。他说中国“领土广大，交通不便，经济组织还是地方的，社会组织还是家庭的，文字组织还是半象形的。”“经济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阶级还都紧紧的束缚在宗法社会的旧壳内，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在这里，尽管也接触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些现象，但对于决定这个社会的本质的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帝国主义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与掠夺等等经济特点，都丝毫没有涉及。而工人农民的状况，陈独秀所看到的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样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毕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仅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①

工人阶级的先进性，革命的彻底性；农民反封建的革命性，几亿农民大军的力量，陈独秀完全看不到。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与封建土地关系的联系，它的革命的动摇性，也在陈独秀的视野之外。正是根据对国情的这些错误认识，陈独秀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途，作了这样的判断：“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②甚至他还进一步推论。“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纲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环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经过同样形式的同样阶段，还是一个问题，何况中国国民革命发展的趋势，现在固然不发生这样问题，即将来也不会发生。”③

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论断。但是这样的论断却是合乎陈独秀自己的逻辑的。因为他所看到的只是一些片断的社会现象，并没有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作全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没

①②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③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有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本质，没有真正地认清国情，他作的阶级分析，也只是根据一些片面的、表面的情况，因此他的分析就必然是错误的。

再如王明，他根本没有对中国社会进行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没有对国情作认真的分析，就妄谈中国社会性质。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说什么“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资产阶级的大中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都是反动营垒的一翼。”①那又怎样理解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呢？在他看来，“现在阶段革命之所以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性，是因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制度上社会发展上及社会矛盾力量上的比重和地位，还次于民族解放及土地革命的地位和比重。”“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便是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已经含有和存在着一定的个别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②这样，他就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了中国民主革命中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与富农的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主张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中间势力只斗争不联合。由于他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对经济状况、阶级状况作了唯心主义的估量。因而他所制定的策略，成为一套“左”倾机会主义的策略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见，要真正做到从国情出发，并不容易。必须对国情有正确的分析与认识，必须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必须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

---

①② 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在这方面，毛泽东给我们提供了典范。

例如，他对中国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及其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的根据的分析，就是从分析中日两国的社会性质、中日战争的性质入手的，也就是从分析中日两国的国情入手的。接着具体分析了战争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然后指出，正是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①最后，画龙点睛地写道：“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②这就指出了问题的关键，要求人们在研究问题时，要采用客观的观点，要注意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再看他对旧中国社会性质的特点的分析。

毛泽东对旧中国的解剖是从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开始的。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特点，再及于阶级结构、阶级关系，再及于政权性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群众的无权与贫困等等。他尤其着力于经济特点的分析，着力于几个主要的、又有争议的阶级的分析。在分析阶级时，严格遵守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经济范畴的学说，遵循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首先考察各个阶级在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进而分析各个阶级对革命的态度，总之，是从经济地位入手，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为指导来考察阶级的。例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他是从中国民族资本的现实，从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出发的。中国民族资本虽然有了某些发展，在中国政治文化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一方面受帝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18页。

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另一方面又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一定的联系。民族资本的这个特点，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它既有革命性，又有动摇性。这是毛泽东得到的已为历史证明了的科学结论。

对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分析也是这样。毛泽东是从它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阶级利益和具体的历史特点来考察它们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据此他得出了与陈独秀、王明不同的结论。历史也已证明正确的是毛泽东。

全国临解放前夕，毛泽东又一次精辟地分析了国情。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党的正确的策略与政策，并指出认识中国经济的特点，与制定和执行正确政策的关系。例如，忽视或轻视我国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忽视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对民族资产不限制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反之，限制太死，认为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因为有革命胜利后的各种有利条件，因此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历史也已证明了毛泽东的分析是正确的。

陈独秀和王明对待国情的态度、他们用以研究中国革命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他们的逻辑推论，完全用得上列宁的名言，只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毛泽东关于国情的分析的科学方法与之对比，不仅有力地说明了，只有遵循以客观实际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分析国情入手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而且还有力地说明了，对国情是作唯物辩证法的分析，还是作唯心主义的分析，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我们只有牢牢地站在唯物主义的基地上，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坚持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的原理为指导，才能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

为了进一步理解坚持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与正确分析国情的关系，进一步理解毛泽东关于国情的分析在科学方法论上的意义，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坚持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的论述和科学实践，作一简要的回顾是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建立他们的学说体系时，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灭亡的规律时，一开始就强调了他们的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著名论述。他提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把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变革和意识形态的形式的变革区别开来。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专门阐述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但是他并没有忽视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他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现的起点。”② 最后两句讲的正是从具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103页。

体到抽象的过程，也就是分析的起点。分析必须从现实中的具体本身为起点。它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方法。在黑格尔那里，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把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看做具体本身产生的过程。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指出：“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①

十五年后，马克思因为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很差，同时也为了回答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论》中的方法论的曲解与攻击，又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再次提到他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强调了正是在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这个根本点上，他的方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截然相反，应该把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的、倒立着的辩证法“倒过来”。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也强调了上面马克思讲的那个根本观点，指出“黑格尔的方法在它**现有的**形式上是完全不适用的”。它是唯心的，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科学的方法要求“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②。

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都批判了把辩证法看成单纯证明的工具的观点，强调了客观地分析问题，强调了辩证规律的客观性。

列宁在讲辩证法时总是注意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注意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划清界限。在他写的《辩证法的要素》中，带有总论性的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③在列宁看来，以辩证方法观察问题，首先就应该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而不附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120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607页。

加任何主观成分，也就是要求实事求是，力求做到主客观相一致，而不能只是抓住事物的一些实例，一些枝节之论，来冒充事物自身的辩证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之所以如此强调他们的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并不是仅仅由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论战的需要，而是由于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由于存在着唯心辩证法，存在着辩证方法脱离了唯物主义基础的现实危险。后者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把自己的愿望和意志硬加到客观世界上去。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在他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因此，尽管他大讲变化发展的原则，却往往是以幻想的发展代替真实的发展。用这种唯心主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自然就不能不闹出许多牵强附会的笑话，甚至变成愚蠢的诡辩。

把自己的愿望和意志硬加到客观世界上去的方法，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方法，非科学的方法，用这样的方法得不到客观真理，但使用这种方法却并不限于自觉的唯心主义者。一些不是唯心主义者，甚至口头上也反对唯心主义的人，在实际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往往也会不自觉地使用了这种方法。这正是马列主义创始人之所以反复强调他们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的最主要原因。

人们之所以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在方法论上离开唯物主义基础，陷于主观主义。除了认识论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材料占有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关于这方面有很多教导。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都是在占有大量材料，经过对这些材料作认真的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写成的。它们是坚持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的典范。

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优良传统。他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① 他对国情的分析，正是这样的实践。

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十分落后与腐败，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幼稚与软弱，他们都未能为毛泽东提供关于中国社会的比较可靠的综合材料。因而毛泽东在分析国情时，不可能象马克思和列宁那样利用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而只能自己做社会调查，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但毛泽东却因此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社会调查的经验，总结了一整套关于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而且把它提高到认识论的高度，作为研究问题的辩证方法，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组成部分。他不仅提出了许多诸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等著名论断，而且从理论上阐明调查研究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关系，指出："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② 这就把调查研究纳入认识论，把它作为认识的起点，把它与整个分析过程融为一体，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公开地在理论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鼓吹唯心主义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即使是陈独秀和王明，当他们还在革命的时候，在口头上和文字上也没有反对马

① 《毛泽东选集》第7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796页。

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但是他们在观察和处理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上，却是唯心主义的。他们不是从客观存在的国情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从主观臆断出发。有时虽然也对国情作了些分析，但他们的分析却不是建立在占有大量的、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他们的方法仍然离开了唯物主义基础。这种现象的产生，因为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所以在我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并不仅仅限于出现在陈独秀、王明两人身上。它也不是仅仅只出现在中国，俄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在如何对待国情和国情分析的方法论问题上，有那样多的相似之处，也只能从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上寻找原因。

历史的教训，不仅证明了在实际工作中、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坚持辩证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的重要性，而且证明了这个坚持并非易事。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一贯重视行动中的马列主义；提倡科学地分析国情，以国情的正确认识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战略策略的根据；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使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贯彻到无产阶级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去。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运用上，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发展是有重大贡献的。我们应当把它作为理论财富加以继承和发扬。

三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中，特别是经过与“左”倾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深感党内关于国情问题的争论，在方法论、认识论上的重大意义；为了革命的胜利，必须在全体干部中推广分析国情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并用以改造党的工作作风和学风。

制定党的路线、战略策略，要从分析国情、认清国情入手，也就是要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做党的任何工作，也应当是这样。这是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牢记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概念的含义曾作过精辟的阐述，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 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就是要求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样的态度，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相反，从主观愿望出发，对周围的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对情况根本不了解，或仅仅一知半解，就乱出点子，乱发号施令，则是主观主义的态度。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这种态度，指出它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号召全党起来批判它，克服它。由于毛泽东的倡导，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我们党的广大干部，在工作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蔚然成风。

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有关的，还有一个学风问题。毛泽东说："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② 他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提倡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通过延安整风，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7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771页。

学风，也在全党树立起来了。

分析国情，认清国情，以制定党的路线、战略和策略；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基本方面之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伟大的胜利，是与它的形成和发展分不开的。

但是，自一九五六年以后，党的这一套好传统、好作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这一基本方面，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受到干扰和破坏。在还没有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国情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详细的分析以前，也就是说在还没有认清国情的情况下，我们就轻率地作出了一些重大的决策，包括全国性的战略决策，例如："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些错误的决定，使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失。

"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清的情况下，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的。这个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它是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于"文化大革命"，它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它是建立在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然而人们记得，正是在这期间，所谓看问题的辩证方法，所谓发展的观点、转化的观点、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等等，在一些报刊中宣传得很多、很普遍。一九五八年甚至被鼓吹为"辩证法大发展"的一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大发展还会使人犯错误，给人民带来如此严

重的损失吗？深入了解一下，就知道此“怪”并不怪。原来当时宣传的那一类辩证法的共同特点是离开了唯物主义基础，认为讲“辩证法”可以不顾物质条件，任意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结果在宣传发扬主观能动性时，不但不讲客观对主观的制约性，反而批判“唯条件论”，给人们以干工作似乎可以不必估计客观物质条件的印象。虽然人们的干劲确实被鼓起来了，但人民的劳动却并没有得到应有成果。至于唯物辩证法的斗争性被曲解为“斗争哲学”，其后果，则是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这一类东西，怎么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呢？如果硬要叫辩证法，则只能是唯心辩证法。这种唯心辩证法流行的结果，不仅使我们的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而且由于鱼目混珠，使人们真假难分，以至极大地损害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声誉。有些不明真相的人，竟不分皂白地嘲笑辩证法为“变戏法”，声称“就怕讲辩证法”。这段历史教训确实是深刻的。

但是这段历史却说明了毛泽东关于国情分析的方法及其有关论述的精神，并没有过时，证明了我们在开始时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国情，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问题还是若明若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而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国情在发展，分析国情的工作是不能一劳永逸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做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的经验，真正做到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这一段的历史还证明了即使是毛泽东本人，如果考察问题的方法，离开了唯物主义基础，也同样要犯错误。毛泽东晚年在这方面的失误，从反面证明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国情的分析的重

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深刻的、科学的总结，它指明了我们重新学习毛泽东关于国情的分析的必要性和方向。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学会正确分析国情。

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贡献

池 超 波

毛泽东同志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唯物辩证法。本文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史的角度，研究毛泽东同志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对唯物辩证法所作的主要贡献，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和神秘性，把它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赋于它以科学形态，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①，从而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写出了《资本论》等闪烁着唯物辩证法思想光辉的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第3页。

哲学的广泛传播，对于客观事物的“发展原则”，“大家都已经同意”。但是，正如列宁所说，许多人只是一种“表面的、未经过深思熟虑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是一种窒息真理、使真理庸俗化的同意。”① 它实质上是一种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否定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质变、飞跃、转化。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就是用这种庸俗进化论代替唯物辩证法，宣扬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用诡辩论篡改唯物辩证法，掩盖帝国主义本质，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深入地研究了辩证法。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六年，列宁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研究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黑格尔等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中的辩证法思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阅读了近八千页书，写了八本笔记。同时，列宁把辩证法运用到帝国主义的矛盾分析中去，继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写出了《帝国主义论》，从而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② 和“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③ 的科学结论。列宁还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诡辩论，写了《第二国际的破产》、《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等一系列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在于直接地坚持和发挥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思想。

二

列宁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同一的原理；把对立统一规律当作辩证法的核心，对它的具体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0页。

②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737、873页。

内容作了科学的规定。

列宁明确提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同一的原理，是他以唯物主义观点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的科学成果。黑格尔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的逻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纯粹概念”，即最普通，最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是一切客观事物和精神的本质，因而逻辑学所描述的绝对观念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客观世界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换言之，逻辑规律既是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又是认识发展的规律。因此，黑格尔虽然没有明确讲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是同一个东西，但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三者是同一个东西。列宁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肯定了黑格尔的上述思想的合理成分，在《哲学笔记》中，反复提出了有关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同一的思想。列宁在谈到逻辑学时说：“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① “逻辑学是和认识论一致的”②。在讲到辩证法时，列宁说：辩证法的规律是“世界和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③，“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④。但是，列宁明确提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同一，是他进而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的结果。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⑤ 这就是说，作为逻辑和唯物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89—90页。

②③ 同上书，第186页。

④⑤ 同上书，第410、357页。

主义认识论的辩证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出色的实际运用。

列宁认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前面已经说过，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年列宁为了分析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解决革命斗争中的重大问题，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集中精力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研究辩证法问题，写出了《哲学笔记》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一九二〇年，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①。这里所谓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当然是指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即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一九二一年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中提出辩证逻辑的四个要求，即普遍联系、自己运动、实践和真理的具体性。这又是指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要求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把握客观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揭示客观事物“自己运动”的具体过程，从而把握具体真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作为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相同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它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就是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而这里所谓“具体情况”，就某一具体事物来说，它是处于列宁所说的“整个世界的有规律的联系”之中，它的内部包含着多层次的组成部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的统一体，是多样性的统一，对立面的统一。因而，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的“具体分析”，就是要揭示客观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把握它的“自己运动”，从而在思维的行程中以概念和范畴的逻辑形式把它再现出来，达到思维中的具体，把握具体真理。因此，对于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来说，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对具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44页。

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如何把“具体情况”“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如何通过概念和范畴的运动来把握客观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把握客观事物“自己运动”的具体过程，从而在逻辑的进程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把握具体真理。列宁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个辩证法运用得这样成功”，因而号召我们应当研究《资本论》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研究《资本论》中的逻辑，并且应当充分利用《资本论》的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列宁所提出的上述课题，对于理解和把握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说斯大林对于这个课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研究，那么，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等著作中，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的基础上，重视和研究了这一课题。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强调，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由此出发，毛泽东同志着重地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指出，当具体分析具体矛盾的时候，“应当注意”分析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并且强调，“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殊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这是一个艰巨复杂的任务。列宁早在一九一九年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

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①，因而当时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具体分析我国具体矛盾，揭示中国革命的道路，制定相应的战略、策略、方针和政策。但是，当时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唯物辩证法当作套语和标签，生搬硬套苏联经验，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同志正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具体分析了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内在矛盾，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部分，即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各自的阶级特点，创立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②但是，在中国，由于“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因而“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06—507页。

队”①；又由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不统一和充满矛盾，以及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因而有必要和可能“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②因此，毛泽东同志说：“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③即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一九二七年秋季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是沿着这条道路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革命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这个战争的规律是什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进而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同志首先强调，“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是“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这就要具体分析“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指出：“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点。”④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而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因而战争是持久的，而且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毛泽东同志说，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事实说明，中国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二年艰苦的革命战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08、598、50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75页。

争，首先在一部分农村取得胜利，建立革命根据地，作为聚积和锻炼自己力量的革命阵地，然后一步一步，一块一块地发展和扩大阵地，从建立小块革命根据地发展为大块的革命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发展到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并且对它的内容作了科学的规定。这就是，一切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或对立面；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引起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推动事物的发展。而把辩证法当作认识论，当作认识的规律，列宁又对对立统一规律作了这样的规定："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①。斯大林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一个特征与其他三个特征并列起来，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又把对立面的斗争归结为新事物和旧事物之间的斗争，从而在政治上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当然是一种倒退。毛泽东同志继承列宁的思想，对对立统一规律作了全面的论述，并把它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去，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这从毛泽东同志的许多著作，特别是从《矛盾论》和关于革命战争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对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结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②。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说，"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③，从而进一步对对立统一规律作了科学的规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0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定。《矛盾论》写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通过对于抗日战争的分析，实际运用和发挥了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对立统一规律。毛泽东同志首先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历史条件出发，从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和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小国这个对立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基本事实出发，具体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两个方面的具体情况，从而揭示了这个战争的基本特点。毛泽东同志说："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① 毛泽东同志正是从敌我之间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这几个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论述了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以及他们认识上的片面性。毛泽东同志说：亡国论者只看到敌我之间的强弱对比，并把它夸大为全部问题的根据，这是他们的片面性；同样的，速胜论则是看不到强弱对比这个特点，只看到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对比这几个特点，并把它推崇为绝对，夸大为全部问题的根据，得出了速胜论的错误结论。而中日战争双方的强弱、优劣、胜败又是怎样对立统一而相互转化的呢？从"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出发，毛泽东同志指出，敌之强和优势，我之弱

① 《毛泽东选集》第417—418页。

和劣势都是相对的。因为敌之强和优势，已为敌之小国、退步、寡助等不利因素所灭杀；我之弱和劣势，可因我之大国、进步、多助等有利因素所补充。同时，敌之强可因我之势力而削弱，敌之缺点可因我之势力而扩大。这样，在战争过程中，敌我之间经过“削弱”与“反削弱”，“扩大”与“反扩大”的斗争，经过许许多多的战役和战斗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斗争，“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着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① 毛泽东同志正是在具体分析了敌我之间这种统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战争过程中的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的基础上，揭示了中日战争的犬牙交错的形态和“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的具体过程。毛泽东同志上述的科学结论已经完全为我国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所证明。

三

毛泽东同志对于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相联结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原理。它象一根红线贯穿着《矛盾论》，贯穿着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各个方面。因而他强调指出，“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原理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产物。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把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相割裂。教条主义以共性否定个性，以绝对否定相

① 《毛泽东选集》第42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95页。

对；经验主义则以个性否定共性，以相对否定绝对，从而“抛弃了辩证法”。

关于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也就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马克思从一八四四年开始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政治经济学，经过十多年的科学研究，他在一八五八年八月——一八五九年一月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本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一个重要阶段。一八五九年一月，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中总结自己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政治经济的经验时指出：“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①对于这一点，列宁曾经说过：“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②马克思和列宁在这里说的是，作为认识论和逻辑的辩证法是从个别开始，“从最简单，最普遍，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③，在《资本论》中是从商品开始，在思维行程中是从“一个命题开始”，然后进入一般，揭示事物的本质。列宁说，这就是“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相互联结时指出：“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④进而指出，我们运用辩证法去分析矛盾的时候就是要具体分析具体的矛盾。接着，毛泽东同志把共性个性，绝对相对互相联结的道理，归结为“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这说明，毛泽东同志认为，我们只有懂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

②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93页。

共性个性相联结的道理，才能理解和把握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具体分析具体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指出，共性个性相联结的道理，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共性和个性关系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关系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所以理论脱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就是因为他们把共性个性相割裂，以共性否定个性，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秘化。经验主义则以个性否定共性，把自己的局部经验绝对化，拒绝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否定苏联经验的普遍意义，从另一方面反对理论联系实际。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握共性和个性的联结，才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因此，只有理解共性和个性的相互联结，把握这个"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才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否则，不是搞经验主义，就是搞教条主义。

"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所以是"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来说，就是只有懂得这一道理，才能理解和把握对立统一规律，善于去分析矛盾、解决矛盾。

在黑格尔那里，矛盾着的双方是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或者说，既统一又斗争。例如他说所谓"积极理性"就是"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①。恩格斯说："两极的分离和

① 黑格尔：《小逻辑》第181页。

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他们的相互对立之中。”①而形而上学就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把对立和统一割裂开来。列宁的贡献在于指明了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而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则在于进而论述了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互相联结”，并把它规定为“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

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所以，在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中，存在着绝对和相对的关系问题。列宁说过：“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②。列宁在这里虽然指出了相对和绝对的辩证法关系，但没有明确指明对立面的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怎样相联结而存在。对此，毛泽东同志作了具体的论述。他指出：“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正是因为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同一性才能是相对的、具体的、可变动的，否则，只能是绝对的、抽象的、僵死的同一性；正是因为对立面的统一中存在着斗争，才能引起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过渡到一个新的对立统一，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因而“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③。同样的，对立面的斗争正是寓于相对的同一性中，才表现了它的绝对性。因为对立面的斗争之所以是绝对的，就在于它是贯串于任何矛盾运动过程的始终，不论矛盾着的双方共居于一个统一体的时候，还是经过对立面的互相转化，过渡到一个新的统一体的时候，都存在着斗争，因而离开了相对的同一性，就无所谓斗争的绝对性。因此，绝对相对的关系之所以是“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就是因为我们只有理解和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08页。

把握了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的“互相联结”，才能理解和把握对立统一规律，抓住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善于去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否则，不是象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搞“调和论”，就是象“左”倾机会主义一样，在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社会上“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搞“斗争哲学”。

综上所述，共性个性，绝对相对所以是事物的矛盾问题的精髓就在于：只有理解和把握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相联结的道理，才能抓住唯物辩证法的“活的灵魂”，使普遍的原理同具体的实际相结合，具体分析具体矛盾，否则，不是搞经验主义，就是搞教条主义；才能抓住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把握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否则，不是搞“调和论”，就是搞“斗争哲学”。在民主革命和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毛泽东同志正是抓住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相联结的道理，抓住了事物的矛盾问题的精髓，抓住了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和“核心”，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握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揭示了抗日战争的特殊形态和持久战的具体过程，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这些根本问题的正确解决，使中国革命能够排除万难走向全国的胜利。建国以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胜利面前，由于骄傲自满，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滋长，封建专制主义遗毒和“党和国

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①，致使我们逐步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重大损害。

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一切国家最终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但是，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它们走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又有自己的特点。我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城市和农村不同，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在这样生产力的基础上，我们不可能马上建立一个单一的、高水平的公有制经济，而只能建立多样性的、与各种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各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思想上受到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脱离实际，不从我国国情出发，生搬硬套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重犯了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绝对化的错误。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我们按照苏联的模式来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体制和结构，并且片面强调“一大二公”，搞“穷过渡”、刮“共产风”、割“资本主义尾巴”，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我们不顾我国是一个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原来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现实，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以钢为纲”，并且不量力而行，不切实际地提出高指标，追求高速度，急于求成，结果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以至犯了“大跃进”这样严重的错误。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论断，它必将指引着我们沿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胜利前进。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主观主义地运用辩证法，从而从根本上“抛弃了辩证法”的典型表现。这种主观主义运用辩证法，就是离开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不“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否定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否定党和政府所进行的正确的工作，否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而且完全从主观意愿出发，把党内的思想分歧，同志间的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作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当作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进而在全党和全国进行一系列的“一分为二”，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存在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反派”和“走资派”，等等，并据此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个错误理论指导下，把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当作这个“革命”的对象，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理人，统统打倒，从而严重地混淆了是非和敌我，残酷地打击和迫害了党的骨干力量和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这种主观主义地运用辩证法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把辩证法篡改为诡辩论。列宁指出，“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作过……通向诡

术的桥梁”①。一九五八年，我们犯了“大跃进”这样严重的错误。一九五九年，在党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面对当时严重的形势，向党中央领导同志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提出了一些善意的建设性意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心为党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但却因此蒙冤受屈，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罪名。而且在所谓“反右倾”斗争中，为了坚持和掩盖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的严重错误，压制党内民主，不顾当时大量的全局性的客观事实，以所谓区分主流和支流，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一分为二”观点作为借口，硬把彭德怀同志的正确意见，说成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产物。这种把唯物辩证法主观地加以应用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唯物辩证法变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诡辩论。

长期以来，我们把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归结为一个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又把对立统一规律归结为一个“斗”字，即把统一性和斗争性相割裂，离开了具体的统一性，抽象地强调斗争性，认为斗争就是一切，斗争就是革命，只许讲斗争，不许讲统一，从而把唯物辩证法歪曲为“斗争哲学”，成为整人的工具，成为推行“左”的错误的理论根据。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我们在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下，乱斗一气，整来整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伤害了许多同志，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把这种“斗争哲学”推向极端，疯狂地镇压干部和群众，甚至提出所谓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踩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类极端野蛮的口号，把我国人民投入血腥的恐怖之中，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列宁说过，辩证法是这样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又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①。斯大林讲辩证法的特征时，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这当然是片面的，不科学的。毛泽东曾经指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②还应当指出，列宁所说的"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加引号的。它是哲学范畴，不是政治术语。它是一个具有最普遍意义的概念，所指的是事物内部最普遍的辩证关系，即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相互否定的趋势。而斗争的具体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只有把握具体的同一性，才能把握斗争的具体形式，从而把握事物的内在矛盾以及"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因此，唯物辩证法既不是套语，"词汇语录"，"单纯证明的工具"，更不是"斗争哲学"，整人的工具。恩格斯说，"辩证法的本性"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因而我们把握统一性和斗争性的"互相联结"，把握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要把握"辩证法的本性"，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总之，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只有把握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联结，才能理解和把握"辩证法的本性"，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具体分析具体情况，揭示客观事物内在矛盾以及矛盾"自始至终"运动，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才能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才能正确地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避免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8页。

"调和论"和"斗争哲学"。

"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①。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是我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理论表现，是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哲学概括，是在我国革命实践中产生又在革命实践中得到检验的科学理论。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就是坚定不移地把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胡耀邦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而这个伟大转变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我们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在这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我们应当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特别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思想，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共性和个性的统一、统一性和斗争性的统一，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批判和克服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深入实际，对我国社会现阶段的具体矛盾及其表现进行深入的研究，更加深刻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贯彻执行十二大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逻辑

——毛泽东在实践中运用辩证法的光辉范例

商 英 伟

在总结人类认识史上的优秀成果，批判汲取黑格尔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为了给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论作出科学的理论论证，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去改造全部经济学、历史学，去考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写下了《共产党宣言》、特别是《资本论》这样不朽的巨著，体现在这些著作里面的辩证法的逻辑，它向人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规律性，它指明了无产阶级必须经过革命建立自己的政权，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列宁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十分重视辩证法的学习和运用。在解决帝国主义时代复杂的革命问题时，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系统地研究了这个科学的理论，明确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并把实践纳入辩证逻辑，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扼要地论述了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的辩证过程。他在总结和概括哲学史上辩证法思想的优秀成果，考察辩证法各个要素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明确作

出对立面的统一（即矛盾）是辩证法的实质、核心的论断。并且对于这个辩证法核心的有关问题，诸如同一性和斗争性、个别和一般（即个性与共性）、相对和绝对…等，作了概要的说明，并且运用这些思想去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性质、特点，分析战争与革命等基本问题，写下《帝国主义论》等著作，揭示了新的历史时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也就是实现了他自己所提出的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并利用它来解决当前的问题的要求。在总结哲学史上的经验、揭露当时那种打着辩证法旗号搞诡辩的机会主义思潮时，他告诫人们：辩证法在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地作过通向诡辩术的桥梁，在运用辩证法这个伟大认识工具的时候，要注意防止主观主义，对于辩证法的核心及其有关的问题，还应该进一步说明和发挥。

列宁逝世后，继承列宁关于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等基本思想，系统说明和发挥这些思想，并实际运用它去分析和解决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民族民主革命问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具体说明和发挥列宁上述思想，写出《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的哲学著作。同时，他又运用这些发挥了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去进一步分析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系统地阐述革命的基本问题、基本特点、基本规律以及有关的政策，写出《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揭示了中国革命的逻辑，指导中国革命夺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一，对中国特殊国情的考察和分析，即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关系的特殊性的具体分析，是确定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的最基本的依据。就是说，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特殊性质，是中国革命逻辑的出发点，是中国革命

逻辑借以引申出来的最基本的根据。

毛泽东在论述和发挥马克思、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时明确指出：唯物辩证法"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①当马克思、恩格斯把事物的矛盾规律应用于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时，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基本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马克思、列宁在他们的著作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②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时，毛泽东既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特殊性以及它的特殊的阶级关系，同时又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它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各种条件和关系，这就判明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从而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及其所属的世界革命的范畴，进而推断革命发展的趋势及其规律性。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指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一方面它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发生，从而把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社会；另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主要特点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83页。

是：一、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它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并且造成了为它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使之与封建地主阶级结合起来，盘剥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这个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却依然保存，并且和买办、高利贷资本结合起来，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优势；三、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起颇大的作用，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很软弱，并且大部分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四、封建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但取而代之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继而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这些情况决定了中国社会存在着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主要的基本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以至尖锐化，就必然造成革命运动的发展。

既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社会生产发展、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因而它们成为革命的对象，完全是历史发展所规定了的。所以，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这两大任务是相互关联的。因为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保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支持者，如不打倒帝国主义，就无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然而，封建地主阶级却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如不帮助农民打倒封建地主，就不能组成强大的革命队伍去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因此，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二者是既相区别而又统一的，忽视那一方面都是不对的。

但是，发生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其特点、其发展趋势显然不同。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的特点后指出，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之后的中国革命，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不属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它的发展前途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在世界的基本矛盾、阶级力量对比方面出现了新的情况，中国内部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一、出现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二、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摆脱了机会主义思潮的束缚，开展了革命斗争；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国际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帮助下进行；四、这时的帝国主义非更加依赖殖民地便不能过活，它不容许殖民地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五、中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建立自已的政党领导民主革命。在这种形势下，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新条件下，象中国这种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打击、削弱的是帝国主义势力，直接帮助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而，它成为这个新的世界革命的同盟军，成为这种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又区别于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新式的特殊的民主革命，是由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质及其所处的时代的新特点所决定的。毛泽东把这种革命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二，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力量对比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是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基本规律的基础。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即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它们所造就并为之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它们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无产阶级要战胜这些敌人，“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他认

为，“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规律之一”①。

这个结论是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②，阶级分析就要抓住这个根本。在分析过程中对各个阶级要作具体的历史的考察，对一个阶级中的各个阶层要作细致的分析，这样才能把握住革命斗争中阶级关系的全貌及其发展的规律性。

在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作具体分析中，值得注意的是对资产阶级的分析。毛泽东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它是由帝国主义培植并为之服务的，而且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因而是革命的对象。但是在一定时期，当着革命是对着某个帝国主义时，投靠其它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参加这一斗争，成为革命的间接的、暂时的同盟者。中国资产阶级的另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同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在政治上、经济上它又是很软弱的，因而当革命斗争剧烈时，它就会动摇、妥协以至跟着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所以，它不能充当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领导；另一方面，它又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摧残，因而要求改变这种状况，使自己能得到发展，所以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反帝反封建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6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01页。

的力量，成为革命的同盟军。

毛泽东还对中国的农民阶级、无产阶级作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他们受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因此，“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但是，农民内部是在分化着的，其中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它可能参加反帝斗争，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中农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一般的不剥削别人，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他们不但能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而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贫农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连同雇农、（农村中的无产阶级），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的主力军。贫农（包括雇农）和中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所谓农民，“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是指贫农和中农”。①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产业无产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等以外，还具有许多特出的优点，这就是：一、它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它的斗争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很强；二、它同中国资产阶级相比，资格更老些，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三、它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登上革命舞台的；四、它的大部分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因而它与中国农民这个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这样的优点，这样的特殊条件，就使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地要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重担。而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就根本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它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彻底

① 《毛泽东选集》第606页。

性以及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①

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要坚持对革命的领导以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一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对它能够参加革命的一面要加以团结，与之建立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统一战线；而对它的动摇性、妥协性的一面则要开展必要的斗争。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这才是正确的方针。二是对农民这个革命的主力军的重要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是“以农民的解放为主要内容的”②，无产阶级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保证自己对革命的领导权，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否则，一切都会成为空话。

中国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战胜强大的敌人，除了必须联合自己的同盟者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之外，还必须采取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斗争形式并掌握斗争的规律。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力量对比后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些敌人的内部又是互相矛盾的，因而中国实际上处在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种状况就决定了：一、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主要方法，不能是和平的，而只能是以武装的工农的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武装的反革命。二、中国这种工农的武装革命，和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那样在大城市搞武装起义，先占领城市然后解放农村、夺取全国胜利的发展进程不同，它利用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9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960页。

敌人内部的矛盾，利用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和土地广大有回旋余地等条件，在反动统治力量薄弱而革命主力军集中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按照国内国际斗争发展的情况，逐步扩大，波浪式地推进，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三、由于敌人的强大和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不统一性，因而革命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这就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艰苦的曲折的斗争。这些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它已经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

第三，在正确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所依靠的社会力量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提出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这就是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毛泽东在论述对立统一规律时，十分重视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必然会互相转化的问题。他指出，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为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这个转化是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任何个人的主观臆想。因此，他认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①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使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来一个根本的变化，把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并且因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而且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首先在政治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统治，它所要建立的政

① 《毛泽东选集》第305页。

权不可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专政政权。其所以是这样，是由于这个革命所要打倒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这个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主力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加这个革命，但它只是同盟者之一，并不是这个革命的主力。

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专政政权，对于革命的敌人实行专政；对于人民，即参加革命的各阶级、阶层和个人，则实行民主。为了有效地发挥这个政权的作用，这就需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这种制度要求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这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指的是政权的主体、政权的内容，即一般所说的国体；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民主集中制，指的是政权的体制、形式，即一般所说的政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建立的政权就是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统一。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经过革命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这就根本改变了旧中国那种人民毫无政治权利的状况，从而调动了广大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人民就可以运用政权这个强有力的工具，去铲除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所遗留给旧中国的剥削制度，去建立并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反过来说，也只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立、发展和繁荣，这个人民的政权才能巩固。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包括：一、没收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的大工厂、大企业归人民的国家所有，建立人民民主国家的国营经济；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将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

民，建立和发展农民的个体经济；三、有条件地逐步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建立和发展合作社经济；四、保存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农村保存富农经济，并且允许它们发展。这几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并得到发展，但是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却是由国营经济所掌握，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特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还需要建立并发展新文化与之相适应。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是新的经济、政治关系的反映，并且反作用于这种新的经济、政治，就是说它是为巩固和发展新的经济、政治服务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这两者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人民的新文化。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反动统治被推翻，这种反动的旧文化并不会自然消失。要建立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科学的新文化，就必须破除旧文化。毛泽东指出，“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①。但是，破除旧文化并不是说一概不要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因为中国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所以，“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②。对于历史上的东西要作具体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

① 《毛泽东选集》第6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68页。

要破除旧文化，要批判继承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只能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要建立科学的新文化，就要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这只能以无产阶级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思想为指导。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只能由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①无产阶级、共产党员必须注意保持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他们可以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绝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宗教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②这里，应当明确作为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来说，共产主义思想是居于指导地位的，并且要在工人、农民中逐步地努力地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化还不是社会主义的。③

这样，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几方面来看，这里面就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如无产阶级对于政权的领导，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以及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等等；同时又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结果。建立这样的新制度，它既区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又有别于社会主义社会，它是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④

第四，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革命行动纲领的实践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是指导革命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质进行具体分析、确定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断

---

①②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666、667、664—665页。

④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610页。

革命发展的趋势，也就是革命发展的前途问题。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即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①，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全部革命运动，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一个是（当时的）现阶段的革命，一个是将来阶段的革命，这两者无论就其对象、任务、性质都是有区别的，因而其发展的规律性也是不相同的。其中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在其进行中，又会由于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而分为若干的小阶段，因而其具体纲领也就有所变化。但是，尽管有这些小阶段的区别和推移，整个过程的基本性质却是没有改变的，因而它的一般纲领也就用不着更换。这样两个不同阶段的不同性质的革命，是整个中国革命发展过程的两个必要的有机构成的环节，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②两者之所以有着内在有机的必然的联系，是由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③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就将成为社会的主要的基本的矛盾，革命就将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由于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和日益增长，这就使革命由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得到强有力的保证。所以，中国新式的特殊的民主主义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而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随意的设想，而是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6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1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13页。

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

在指导中国革命沿着历史必由之路前进的斗争中，正确认识和把握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是反动派及其豢养的代表人物故意制造混乱，他们或者重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老调，鼓吹民主革命要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恶意曲解、攻击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目的是破坏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维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而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内一些犯有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他们有的脱离中国和世界革命发展的实际，教条式地搬取旧式民主主义革命的老章程，割裂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有机联系，在两者之间横插了一个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忽视了民主革命阶段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这个根本任务；他们有的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要搞所谓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扩大了革命的打击对象，造成了革命阵线的混乱，实际上放弃了为实现民主革命的努力。这两种错误倾向，都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就是在同这些错误的有害的思想和主张作斗争，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逐步认识和处理这个问题的。他认为，革命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各个阶段所要解决的矛盾不同，不能搞什么“毕其功于一役”。中国革命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① 但是，革命的发展阶段又是整个革命过程的有机构成部分，它们之间是互相衔接、互相渗透的，不能截然

① 《毛泽东选集》第961页。

分开，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必然继续和发展。中国的新式的民主革命，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另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①

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民主革命行动纲领的实践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是又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②它必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管反共分子如何叫骂，不管革命进程要经历何种艰难曲折，这个历史的规律是不可移易的。

毛泽东指出，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但是要实现这个最后目标，必须按照实际发展的过程一步一步进行，民主革命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时，既要看到当前现实的任务、目标，又要看到这个目标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总目标、总任务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自觉地进行努力。

共产党人还要认识到，在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时，不论是哪个革命阶段，都必须是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毛泽东指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

① 《毛泽东选集》第61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46、647页。

利。”①但是必须注意，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思想和在这个思想体系指导下根据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行动纲领、政策，以及为实行这些纲领、政策的实践活动，是有区别的。比如民主革命的行动纲领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具体分析中国社会矛盾、阶级关系而制定的，它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一般的反对资本主义，不能因为上述纲领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而把两者混在一起，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上去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行动纲领和共产主义指导思想，这两者是有联系的，但是又是有区别的，只有正确地处理这个关系，才能在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只有走历史的必由之路，它的前途才是光明的。但是，中国社会的矛盾斗争是复杂的，革命的敌人是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的，中国革命存在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一个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并创造条件进而到达社会主义社会，把旧中国变成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一个是保持或实际上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状态。一个是光明的新中国，一个是黑暗的旧中国。“中国向何处去？”回答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向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前进。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从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争取光明的前途是更有希望的，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但是，这个光明的前途的实现，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毛泽东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能够担负的”，②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这是长期革命实践已

① 《毛泽东选集》第66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14—615页。

经做出的结论。

在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上，毛泽东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对人民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具体分析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所处的时代矛盾的特殊性质，辩证地分析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从而概括、引申出中国革命的逻辑，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性，为我们树立了实际运用辩证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光辉范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里只简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几个主要问题。诚然，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某些具体结论，已经起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但是，贯串在整个革命论中的基本的立场、观点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即实际运用的辩证法，以及其中所揭示的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性，却仍然有着它的重要的现实的意义。认真学习和总结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中所实际运用的辩证法，并应用它来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问题，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学习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体会

马　鸣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极丰富的辩证法的内容。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毛泽东同志“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武装斗争的过程中，不仅指引我们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并且以他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思想，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毛泽东同志总结实践斗争所写出的军事著作，是我们今天学习唯物辩证法极好的教科书。本文拟就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作一些初步的探讨，谈一点自己学习的粗浅体会。

一

列宁曾经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①又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的矛盾。”②战争问题是在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78页。

敌我双方之间进行的，它本身就充满着矛盾，充满着辩证法。在军事领域中存在着许多对立的范畴，如敌方与我方，武器与人，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战略与战术，全局和局部，内线和外线，进攻和防御，持久和速决，前进和后退，集中和分散，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计划性和灵活性，运动战和阵地战，正规战和游击战，歼灭战和消耗战，胜利和失败……等等。这些对立的范畴，我们把它联系起来考察，分析它们的相互联系及其运动变化的状况，这就是辩证法。列宁说："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①恩格斯说："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②为什么会发生运动和变化，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对联结着的矛盾，矛盾的联系和斗争，推动了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产生和消失。所以，研究战争问题的各个范畴和规律，是不能不充满辩证法的内容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刻地阐明了军事领域的辩证规律。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个辩证法的思想基础之上的，是军事辩证法在战略战术上的杰出运用与体现。

中国的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除了极个别的时期（如抗日战争后期的战略反攻阶段和解放战争后期的战略反攻阶段）以外，都是处在敌强我弱的状态，这就特别需要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既定的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积极性，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这就特别需要正确分析敌我双方的联系及其变化，特别需要正确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的指导。

任何军事家都懂得，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和消灭敌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人。但是如何才能够达到既消灭敌人又保存自己呢？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这是战争本身包含的一对矛盾，二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即相反相成。在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既要战争，就不能不付出代价。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战争中，只有勇敢战斗，不怕牺牲，才能消灭敌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部分的暂时的牺牲，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以，勇敢牺牲不但是消灭敌人所必要，也是为保存自己所必要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这一对矛盾的辩证关系。

革命战争，总的说是以进攻消灭敌人为目的的战争。因此，是否说革命战争就只有进攻而没有退却呢？当革命力量还很弱小，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如果只是一味的进攻，岂非是自找失败，又怎么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呢？所以进攻与退却，又是一对矛盾，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① 军事冒险主义者只要进攻，反对退却，事实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全面出击"，"不打烂坛坛罐罐"等作战方针，都是主观主义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与农民保守主义的表现。他们不懂得"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个辩证法的道理，不懂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一辩证原则的灵活运用。急性病与保守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他们只知局部，不看全局，也看不到一事物和它事物的联系，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结合起来，把部分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懂得革命的辩证法。

① 《毛泽东选集》第187页。

革命战争是为人民求翻身解放的战争，当然是愈快愈早地取得胜利愈好。但是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要求很快地取得胜利却是脱离实际的。因为反动势力雄厚，敌强我弱。革命力量要有一个逐渐生长、积累和发展的过程；消灭敌人也有一个一口一口地吃掉的过程，这就决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提出“速决”、“速胜”是要吃亏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①因为它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这就提出了“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与战斗上的速决战”的基本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这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②战略的持久和战役与战斗的速决，这又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为什么在战略上必须是持久战，这在上面已经讲过了。至于战役与战斗的速决战，这是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有此要求，都是相同的。而对于处于劣势的红军和中国抗日军队来说就尤为重要。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持久拚消耗就必然失败；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有一支部队，要打破敌人一次“围剿”就要准备迅速连续作战，如旷日持久打下去，战役、战斗都会失败；第三，白军虽各路分进，但比较密集，如不迅速打破一路，各个击破，红军就要吃亏。这是毛泽东同志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具体分析基础上，辩证地运用持久与速决这一对矛盾的最好典范。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毛泽东同志提出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指导思想，给这个问题以辩证的解决。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以一当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以十当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使我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敌人则由大到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17页。

小，由强变弱，使矛盾双方发生各向其对立面转化。列宁说：没有任何一种对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①这里的关键是要创造一定的条件，即主观指导的正确和适当的战略战术，使主观指导符合于客观的实际。从整个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来说，由于敌强我弱的基本状况没有改变。因此，在全局上，我在战略上总是处于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敌则采取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而在局部上，即在战役和战斗中，我则采取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样就迫使敌人在战役和战斗中不得不变成内线的防御。在局部战场上，使敌人由强者变成弱者，由优势变为劣势，由主动变为被动；而我则反之，集中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就可以转化为全局的优势和主动。在这一个总的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包含了一系列的对立的范畴，即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全局和局部，战略和战术，进攻和防御，内线和外线，持久和速决等等，毛泽东同志对这些问题都作了完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的解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战略的持久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略的防御和战役战斗的进攻；战略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思想，以及运动战、游击战等作战方针，这是我军在作战中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坚持持久战和最后战胜敌人之最有效的方针。而作战的基本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它的基本特点是进攻性和流动性。“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凡遇不好打的敌人，就走。要大踏步的前进，大踏步的后退；迅速的集中，迅速的分散。一切“走”都是为了“打”。“走”是手段，“打”是目的。游而不击，就失去了游击队存在的意义。既反对“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又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0页。

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①这些都生动地阐明了运动中的“打”和“走”，进和退的辩证关系。逃跑主义和拚命主义，是不懂得这个辩证法的关系的。

在这样的作战方针的指导下，必然要出现“围剿”和反围剿，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形势；必然要出现“围剿”中的围剿，包围中的包围这样错综复杂、犬牙交错的形态。以我对敌的围剿粉碎敌对我之“围剿”，以我对敌之包围反对敌对我之包围，这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从十年内战时期来说，是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我进行反围剿作战，选择敌人数路进攻部队中的一个薄弱部分，聚而歼之，通过“围剿”中的围剿，最后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抗日战争中，敌人对我发动全面进攻，从全国战场来说，敌对我形成一个外线包围的作战形态，这是敌对我的第一种包围。但由于我以优势兵力对敌人分路向我进攻采取战役或战斗的外线作战方针，使敌之每一股兵员都处于我军包围之中，这是我对敌之第一种反包围。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来说，我之每一根据地都处于敌之三面或四面包围之中，这是敌对我的第二种包围。但若将我之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把敌后根据地与正规军战线联系起来看，则敌之占领城市与交通线又处于我的第二个反包围之中。再从国际战略局势来看，以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先处于敌之包围之中。而当我建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以后，又使敌处于我的第三个反包围之中，最后必然陷于灭顶之灾。毛泽东同志说：“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②这虽然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开始只有十个月的时间说的话，但后来事态的发展就是完全按照毛泽东同志

① 《毛泽东选集》第46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41页。

的科学预见实现的，从而说明了科学辩证法的巨大威力，说明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创造性地灵活运用了这一系列的辩证关系和方法于战略战术之中，不断引导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二

毛泽东同志不仅把辩证法用来解决战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而且把辩证法用之于认识论，解决了认识战争和研究战争的方法论问题。

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①在战争问题上，"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②这就首先提出了一个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如何统一的问题。这既是认识论的问题，又是辩证法的问题。列宁说过："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③。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正是运用辩证法于认识论的光辉典范。他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成为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55、163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714页。

体。”①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② 如何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统一的问题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解决主客观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实践。对战争来说就是战争的实践。毛泽东同志指出：“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③ 又说：“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④，这是解决战争中的主客观矛盾的根本途径。

那末，如何探索战争的规律呢？毛泽东同志首先把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运用于认识论。他指出，我们不仅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我们不仅要研究一般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要研究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我们不仅要研究中国过去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而且要研究更加特殊的当前特定条件下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因为不同条件下的战争规律都带有不同的特点。这里不仅提出了革命战争和一般的战争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规律，而且指出了中国特定条件下的革命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于是他的结论是：“战争的情况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⑤ 毛泽东同志明确告诉我们，一般的战争指导规律，是前人的许多具体的实际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经验当然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但是在运用这些一般的战争指导规律于我们中国特定的革命战争的时候，又必须从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战争的特点出发，寻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的规律。我们更应该重视我们自己的流血牺牲所获得的经验。这

①②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165—166、163、165、16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57页。

就是说，从认识的秩序来说，总是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但是，就特殊和一般这一对矛盾来说，在特殊里包含着一般，一般是通过特殊体现的，但特殊又不等同于一般。因此，在用一般指导特殊的时候，又必须根据客观实际，使一般的原则和特殊的情况相结合。人们就是通过对一般和特殊相结合情况的总结，不仅检验一般，而且发展了一般。人们的认识就是在不断地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的不断循环无限往复中前进的。毛泽东同志批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机械论者，这种机械论的特点就是不能正确理解特殊和一般的辩证关系。它既包括教条主义的机械论，又包括经验主义的机械论。前者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即只懂得一般而忽视了特殊，结果使主观脱离了客观，给中国革命战争造成很大的损失；后者固执于自己过去的个别经验，不善于把这些个别的特殊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上升为一般，即只懂得特殊而忽视一般，不能依照革命战争发展的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灵活运用以往的成功经验，同样脱离了变化发展了的情况，犯了主观脱离客观的错误。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为其特点的，都割裂了个别与一般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经验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教条主义。

在探索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的时候，毛泽东同志除了提出以特殊和一般这一对范畴作为认识指导规律外，还提出了以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来解决认识战争客观规律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

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不仅担负全局性指挥任务的指挥员必须具备全局性的战略思想，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就是担负局部性指挥任务的指挥员，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战略上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懂得全局的部署，才能更好地自觉地完成局部的任务。所以，弄清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是探讨军事规律的指挥员必须弄清的认识论问题。因为只有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才能更好地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全局由每一个局部构成，局部是隶属于全局的。因此，局部必须服从全局。某些在局部看来是可行的东西，如果对全局不利，就要暂时牺牲局部，服从全局。这就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必须首先树立全局观点，照顾全局。战争问题更应该如此。但是，全局也不能脱离局部而存在，离开了局部也就无所谓全局。在战争问题上，某些局部的失败，全局可以不受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这个局部对全局不起决定意义；但对于全局起决定意义的局部的失败，就可能使整个全局发生变化。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因此，在全局思想指导下，又不能忽视每一个局部。这种对局部的注意，反过来也是为了照顾全局。这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不仅战略与战役的关系如此，战役与战斗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与营团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也无不如此。这就要求每一个指挥人员除了认真研究每一个战役和战斗的客观规律之外，还要认真探索全局性的战争客观规律，必须树立全局的观点以及把注意力放在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方面。

但是，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①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认识战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161页，

客观规律是一个需要由感性认识经过思索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中，深刻地阐明了由感性到理性，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规律。他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①又说："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②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不仅讲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军事计划要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感性认识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等等问题；而且还阐明了认识必须回到实践中去，用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认识与发展认识等问题，深刻地阐明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

最后，毛泽东同志还谈到了知和不知的辩证关系。他指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63—1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64页。

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有所谓“盖然性”。但是，“战争不是神物”，它的规律毕竟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被我们所认识和掌握的。毛泽东同志说：“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①也就是说，其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从不知到知，是可以转化的。重要的问题是要善于学习，要有决心而已。正是在毛泽东同志这些光辉的辩证法思想指引下，在我们中国革命的长期武装斗争实践中，锻炼出了许多身经百战，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他们掌握了中国革命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客观规律，为我们赢得了民主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

三

由于中国革命战争很长一个时期都是在敌强我弱，甚至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在承认这一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如何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促使矛盾双方各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以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这里首先碰到的是人和物的关系，即对武器和人的关系的认识问题。“唯武器论”者偏面夸大武器的作用，见物不见人，这是一种战争问题上的机械唯物论；与此相反，另一种“精神万能论”者又偏面强调人的精神的作用，看不到武器与其他物质条件的重要作用，单纯强调勇敢，以为单凭勇敢就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这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这两种观点当然都是错误的。抗日战争初期的“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不能不说与这两种观点是有关系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我

① 《毛泽东选集》第165页。

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因为“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①这就正确地解决了战争中人和物的关系问题，既同唯心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机械唯物论划清了界限，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在客观规律与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②又说：“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③在中国的长期革命战争过程中，由于敌强我弱的状况没有改变，因此在全局上我总是较长期地处于劣势与被动的地位。但是，能否摆脱这种劣势和被动，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即在战役和战斗中以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取得主动，使敌人局部地陷入被动。通过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转变为全局的优势和主动。不论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以后又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无不是这种能动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作周密的调查研究，正确的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积

① 《毛泽东选集》第437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45—446、458页。

极工作，努力作战，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战役和战斗，多打胜仗，积小胜为大胜，化被动为主动，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和战斗上的优势；通过这许多主观上的努力，最后取得战略的优势和主动，以至最后消灭敌人，把侵略者赶出去，保卫祖国的独立和尊严。

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计划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问题，科学地解决了计划性与灵活性的辩证关系。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在周密调查侦察的前提下，每一个战役与战斗的部署，都应该有周密的作战计划，有科学的指导原则与指导思想。如解放战争中期，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十大军事原则。每周消灭敌人多少个旅，毛泽东同志都制订了计划。但是，在具体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特别强调了灵活性。因为无论事先制订的计划如何科学与周密，由于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因此，必须赋予战役与战斗的指挥员以极大的机动权。刘伯承同志在谈到自己的体会时，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特别重视"机动"二字。他说："宽大机动，创造或寻求敌人的弱点，并抓住他们的弱点，给以有计划的突然的袭击，是把握主动和战胜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又说："在战术上通常是：攻弱，则强者也弱；攻强，则弱者也强。故在兵力运用上，我们应以少数兵力钳制其他方面，借此腾出数量和质量都强的部队，攻击敌人最弱的地方。""以弱耗强，以强灭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这就是说，拿我们的弱的部队去消耗敌人强的部队，为的是拿我们强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弱的部队；拿分散的部队去消耗敌人集结的部队，为的是拿我们集结的部队来消灭敌人分散的部队。"① 这是刘伯承同志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如何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克敌制胜的最好的说明。把计划

① 《刘伯承用兵录》，转引自李达《谈刘伯承用兵》。

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总起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极其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的宝库，是辩证法思想在军事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的光辉的典范。本文所谈到的只能是挂一漏万，许多丰富的思想是需要我们继续学习与挖掘的。在今天，我国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学习与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这对我们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胜利，将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一个范例

——从“毛粒子”说起

林 可 济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表现在许多方面。本文不拟全面论述，仅就基本粒子研究的某些侧面，谈一点初步的看法。

一

物质结构的问题，是个古老而又年青的课题。说它古老，因为早在古代就有着物质无限可分（如《庄子·天下篇》中关于“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说法）和物质存在着最小的、不可以再分的始原（如古代的原子论①）的两种不同的看法；说它年青，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在突破了原子和原子核这两个层次之后，目前物理学家在继续研究基本粒子中强子结构的同时，又把夸克和轻子的结构问题提到了自己研究的日程上来。因此，物质结构问题，成为自然科学理论中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之

① 原子这个词就其希腊字源来说，就是不可分割的意思。我国最初曾译为“莫破质点”。

一，也是当前理论自然科学中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的一个前沿。

十九世纪，正当道尔顿所确立的科学原子论在科学界为人们普遍接受，同时原子不可再分的观点也占据着统治地位时，恩格斯就提出了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恩格斯在一八六六年一月四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早就预言："原子理论已经被引向这样一个极端，以至于它不久必定要破产。"① 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原子论的破产，当然不是指原子论所揭示的科学内容，而是指那种把原子看作不可分的形而上学观念。一八六七年六月十六日，他在致马克思的信中，更明确地指出："作为物质的能独立存在的最小部分的分子"，"是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一个'关节点'，它并不结束这个系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不仅如此，"从前被描写成可分性的极限的原子，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关系"②。一八八五年，他在《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的无限的原型》的札记中，又进一步指出："原子决不能被看作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的实物粒子。"③ 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恩格斯的科学预言：不仅原子是可分的，连原子核也是可分的。同样的，早在本世纪初，当粒子物理学还远没有诞生的时候，列宁就曾经预言："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它无限地存在着。"④ 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观点，闪烁着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光辉，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结构的基本观点。

原子可分，原子核可分，这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已经是被实验证实了的科学结论。那么，组成原子和原子核的基本粒子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9页。

③ 同上书，第20卷，第614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268页。

⑤ "基本粒子"最初是作为组成原子的三要素——电子、质子、中子的通称而被采用的。

是否可分呢？这个问题又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基本粒子这个名称也同“原子”一样，包含有达到了物质结构的最底层次、从此不可再分的含义。本世纪的五十、甚至六十年代，在国际上，虽然绝大多数的物理学家都是这样看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并不这样。早在一九五五年，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基本粒子”不是基本的，也是无限可分的。①

同毛泽东同志的观点相类似，日本的著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也不赞成把基本粒子当作物质的始原的观点。一九五五年，他遵循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并且根据当时实验上总结出来的强相互作用粒子的经验规律性，提出了强相互作用的复合模型。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坂田模型”。坂田认为，所有参加强相互作用②的粒子（强子），都可以看作是由P（质子）、n（中子）、Λ（超子）三种粒子及其反粒子所构成，这就好象一九三一年发现所有的原子都是由P、n、e（电子）所构成的一样。因此，P、n、Λ被称为“基础粒子”，而其他的强子③则是“复合粒子”，因为它们都是由“基础粒子”复合而成的。例如，Σ^+粒子，就可以看成是由一个质子（P）、一个反中子（$\bar{n}$）及一个Λ超子复合而成的。

---

① 参看张文裕：《由“毛粒子”想到的》，载1978年9月18日《北京日报》。

②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比较熟悉的物体之间的作用力有万有引力和电磁力。但是，自然界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止这两种。在粒子之间还存在着两种新型的作用，一种是比电磁作用强百倍的强作用；一种是比电磁作用弱亿倍的弱作用。强作用的范围是10^{-13}厘米，弱作用的范围更小，只有10^{-15}厘米。我们日常见到的两个物体即使挨得再紧，距离也比10^{-13}厘米大百万倍、千万倍以上，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根本无法觉察到这两种作用。

③ 具有强作用的粒子，称为强子，占已发现的基本粒子中的百分之九十五。强子可分介子、重子两类。

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坂田这种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所取得的科学成就①，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同志在同几位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以及召见北京科学讨论会的一些科学家时，先后反复阐明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而且称赞坂田的工作。②一九六五年六月，《红旗》杂志刊登了坂田题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的文章，并根据毛泽东同志几次谈话的精神，写了编者按。指出：“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是充满着矛盾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一个事物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事物是不可分的。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自然界是如此，社会是如此，人类的认识也是如此。否认这一点，就是形而上学。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地证实着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宇宙，从大的方面说，在太阳系外面还有千千万万个太阳，在银河系外面还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它是无穷无尽的。宇宙，从小的方面说，也是无穷无尽的。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它们是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分为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质子又有和反质子的对立的统一。中子又有和反中子的对立的统一。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等等，这些基本粒子还是可分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人类

---

① 坂田是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的。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听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内容。一九二九年，他阅读了这部名著，还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说，恩格斯、列宁的有关教导，“确实鼓励了我，使我敢于同把基本粒子当作物质的始原的观点相抗衡，集中力量以物质的层次的观点来研究复合模型”。坂田对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十分钦佩，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经过中国革命考验的卓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科学研究也必然是强有力的武器”。（参看坂田昌一：《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三联书店 1973年第2版，第6——8页）

② 参看周培源：《毛主席的教导永远铭刻在心中》，载1976年9月18日《光明日报》）；龚育之：《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第6页。

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样是无穷无尽的。人类的认识总是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创造。在人们追求物质结构的真理的过程中，每深入一步，都有人中途停顿下来，认为已经达到‘物质的始原’，认为这种‘物质的始原’再不可分了，再不包含内在的矛盾了，企图完成所谓最终的理论。自然科学的历史无情地嘲弄着这样的形而上学者们，越来越清楚地揭示出自然界固有的辩证法。”①这篇按语从发表到现在，虽然将近二十年了。但今天我们读后仍然感到有极大的教益。因为它所表达的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结构问题的精辟论述，继承与发展了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光辉思想，为基本粒子物理学的研究工作，指明了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当然，坂田模型并不是尽善尽美的②，科学总要不断地前进。在这个模型提出之后，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和乔治·兹韦格在一九六四年提出了有关强子结构的“夸克模型”③。盖尔曼认为，所有强子都是由三种带有分数电荷的夸克粒子：上夸克(u)、下夸克（d）、奇夸克（s）所构成。④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我国高能物理工作者在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无限可分、基本

---

① 《红旗》杂志，1965年第6期

② 坂田模型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实际上，质子、中子、Λ超子都是同级的，它们都是属于同一层次的东西。因此，这些模型不能完满地解释各种实验事实，从而无法真正揭示出粒子更深一层次的秘密。

③ 夸克，英文原文为“quark”。这是一个早已废弃的古代象声词，意为神鸟的叫声。盖尔曼借用詹姆士·乔埃斯所著《芬尼根的彻夜祭》中的一行诗“为检阅者似的马克王，叫三声夸克！”取了这个古怪名称。

④ u是“上”（up）的意思，d是“下”（down）的意思，s是“奇异”（strange）的意思。在一些文献中，人们常把夸克的基本三重态（u，d，s和$\bar{u}$，$\bar{d}$，$\bar{s}$）的不同比作“味道”的不同。当然并不是说夸克真有什么“味道”，而只是说有三种不同的夸克。这里的三种“味道”与诗中的“三声夸克”，刚好都是三，这也是盖尔曼所以借用夸克这个名称的原因吧！

粒子也是可分的哲学思想的指引下，批判了当时国际上流行的基本粒子不可再分的错误观点，提出了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所谓“层子”，就是组成强子的更深一个层次的东西。取名“层子”，意在强调它属于物质无限可分长程中的某一层次，层子本身仍然是无限可分的。层子模型认为，可能是由三个层子构成强子，三个层子的电荷分别为$\frac{2}{3}$e、$-\frac{1}{3}$e、$-\frac{1}{3}$e。强子分为重子与介子两大类。所有重子是由三个层子组成，反重子是由三个反层子组成；所有介子是由层子与反层子组成。利用这个模型来解释重子、介子的电磁性质、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的过程，大部分结果与实验符合得较好。

事实上，在近二十年来，由于加速器能量和探测器性能的突飞猛进，科学家们在实验中逐步发现强子确实是有内部结构的。实验表明，强子不是一个没有大小的数学点，而是有一定的大小①；强子间具有一定的对称性，并有类似元素的“周期表”，这表示它们是有内在联系的②；用电子或中微子去轰击核子，都显示出核子的电荷和弱荷集中在三个小点粒上，这些点粒子的半径都相当于核子半径的十分之一。

实验的事实，不仅越来越明显地揭示出强子是有内部结构的，而且也推动着基本粒子理论的不断发展。一九七四年底，在基本物理学界，发生了一件轰动全世界的大事：美国的两个实验室同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新粒子，丁肇中小组把它叫做J粒子，里希特小组把它叫做Ψ粒子。（现在人们通常叫它作J/Ψ粒子；

---

① 霍夫斯塔特的电子——质子散射实验，探测出质子电荷分布在半径为0.8×10^{-13}cm的球体内，后来测得中子的电磁半径也为0.8×10^{-13}cm，介子的半径为0.067×10^{-13}cm。

② 我们已经知道，元素周期律是原子核外的电子的周期性排列的结果，是原子具有内部结构的反映。同样，人们设想：强子所表现出的系统性和规律，为什么不能暗示着强子的内部结构呢？

这是一个介子。）为了解释J/Ψ粒子的质量重和寿命长的矛盾，又引进了一个新的量子数（粲数）和新的夸克（粲夸克①，记为C）。一九七七年，列德曼又发现了比J/Ψ粒子重三倍的γ粒子，又引进了底夸克②（b）。理论预测，还可能有顶夸克③（t）。同时，为了解决自旋与统计的矛盾，还引入了“颜色”④这一量子数，认为每种“味道”的夸克有三种基色，反夸克有三种补色。这样，夸克（包括反夸克）的总数，就达到了三十六个。目前，人们已发现的基本粒子已有三百多种，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基本粒子不基本，它仍然是可分的。夸克模型和层子模型虽然还是科学的假说，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强子内部的结构，较正确地解释和预言了强子的全部量子数，较好地给出了它们内部的规律，同时也与大量的观测实验相吻合。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实验事实以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一九七九年丁肇中所领导的实验组和另外三个实验组，分别观察到末态强子“三喷注”现象⑤，其中一个特别狭窄的强子喷注，在理论上被解释为由一个夸克（或反夸克）直接形成的；另外两个喷注，在理论上被解释为由另一个反夸克（或夸克）和它辐射的胶子直接形成的。人们普遍认为，这不仅是夸克，而且是胶子存在的证据，这就使人们更加相信强子内部是有结构的。

---

① “粲”是英文charm的意思。

② “底”（bottom）夸克，也叫“美丽”（beauty）夸克。

③ “顶”（top）夸克，或叫“真理”（truth）夸克。这只是理论预言，有待于将来的实验检验。

④ 这里所说的“颜色”，不是指夸克真的具有光学上的颜色，而是一种形象化的量子数，正如夸克的“味道”可以用来比喻表征夸克的性质的奇异数、同位旋、自旋、重子数一样。人们通常把红、绿、蓝三色的均匀混合叫做无色或白色。所以，无色的强子是由带色的夸克所组成。目前已发现的强子，都可以认为是三色的均匀混合。

⑤ 参看丁肇中、唐孝威：《发现三喷注现象并验证量子色动力学》，载《世界科学译刊》1980年第1期。

如果说在五十、六十年代，当毛泽东同志提出基本粒子不基本，仍然是可分的观点时，国际上的绝大多数物理学家还不大相信的话。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实验事实的增多和理论研究的进展，越来越多的人都逐步地相信这个观点了。例如，美国科学家温伯格、格拉肖、萨拉姆等人观点的转变，就是很典型、很有说服力的例证。这三位科学家由于在建立弱作用和电磁作用的统一理论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获得一九七九年度诺贝尔奖金的物理奖。他们原来都不相信基本粒子是可分的，但后来都先后改变了看法。①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格拉肖。他公开宣称改变观点是在一九七七年。当时，他明确提出，可能存在着无限多种类的夸克，而且夸克可能是由更基本的东西所构成。② 一九七八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专题会议上，就是他建议，把比夸克更深层次的物质粒子命名为“毛粒子”（“maon”）。一九七九年，他在一次答记者问时说，他之所以建议这样命名，是“因为这与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有联系。按照他的哲学思想，自然界有无限的层次，在这些层次内一个比一个更小的东西无穷地存在着。因此，我想取用他的名字”。此外，他还公开承认他过去认为“夸克的出现将宣告物理学的结束”的提法是不正确的。③ 格拉肖、温伯格和萨拉姆在物质结构观上的这种转变，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我国物理学家认为，和以他们三位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命

---

① 温伯格在一九七八年到我国访问时，还一再明确表示夸克和轻子是点状物，没有结构。但在两年后，即一九八一年，他的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不承认层子和轻子有结构，转而积极致力于夸克——轻子复合模型的研究。萨拉姆在六十年代，对基本粒子结构的观念也是很淡漠的，对我国科学家提出的层子模型，他感到惊讶．几年之后，他也明确指出，还存在着比夸克更基本的东西。

② 我国物理学家也提出了“亚层子”的概念。

③ 参看郭汉英：《粒子物理的新的里程碑》，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4期。

名的GWS弱电统一标准模型相对应，不妨把他们这种在夸克和轻子结构观上的转变，称为"GWS转变"①。

从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基本粒子仍然可分、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和坂田提出强相互作用的复合模型，到六十年代盖尔曼提出夸克模型和我国物理学家提出层子模型，再到七十年的"GWS转变"和"毛粒子"的命名，粒子物理学这三十年来所走过的历程，一方面生动地说明了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现在人们正在探索的不仅是夸克这个层次，而且已经开始把夸克和轻子的内部结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另一方面，还雄辩地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不仅指引了我国物理学家提出了层子模型，而且还指导着人们向比层子更深的层次进军，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得到了国际上物理学家们的公认。

二

我们说夸克模型和层子模型提出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但这并不等于说，问题都已完全解决了。

夸克模型（或层子模型）既有取得成功的一面，但还有存在困难的一面。为了从实验上直接证实夸克（层子）的存在，大体上可以通过三种途径：（1）利用高能加速器寻找；（2）在宇宙线中寻找；（3）在地球上的物质中寻找稳定的夸克(层子)。但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无论用多大能量的加速器②和高能宇宙线轰击强子，从来没有从基本粒子中打出夸克，在地球上的物

① 参看郭汉英：《粒子物理的新的里程碑》，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4期。

② 十多年来，加速器的能量已由当时的650亿电子伏增加到5000亿电子伏，但仍找不到自由夸克。

质中谁也没有发现过自由夸克的独立存在。于是，人们就想：是否夸克仅是一种数学构成，它并不实际存在？然而，如前所述，大量的实验事实又表明，夸克似乎是确实存在着的。这样，充塞在人们心头的疑云逐渐凝聚到一点：是否夸克由某种超乎寻常的强大结合能而被紧紧地胶合在一起，以至它永远被幽禁于强子之中了呢？① “夸克幽禁”之说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为了寻求对“夸克幽禁”之谜的解答，著名学者李政道把极其复杂的真空背景问题和夸克为什么被幽禁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把解决量子色动力学中非阿尔贝尔规范场存在的“红外发散”的数学困难，同解决夸克被永远幽禁的物理困难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他把无限大的真空看作是一种“理想的抗色电介质”，其介电常数K随空间的增大而逐渐趋于零。而强子内部的空间却是有限空间，其介电常数K等于1。因此，夸克要从这个有限的空间中跑出来，就要使K减小而趋于零；而K趋近于零，即意味着能量趋近于无穷大。换句话说，单个夸克永远也跑不出来了。这是李政道对夸克幽禁的物理机制的解释。② 目前国外对于不能得到自由夸克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夸克是很重的，目前已经达到的能量还不够高，因而还不足以把夸克从强子中打出来。另一种较为流行的是一种建立在颜色规范理论基础上，用以描述夸克之间相互作用的新的理论，即量子色动力学。这种理论认为，夸克各自带有色荷，并且由八种特定颜色的胶子将它们粘连成强子。因为一切带“色”的粒子总是粘合在一起，组成无色的复合

① 根据最新加速器实验确定的夸克质量下限已经达到20GeV，而由它们组成的质子质量不到1GeV，π介子质量甚至还不到150MeV。我们知道，原子中电子的结合能是KeV量级，占电子质量的百分之几，原子核中核子的结合能是MeV量级，占核子质量的千分之几到百分之几。现在，作为强子组成部分的夸克的结合能，竟然大到占它的总质量的百分之九十几。（参看陈时：《夸克禁闭》，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79年第2期）

② 李政道：《夸克为什么被幽禁》，载《百科知识》1979年第1期。

粒子。所以，实验上观察到的只是这种无色的东西，而看不到带“色”的粒子本身。由于夸克的色荷在强子中短距离内相互作用的强度很小，所以夸克可以自由行动于强子之内。如果夸克间距离拉长，色荷将随之增加，能量也需相应地增大。而当增大到足以产生夸克对时，原来的一个夸克和新产生的一个反夸克一起形成了一个介子，这时，新产生的夸克又代替原来的夸克留在强子内部。这样，人们就得不到自由的夸克了。

既然夸克被幽禁在强子之内，那么，是否仍然可以说基本粒子不基本、物质无限可分呢？我们认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夸克是否会永远被幽禁以及为什么会被幽禁，这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应该由自然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来解决。至于说是否由于夸克被幽禁因而就推翻了物质无限可分的论断？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两者不能混在一起。

我们认为，如果夸克能从强子内打出来，固然进一步证实物质无限可分，即使夸克永远幽禁在强子之内，也不能否定物质无限可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论断，毛泽东同志关于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论断，仍然是正确的。“夸克幽禁”的现象，并没有推翻而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物质无限可分的原理。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可分”，如何在“可分”的问题上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什么叫做“分”？一般地说，辩证法所讲的“分”，就是指的“一分为二”，说的是任何事物都是对立面的统一体，这些对立面既相互对立，又互相依存。显然，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分”，是就事物内部的矛盾关系而言的。具体到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这个命题中的“分”，是指物质层次结构的不可穷尽性，说的是统一物在其内部结构上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或要素，这些部分或要素均具有自己的特殊的性质，而这些特殊的性质又是

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由此可见，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原理同“一分为二”并不完全等同，它只是后者在物质结构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可分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把某一特定的物质组成部分或要素，通过某种手段，从原来的统一体中分离出去，这固然是可分的一种形式，但这不是唯一的形式。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分既有机械的可分性，也有电磁的可分性，化学的可分性等其他的形式。因此，绝对不能把物质可分性等同于物质的量的分割。否则，那就会离开辩证法，而陷入机械论。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还必须指出的是，可分性也不是只能越分越小，越分越轻，也有越分越多，越分越重的。例如，从氦核分出来的两个质子，都比原来的氦原子大。这是因为从氦核分出来的质子已经从束缚态转化为自由态，所以，它们的体积不是变小而是变大了。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句话对不对呢？我们认为，它又对又不对。就它肯定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而言，它是对的；但就它把分的形式仅仅作机械论的理解这一点来说，它就不对了。把无限可分仅仅从量的分割方面去理解，认为无限可分就是无限地、单纯地重复某一特定的分的形式，这是黑格尔和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消极的无限”，“恶的无限”。这种无限分割的观点，不是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事实上，一尺之棰，如果真的仅用机械的方法而“日取其半”，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当我们分到第十天时，它将只剩下一千零二十四分之一。这已是非常薄的木片了，但还保持木的性质，还不能算质变。如果再继续分下去，当分到第三十天时，剩下的就只有十亿分之一尺。这时，就不再是木头了，就不能再用机械的方法来分割了。

① 木头是由纤维素构成的，纤维素的最小单位是纤维素分子。纤维素分子是非常长的链所组成的，每一个环节的大小大致是十亿分之二尺。当分到十亿分之一尺时，就小于纤维素分子长链的单个环节了，当然就不再是纤维素分子了，也再不是木头了。

和机械论所理解的无限分割不同，辩证法所讲的无限可分是和物质的层次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辩证法不能把分只理解为单纯的量的分割，而应理解为量变与质变的统一。恩格斯对这个问题讲得十分清楚。他说："关于物质构造不论采取什么观点，下面这一点是非常肯定的：物质是按质量的相对的大小分成一系列较大的、容易分清的组，使每一组的各个组成部分互相间在质量方面都具有确定的、有限的比值，但对于邻近的组的各个组成部分则具有在数学意义下的无限大或无限小的比值。可见的恒星系，太阳系，地球上的物体，分子和原子，最后是以太粒子，都各自形成这样的一组。"① 他又说："各个不同阶段的各个非连续的部分（以太原子、化学原子、物体、天体）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质的**存在形式"②。在恩格斯看来，物质具有无限多的层次，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质。因此，我们不能离开物质的层次结构，来抽象地谈论可分性。

再以刚才所讲的一尺之棰的例子来说，当分到第三十天，被分的棰已经发生了质变了，从原来是木头变成不是木头了。这就是说，当物质的分割达到分子时，就到了一个质的关节点。如果再分下去，就会使分子分解为组成它的各种原子。但是，原子不是"半个"分子，它是同分子有质的区别的。同样的道理，如果对原子再分下去，它就会被分解为电子和原子核，而电子和原子核也都不是"半个"原子，它们同原子也有质的区别。③ 可见，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4页。

② 同上书，第637页。

③ 世界上不存在"半个分子"，也不存在"半个原子"。原子是由一个原子核与若干电子所组成。原子核的半径还不到原子半径的万分之一，电子就更小了。对原子进行一半对一半的分法是不可能的。原子核固然可以再分，但也分不了几次。即使自然界里最重的原子核U238——铀的一种同位素，也不过是92个质子和146个中子所组成。分到了质子与中子以后，该怎么办呢？

木头分子、原子、电子与原子核等，这些不同的层次结构，都是有不同的质的。各个层次都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节点。相对于某一个特定的层次来说，可分是有限的，超出这个层次，就不可分了；但就各个层次的相互联系的总体来说，可分又是无限的了。如果只讲量变而不讲质变，就会得出可分有限的观点；只有既讲量变又讲质变，才能得出无限可分的正确结论。正如无限是寓于有限之中一样，辩证唯物主义所讲的无限可分是包含有在某一特定层次内可分是有限这个意思的。

既然在每一个层次中，物质有各自不同的质，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在各个不同的层次中，分的形式也会有所不同。毛泽东同志说："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①这就是说，一分为二，物质的无限可分性，这是矛盾的普遍性，是绝对的；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结构层次的物质将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来分，这是矛盾的特殊性，是相对的。

拿上述这些观点来考察"夸克幽禁"的现象，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夸克能够单独分离出来，那固然是"分"的一种形式；如果夸克永远被幽禁在强子内部，这也是"分"的一种形式。因为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说明强子是有结构的，也就是说，强子是可分的，基本粒子不是基本的。既然宏观物体分为分子的形式，可以不同于微观粒子中分子分为原子、原子分为电子与原子核的形式，为什么强子分为夸克（层子）的形式不能有自己新的、特有的形式呢？既然无限可分的过程，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那么，伴随着新的物质层次的发现，为什么不允许新的微观粒子有自己新的运动规律呢？

总之，为了正确地认识"夸克幽禁"问题，我们必须把物质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6页。

的无限可分与物质的层次结构联系起来考虑，把层次看作从量变到质变的关节点，承认不同的层次具有“分”的不同的形式。一句话，必须坚持“分”的辩证法观，反对“分”的形而上学观。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作为揭示基本粒子结构的“夸克模型”，不过是人们认识物质层次的无限系列中的一个“关节点”，而不会由于“夸克幽禁”的现象，而怀疑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原理了。

本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无限可分、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观点，对于粒子物理学研究的指导意义。这部分又针对“夸克幽禁”问题，指出应该用辩证法的观点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理解物质可分性。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指导了粒子物理学的研究；反过来，粒子物理学领域出现的新发现、新规律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密切联系的生动表现。

物理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在五十年前，当时人们曾经困惑于原子核外的电子为什么不会掉进原子核里去。为了解决这种困惑，人们研究了原子的“分”的新形式和新规律，从而导致玻尔原子模型的产生，并且使经典物理学发展到量子物理学，实现了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困惑：夸克为什么释放不出来？只要我们能用物质无限可分的辩证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可以预料，在解决这个困惑的过程中，必然也将会导致物理学的一次新的重大突破。换句话说，“夸克幽禁”的现象并没有、也不会推翻物质无限可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反地，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我们必将在解决夸克幽禁的难题中把物理学和整个自然科学向前推进一大步！如果说，十九世纪时恩格斯关于原子不是最小的实物粒子的论断，和二十世纪初列宁关于电子也

是不可穷尽的预言，对于人们突破原子和原子核这两个层次，已经起着不容置疑的指导作用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六十年代所提出的基本粒子不基本，基本粒子仍然是可分的观点，对于人们突破基本粒子以及它的下一个层次的伟大进军中所起的指导作用必将随着粒子物理学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

毛泽东关于全面性的哲学思想

陈　军

毛泽东关于全面性的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历史证明，坚持和运用全面性的思想，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伟大的胜利；忽视或抛弃全面性的哲学思想，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我国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历史时期，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关于全面性的思想，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全面性思想的客观根据

全面性思想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指出：全面性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①列宁指出：“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②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面性思想，强调指出：“‘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们应该记得他（列宁——引者注）的话。”“运动在发展中……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1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88页。

全面性思想是事物普遍联系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事物的普遍联系是多样性的：有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有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有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有横的联系和纵的联系；有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还有空间联系和时间联系，等等。

第一，客观事物的矛盾就是一种联系。客观事物中对立的双方，依一定条件，一方面互相排斥、斗争，一方面又互相联系、依赖。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就是矛盾联系。矛盾联系是一种普遍的、直接的联系。毛泽东在论述矛盾联系的普遍性时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①

第二，矛盾的同一性中有联系，斗争性中也有联系。斗争性不是绝对排斥，而是又排斥又联系。毛泽东指出："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②，但是，"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因为互为存在条件。"③

第三，转化也是一种联系。列宁说："通过转化而联系"，"联系也就是转化"④。毛泽东说："事物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互相转化"，"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呢？"⑤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正由于彼此之间存在一条由此达彼的联系桥梁；没有联系，就不会有转化。

---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80、302、302—303页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03页。

第四，时空形式也是一种普遍的联系。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①，"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②。这就是说，时间和空间是事物间联系的表现形式，离开了事物间的联系，就没有时间和空间。毛泽东在其全部著作中，反复强调了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强调了事物的时空联系，指出，必须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时当地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第五，事物间还有通过曲折途径的间接联系。客观世界的联系纵横交错、千姿百态、不拘一格，有的联系已被人类认识，有的联系正在被认识，有的联系尚未被认识。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③。恩格斯所说的"各种物体"、"所有的物质存在"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就是指一切事物的普遍联系。

毛泽东继承恩格斯关于"所有物质存在"都是相互联系的深刻思想，并且更加明确地指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④。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哲学论断。科学的发展充分证明了，不论在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中，"一切客观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在自然界，太阳上的黑子活动与地球上的流行性感冒，两者空间距离一亿五千万公里，发生什么联系呢？科学研究表明，黑子与流感确有相当密切联系。据科学记载，从十八世纪到现在，全世界共发生12次世界性大流感，其中除一八八九年的一次与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88页。

阳黑子活动关系不大外，其余的十一次都和太阳黑子活动密切相关。由于太阳黑子数增多，太阳对地球的紫外线幅射量也大大增加，使流感病毒的突变诱发率增高，容易出现感染力很强的甲型流感新亚型病毒，从而引起世界性流感大流行。这就构成了太阳黑子与全球性流感之间的间接联系。

在社会领域中，也存在许许多多经过“中介”的间接联系。列宁说过：“一个农民在出售谷物时，他就和世界市场上的谷物生产者‘交往’，可是他没有意识这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交换中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关系。”① 这就形成农民——谷物——市场——世界谷物生产者相互联系的社会经济链条。毛泽东指出：“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② 在这里，被压迫民族中的任何阶级、党派或个人，通过反帝斗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之间，形成一条相互联系的社会革命链条。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全面性的思想的客观依据，就是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全面性思想就是人对于客观事物普遍联系（包括矛盾联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间接联系）的全面的认识，以及对各种联系的地位和作用的全面综合和辩证统一。

二　全面性思想的基本内容

全面性思想既然是对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全面认识，而客观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2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632页。

事物普遍联系的形式又是多样性的，那么，全面性原理的基本内容必须是对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基本形态及其运动规律的全面认识。这些基本形态是：1.矛盾群；2.全过程；3.诸方面。

1.矛盾群。矛盾联系是客观事物联系中的最广泛、最普遍的一种联系。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下著名的《矛盾论》，对矛盾联系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矛盾论》指出："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① 在这里，"许多的矛盾"可以简称为多矛盾或矛盾群。

矛盾群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领域中。这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有大量的论述。在自然界中的矛盾群，毛泽东曾举例说，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处不在的。在社会中的矛盾群，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名著中专门阐述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群，指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等等。"② 思维领域中的矛盾群，则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中的矛盾群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毛泽东指出："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③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组成的"概念的矛盾运动"，即是思维领域的矛盾群运动。

全面性思想要求人们全面地把握矛盾群的主要矛盾和其他非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86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364页

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①这就是说，矛盾群中的各个矛盾，其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不是平分秋色，各自为政，而是有主有次，协同动作。在矛盾群中，主要矛盾虽然能“规定或影响”非主要矛盾，但并不能包办代替非主要矛盾。如果只抓主要矛盾，不抓非主要矛盾，无异于一支军队只要主帅不要士兵，只能剩下光杆司令、孤家寡人。长期以来，有些人曲解了“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句话，似乎抓住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就不抓而解了，这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许多著作中，都阐明了同时抓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全面性原则。《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指出：“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②毛泽东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对非主要矛盾也必须逐一地加以解决：“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③全面性思想要求全面认识和把握矛盾群，不仅要求“抓紧”主要矛盾，用主要精力抓主要矛盾，而且要求“同时”抓非主要矛盾，用足够的力量“逐一地将它们解决”。这样，才能在实践中获得成功。

2.全过程。客观世界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人对真理的认识也必须是一个过程。全面性思想要求通过认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来达到把握真理的全面性。恩格斯说：“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④列宁说：辩证法是“反映

① 《毛泽东选集》第2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33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

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①。这里讲的“过程的集合体”和“过程的全面性”，即是全过程。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指出：“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②同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③区分“阶段性”是把握“全过程”的需要，只有划清阶段性，才能全面考察全过程中各发展阶段的矛盾群运动，才能采用“不同质的方法”去解决“不同质的矛盾”④。研究阶段性和把握全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只有把握全过程，才能通观全局，牢牢记住运动的最终目标，保持正确的方向；只有区分阶段性才能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全过程的最终目标。全面性思想要求全过程和阶段性的统一。

譬如，共产主义运动在我国已经经过了民主革命阶段，发展到今天的社会主义阶段，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又可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区分为若干个小阶段。要认识这一运动，首先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把握运动的“全过程”，才能不迷失方向。目前，在我国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时，我们还必须区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认识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阶段中的初级阶段，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只有这种多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和发展，才能繁荣城乡经济，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坚实的基础。

3.诸方面。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

---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12页。

②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289页、第286页。

其发展是不平衡的……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① 全面性思想要求全面地认识和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事物发展中性质的客观变化，因为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地位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②

全面性思想要求人们在观察事物时，全面地考察客观事物矛盾联系的诸方面，把全面性思想贯彻到实际工作中，要求人们既要看到物，也要看到人；既要看到经济，也要看到政治；既要看到技术，也要看到思想；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缺点；既要看到支流，也要看到主流；既要看到顺利，也要看到困难；既要看到前进，也要看到曲折；既要看到斗争，也要看到合作；既要看到历史，也要看到现状；既要看到集体，也要看到个人；等等。毛泽东在长期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政治与技术的统一”、“政治与业务的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批判与继承的统一”、“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等等，都是全面性思想的具体贯彻和生动运用，是中国革命实践的科学结晶，对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仍有重要意义。

全面性思想还要求我们全面认识事物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毛泽东指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97页。

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①动态的全面性是对客观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多样性的全面反映。全面认识“各方面的动态”，把握动态的全面性，对于我们今天在四化建设中制定和修订各部门的计划、方案，搞好国民经济建设的综合平衡，均有指导意义。

全面性的反面是片面性，坚持全面性就必须反对和克服片面性。毛泽东反复地批评了片面性思想，指出：“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②犯有片面性思想错误的人，“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③总之，全面性思想是对矛盾群、全过程、诸方面的全面认识，反对一切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要求我们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一言堂、一边倒、一刀切和一个样”的形而上学片面性的弊病。

三 全面性思想的核心

整体由部分组成，并且大于部分、高于部分、统帅部分。整体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恩格斯说：“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④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使用“总体”、“全体”、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760、287—288、26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6页。

"大局"、"全局"、"战略"、"全局性"、"顾全大局"等等概念和用语，来阐述整体观——全面性思想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认为，"全局高于局部"。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① 这段论述有两个含义：一是说"全局性"、整体性是不同于自然物质的一种抽象的质，即"眼睛看不见"的整体质；二是说全局是由局部组成而又高于局部，即全局是"更高级的东西"。两个含义是一个意思——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简单相加的总和。譬如，一个继电器只不过一个开关，许多继电器堆在仓库里，也不过一堆开关的总和；若是把它们按预定程序巧妙地连接起来——组成计算机系统的整体，则将产生每秒几百万次、几千万次的高超计算功能。再如，同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在旧中国，军阀割踞混战，山河支离破碎，人民颠沛流离，犹如一盘散沙，屡遭外国列强的蹂躏和奴役；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统一祖国大陆，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胜似铜墙铁壁，成为当代世界上鼎足而立的强大力量，任何一个外国列强、超级大国都不敢等闲视之。

毛泽东还认为，整体观具有相对性。比如战争，"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② 并且指出："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③。当

① 《毛泽东选集》第161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59、160页。

然，整体和全局并不排斥部分和局部，相反地，“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①这里深刻阐明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统一关系。全局包括局部，统帅局部，高于局部；局部组成全局，隶属全局，服从全局。掌握全局是为了更好地调配局部，使用局部，使局部在全局中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把握整体观，即是把握事物的“本质”、“内部规律性”。他在《矛盾论》中指出：“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②在《实践论》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必须“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③。系统就是体系，就是整体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各个原理只能从属于整体；不能离开整体，也不能代替整体。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不能只抓住其中的个别原理而不顾及整个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体系就是一个由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共同组成的、有机联系的、关于发展学说的系统整体。辩证法的每一条规律和每一对范畴，都只有放在辩证法总体系的联系中来考察，才能确定其在辩证法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能脱离开系统整体进行孤立的研究和片面的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倘若把对立统一规律片面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忽视甚至否定其他辩证法规律，把对立统一规律当作“唯一”的规律，则必然走向以部分代替整体，以对立统一规律代替辩证法总系统的片面性。理论上的片面性，必然要导致实践中的失误。我国在“三大”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59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286、268页。

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忽视了质量互变规律，只讲质变，强调“质变优于量变”，忽视量变过程，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随意变革生产关系，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总结历史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学习和掌握“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全面性思想的核心——整体观，是划分全面性思想与折衷主义、诡辩论的分水岭。折衷主义和诡辩论，泛谈联系，貌似全面，实际上“东抽一点，西抽一点”，以玩弄事实为“儿戏”，而不顾及客观事物的整体，全面性思想是关于客观事物的矛盾群、全过程、诸方面的全面认识及其辩证统一。统一在什么基点上？就是统一在整体观上。只有把握整体观，抓住整体和本质，才能把全面性思想与折衷主义和诡辩论区别开来。只有把握整体观，才能堵住辩证法“通向诡辩术的桥梁”。

毛泽东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一贯强调整体观的重要性，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①因此，顾全大局是我们处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党中央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整体观原则，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号召全国人民：“牢固地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全国一盘棋”就是整体观。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应用全面性思想及其辩证统一的整体观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成功地制定了各个革命时期的战略和大政方针，指引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并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全面性的原则思想，指出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① 《毛泽东选集》第135页。

上来的战略决策”，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重点，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和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提出“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全面性的要求办事”，在全面分析和把握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任务，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正在指引中国人民去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波浪式发展观及其实践意义

陈 依 元

在长期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始终运用波浪式发展观指导中国革命，在他的著作中包含着丰富的关于波浪式发展的思想，他的波浪式发展观是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丰富和发展。波浪式发展观是与形而上学“直线论”相对立的，在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直线论”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危害。因此，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波浪式发展观，批判“直线论”，沿着十二大指出的方向，朝共产主义稳步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一

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有时将“螺旋式”与“波浪式”在同等意义上使用，但由于后者比前者更通俗具体，更具有灵活性，所以他更多地采用“波浪式”这一说法。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著作，是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法分析和解决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典范。他在文章中谈到合作社要逐步增加一点积累时指出：“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

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①这一段话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生动具体地阐述了波浪式发展观，并且把它看成是辩证法的重要内容，这可以认作是他对波浪式发展观的总的阐述。

波浪式前进运动，既然是事物发展的普遍现象，它就不能不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思维中表现出来。事实上毛泽东同志在这些方面都有生动的阐述。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中，根据敌强我弱等特点，指出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但胜利不会很快到来，战争要经历曲折的道路。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进程就体现为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他说：“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②在战争中，为了取得主动，我们往往有计划地放弃一些地方，不怕打破坛坛罐罐，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③“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④如果只想走笔直的路，就会事与愿违，被迫走更多不必要的弯路。第五次反“围剿”时，“左”倾机会主义者置敌强我弱情况于不顾，片面提出“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一寸土地”的错误方针，结果使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页。

②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180、195、476页。

根据地损失百分之百。在受到挫折后，他们又从一个极端“直线”地跳到另一极端，从“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转为“有退无进”的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致使红军遭受更大损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也有部分同志不愿意走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命令弱小的红军去攻打长沙、武汉等中心城市，试图一夜之间夺取革命胜利，“毕其功于一役”，结果损失严重。事实说明，“直线论”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

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人的认识中的波浪式发展渊源于客观事物的曲折运动。当然，认识的曲折性，还有主观的因素，因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由现象到一级本质，二级本质……，其间经常会发生反复。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提出的认识运动的过程，就呈现出波浪式发展。他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① 从实践到认识，就是列宁说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这是第一次飞跃。从认识到再实践，就是把获得的认识应用和服务于实践，接受实践检验并不断修正、发展的过程，此为第二次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这是认识不断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简单的周而复始。也是通过曲折的道路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还应用波浪式发展观来认识战争的方式和指导方针，指出对它们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往返曲折的过程。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后来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以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73页。

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①接着他进一步对游击主义加以辩证的分析。游击主义一方面表现为“非正规性”，这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但到了红军高级阶段，必须自觉地加以克服，“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但游击主义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运动战的方针，即战略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根据地的流动性等，而这是不能抛弃的。“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②因此要把克服游击主义的消极因素和继承其积极因素统一起来，这就有力地批判了形而上学的直线性观点。

毛泽东同志关于波浪式发展观的论述是很多的，以上所述，难免挂一漏万。但即使如此，也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方面对唯物辩证法所作的贡献。

波浪式发展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那么，为什么许多事物的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呢？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考察：

其一，事物发展的曲折性是由事物发展的内在矛盾性、即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和相互消长的不平衡性决定的。恩格斯指出：“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③由于矛盾双方的不平衡性，事物内部代表新事物的否定因素战胜旧的肯定因素不是一次动作就能完成的，这是前进中出现曲折的最根本原因。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由肯定阶段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15—2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57页。

展到否定阶段，又从否定阶段发展到否定之否定阶段即新的肯定阶段，这就形成了“三个环节两度转折”的有节奏的运动，好似波峰——波谷——波峰。事物内部两方面的斗争有起有伏、有进有退，决定了它的发展不是“径情直遂”的。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由于中日战争双方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抗日战争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的事实，就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证。

其二，事物发展的总的趋势是前进的或上升的。水流千转，终归大海。为什么在波浪式运动中包含着前进或上升呢？这是由事物内部矛盾运动所引起的辩证否定决定的。否定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没有否定就没有发展。连续不断发生的、两度一周期的、包含肯定成分在内的否定，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前进性。新的肯定阶段向原来肯定阶段的“回复”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回复，新的波峰仿佛又回到波峰，但实际上它已前进了一段距离了。例如，毛泽东同志总结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教育，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就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批评是对错误的否定，通过真正善意的、同志式的批评，使被批评者“出一身大汗”以至“恢复健康”，正是为了“治病救人”，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思想斗争过程虽然是曲折的，但曲折中包含有前进。抹煞事物发展的前进上升性，则是“循环论”。

总之，波浪式发展运动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整个世界的运动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不尽波涛滚滚来，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就为我们描绘了这么一幅壮丽图景。

二

探讨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波浪式发展观，全面准确地理解

毛泽东哲学思想，进一步研究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内容及其普遍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在运用波浪式发展观指导中国革命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我们所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壮丽事业，前进道路不会是笔直平坦的，因此更要用波浪式发展观来观察形势、指导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波浪式发展观，对于正确看待我党所犯的错误，正确对待前进中的曲折，坚定信心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向共产主义迈进，都有重大意义。

首先，学习波浪式发展观，必须把科学的预见性、革命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统一起来，坚信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不是循环的和后退的，从而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那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① 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我们既要有明确的方向，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又要审时度势，灵活处置，随时准备走弯路。只想走直路，就会欲速则不达；根据实际情况主动走一些弯路，正是为了早日到达目的地。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③ 我们要学会这种本领，为了更大的胜利而做必要的停顿或让步，发挥策略上的灵活性。波浪式发展观还象望远镜一样，能帮助我们"更上一层楼"，以穷千里目，科学地预见革命的进程，掌握总的发展趋势，并把必要的反复联系于总的进程，当作不可缺乏的一环来看。这就使我们能保持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一步一步地向既定目标前进。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061、503页。

强调科学的预见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在目前特别要看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现在有些同志认为共产主义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即。他们把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割裂开来，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它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是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它一经掌握广大群众，就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而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属于共产主义的低级形态，我们目前从事的革命和建设，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因此都属于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这种实践作为桥梁，我们就可以通过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当然，我们反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直线性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要经过许多代人的持续不懈的奋斗、经过曲折的道路才能实现的。虽然实现这一崇高理想是长期的、艰苦的，但并不渺茫。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变革都经历过迂回曲折，“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①，怎么能要求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应该是笔直而又笔直的呢？在目前宣传十二大精神、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中，学习波浪式发展观，坚持科学的预见性和革命的坚定性的统一，无疑具有特殊意义。

其次，学习波浪式发展观，必须反对急躁冒进情绪，要大力批判和克服形而上学的“直线论”。

所谓“直线论”，就是把发展道路看得笔直而又笔直，将事物的复杂性简单化、发展的反复性单一化，只知直线前进，宁肯碰壁也不肯拐弯。说进攻，就是有进无退；说退却，就是有退无进。这种思想方法完全违背了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固执地坚持这一方法，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毛泽东同志曾对“直线论”进行过严厉的批判，他说：“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22页。

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①，“必要的停顿、间歇、煞车、关闸，是完全应当有的。”②如前所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直线性观点曾给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它又造成了极大危害。例如五八年放“高产卫星”、刮“共产风”、搞“一平二调”，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等等。这实际上是想在社会主义“笔直”大道上“开快车”，其结果适得其反，白白耽误了许多时间。

那么，难道曲折是不可避免的吗？如前所述，一切事物内部斗争的结果，都必然向自已的对立面转化，达到否定阶段，才能进一步发展，这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列宁曾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政治行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还说：“……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③。毛泽东同志也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走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④胡耀邦同志也号召我们以大无畏精神攀登泰山十八盘，登上玉皇顶。他在十二大报告中还指出，我们面前“还有种种障碍和困难”，告诫我们不能“盲目冒进”。在四化建设中，我们既要充分估计到可能出现的曲折和反复，掌握主动权，保持清醒头脑，不为一时曲折所迷惑，做到进退自如。我们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个别企业“关、停、并、转”，削减基建投资，这看起来是“退”，实际上是为了稳步前进。十二大实事求是地提

① 《毛泽东选集》第4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15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85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6页。

出二十年内力争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并在战略布署上分两步走，这也是为了稳步前进。前十年主要是打基础，如果不打好基础，急躁冒进，后十年任务也无法完成，因此必须反对超越阶段去做那些目前做不到的事情。同样，搞经济特区建设，也要稳步前进，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力戒急躁冒进。

再次，学习波浪式发展观，必须善于区分事物本身发展的曲折和人为的反复这两者的界限，提高指挥艺术，避免不必要的曲折和反复。

在社会领域中，曲折性大体上有两种基本情况，一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客观事物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反复；一是主观错误导致的人为的反复，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曲折，必须明确加以区分。我们不能把主观错误带来的人为的反复，视为客观事物本身发展固有的规律性，用以掩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前，在发生人为的挫折后，一些同志往往不认真分析原因，而是美其名曰"交学费"，一时间"交学费"成了逃避责任、替人为错误辩护的遁词。"真正的辩证法并不辩护个人错误，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十分详细研究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形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① 在社会中，这种人为反复与事物自身的反复往往交织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着。如上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包含着"左"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的人为反复，五八年工作中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也属于此类情况。如果我们真正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些曲折本是可以避免或减少的。因此，在学习和应用波浪式发展观时，必须严格区分这两类情况，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提高领导艺术和管理水平，在四化建设中尽量避免人为的曲折和反复，力求把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反复减低到最小程度。使我们社会主义事业健康、顺利地发展。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507页。

学习毛泽东关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论述

姚　安　泽

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①也就是说，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毛泽东哲学认识论思想，正是毛泽东同志在从事和领导气势磅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革命斗争经验的硕果，也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精神的精华。学习、掌握和运用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搞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事业，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一项基本原则。

马克思指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②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地把实践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把共产主义哲学世界观的主要任务规定为改造世界，并称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可见，社会实践是区分新旧哲学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的唯物主义都不懂得社会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离开了社会实践来谈认识问题，把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仅仅看作是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根本不了解主要的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因此它的认识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是机械的、直观的、消极的反映论。唯心主义虽然看到了人的能动性方面，但它也不懂得社会实践的意义，把意识夸大为创造世界的本原。如果谈到实践的话，实践不过仍然是一种精神的活动，因而它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懂得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了哲学的任务是在于“改变世界”，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从而创立了崭新的哲学认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是“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①。

早在一八四五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期，马克思便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②并且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③从而确立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说：“对这些（指不可知论——引者注）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④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思想，提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⑤又说：“我们用来作为认识论的标准的实践应当也包括天文学上的观察、发现等等的实践。”⑥还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

① 《毛泽东选集》第272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⑤⑥ 《列宁选集》第2卷，第142、140页。

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①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系统地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原理，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对实践的明确规定

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关于实践的思想，抓住实践的科学本质，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出发，把实践表述为："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②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这样，才真正地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实践的概念，才使实践具有了科学的规定性，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对实践概念的这种科学规定是跟辩证唯物主义处理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哲学基本问题紧密联系的，因为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的对立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同时又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联系起来。因而，毛泽东同志对实践概念的科学规定是从主观和客观、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中作出的。从毛泽东同志对实践的科学规定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国化的特色。大家知道，在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长期激烈的争论，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对"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例如春秋战国时期，老子便提出所谓"圣人不行而知"，墨子则认为"言（知）足以举行"，荀子也说："行高于知"、"知明而行"。汉朝董仲舒提出所谓"法天之行"的神学知行观，在宋元明时期，朱熹提出所谓"知先行后"，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而明、清之交的王夫之则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3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5页。

提出"知以行为功"、"知行相资以为用"，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又提出了"行先知后"、"知难行易"等等，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哲学，都不能正确解决"行"（实践）的问题，只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才能给予实践以科学的涵义。所以，毛泽东同志对实践的科学规定也是对中国哲学史上关于行与知关系的争论作出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同志除了对实践作出明确的科学规定外，还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阐述了实践的内容，揭示出了实践的基本特性。他说，实践是"变革现实的实践"①，是"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②，"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③。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实践具有下列基本特点：第一、实践是一种客观的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能变革现实，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因为在变革现实的实践中，无论实践的主体（人）和手段（工具等），还是实践的对象（外在世界）和实践的后果，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实践是一种同主观的认识活动相区别的客观活动。第二、由于实践的主体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因而实践本质上是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社会历史性。第三、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具有区别于物的人类特殊的能动性，它能自觉地按照客观世界的规律去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④。社会实践活动是广泛的，活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然而，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有三种，即生产活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4、623、44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60页。

文中，明确提出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活动。①这样，毛泽东同志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实践活动的三种主要形式，并且用下面论断正确地阐明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②这些论述告诉我们：首先，社会实践活动尽管多种多样，但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三项社会实践活动是主要形式。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科学实验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后，在社会大生产有了巨大发展的基础上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项新的实践活动。历史上也还没有一位哲学家对科学实验给予这样高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把它提到三项主要实践活动之一，这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科学实验的重要性将会愈来愈突出。其次，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因为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只有首先解决了吃、穿、住、行的问题，才有可能从事其他活动。所以，把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最基本形式，这是完全科学的。再次，他也充分肯定了其他实践活动形式的存在和相互影响，尤其是肯定了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这种实践活动对其他实践活动的重大影响作用，这也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同志科学地规定实践活动的主要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对于人们正确地开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动具有深远的影响。当前，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实践中，

---

① 参见《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59—260页。

我们要认真地、全面地开展各项实践活动，其中，首要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同时，也要正确处理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

二、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科学论述

翻开整部哲学史，几乎找不到一个哲学家不把自己的学说说成是真理，他们都站在各自的哲学立场上来说明真理标准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始终未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唯心主义者都从精神方面去寻找真理的标准。有的主张用“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有的说“健全理性是真理的一个标准”，有的以“圣人”的说教和“上帝”的启示为标准，有的则以“清楚明白”、“大家公认”作为真理标准，有的又把是否对人“有利”、“有用”捧为标准等等。这些说法虽然不同，但都以精神因素作为真理的标准，换句话说，都是以人的认识来检验真理，即以一种认识检验另一种认识，因而都是错误的。旧唯物主义者虽然坚持了客观真理论，但他们仍然未能科学地回答真理的标准问题。有的认为一切人的“共同经验”、“普遍同意”是真理的标准；有的提出“除了实验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识别错误”；有的甚至能够提出“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等等。对真理标准的这些提法，有的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他们有的仍然以主观认识作为真理标准，因而陷入主观标准论；有的虽然提到以“实验”、“实践”作为标准，却不能科学地理解实践，也不懂得实践形式的多样性，因而他们对真理的标准同样没有得出正确的答案。这主要是由于旧唯物主义者不懂得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才

真正科学地解决了真理标准问题。

马克思在一八四五年就指出，“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列宁进一步指出，“物存在于我们之外。我们的知觉和表象是物的映象。实践检验这些映象，区别它们的真伪”②，而“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③。列宁还非常明确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④。可见，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

毛泽东同志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基本原则，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说：“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⑤又说：“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⑥，“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⑦“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⑧。“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⑨并且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⑩毛泽东同志关于实践标准的这些论述，具有这些新的特色：第一、毛泽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②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107、142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137页。

⑤⑥⑦⑧ 《毛泽东选集》第261、623、825、830页。

⑨ 转引自《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6月2日），《人民日报》1978年6月6日。

⑩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

同志强调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的唯一性，上述所说的"只能"、"只有"、"才是"，都非常明确地阐明了检验真理只有实践这个标准，不能有第二个标准。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更直截了当地指出："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必须"经过实验的考验"，"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①了。当然，毛泽东同志不可能预见到一九七八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但是，他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只有"实践的论断，不能不说是他的理论成熟性、严密性、完整性的表现。这个特色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很有意义的。解放后，曾经有人因为看到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讲到了实践标准不是绝对的，便误认为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实践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相一致的，坚持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才能真正做到始终坚持实践标准。因为只有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坚持实践标准的辩证法，才能既反对把人的思想、认识、理论绝对化的形而上学思想，又能同从当前实践暂时不能证实的问题引出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思想进行无情的斗争。第二、毛泽东同志强调要依据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来检验真理。这样既排除了那些根据一时一事的实践结果作为判定认识的真理性的错误，也排除了那些根据某个片面的实践效果来判定认识的真理性的错误，从而避免了主观片面性。第三、毛泽东同志强调把实践标准广泛地应用于对主观认识领域里的一切方面进行检验，不论对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不论对文艺家的主观愿望或动机，对于任何政党、任何英雄豪杰的思想、理论、计划、意见等等，实践标准都是普

① 参见《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7页。

遍适用的。这样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又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科学理论原则。第四、毛泽东同志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同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观点是相一致的。理论回到实践中去，并接受它的检验，才能证明其是否是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则的要求。因而坚持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所以，在当前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去夺取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胜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严重歪曲和篡改了，他们撇开实践标准，散布什么“语录标准”、“权力标准”等等，把检验真理的标准拖进唯心主义主观标准论的泥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又有些同志鼓吹个人崇拜，提出坚持“两个凡是”，以“两个凡是”作为真理的标准，使实践标准这个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继续陷于混乱之中。直到一九七八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年十二月召开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原则才得以恢复和澄清。这显示出真理的实践标准这个正确理论的伟大生命力。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系统地清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的“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重申以坚持党的领导为中心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国民经济各条战线上采取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措施，并取得重大的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这充分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符合我国客观实际的，是完全正确的，证明党中央执行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证明是否坚持和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

三、对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的科学概括

真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一种正确认识，人类的全部认识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并用它来指导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毛泽东同志关于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论述，正是他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出真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的。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等著作中反复强调，人们的知识都是来源于社会实践，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否认了这一点，“他就不是唯物论者”①。毛泽东同志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②，“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③这里所说的“真知”、“正确思想”指的是一种真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265、264页。

③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5页。

理性的正确认识。从认识的总体说来，要获得真理非得从事社会实践不可。譬如你要获得关于原子的真理，“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创立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真理，“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①等等。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结论性总结中概括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②。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之一。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一项科学理论都是为了适应实践的需要而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③而在讲到欧洲近代哲学思想发展时，他又深刻地指出：“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④。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认识论思想，并且作了进一步发挥。毛泽东同志说：“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⑤并且指出，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那“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73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22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60页。

义的科学。”①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② “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③

毛泽东同志关于通过实践发展真理的论述，是很全面、丰富和深刻的，至少表现为这些方面：第一、明确了真理发展的动因是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客观世界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那种认为真理的发展是人的纯粹思维力量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胡说。这样便把真理的发展的思想牢牢地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第二、强调了真理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实践，特别是生产活动。客观世界的发展永远不会完结，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永远不会完结，人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样，真理就永远处于不断地发展之中。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在于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真理。因此任何所谓“永恒”、“终极”、“顶峰”的“真理”都是错误的；第三、指出了真理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把它同认识的发展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联系起来，概括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④

毛泽东同志关于通过实践发展真理的思想，不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国家经历了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道路，在实践中获得了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6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7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73页。

丰富的经验，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功经验，终于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十二大对这种正确认识作了科学的总结。所以，我们要象过去几年那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在十二大精神的指引下，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任务而努力工作，并在实践中，不断推动真理的发展。

四、对实践是认识目的的科学总结

马克思在其“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在于“改变事物的现状”②。在这个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③人们认识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任何其他哲学的根本点。

一切唯心主义哲学，都不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它们把客观世界看做是精神的产物、说明观念的材料。这种哲学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证明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归根到底是一种反对变革现实的哲学理论。一切旧唯物主义哲学，虽然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坚持了反映论，但由于它们不懂得社会实践，只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论，在客观世界特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页。

③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第227页。

是人类社会面前仍然是无能为力的，归根到底也是谈不上真正彻底地改造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使认识与实践统一起来，证明了人们通过实践，不仅可以认识世界，而且通过实践可以改造世界，并且强调了改造世界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最终目的。

真理是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它具有不可避免地实现的趋势，甚至可以这样说，凡是真理迟早总会过渡到现实。但是，要实现这个过渡，则必须通过社会实践，真理才能变成为现实。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①。没有实践这个"物质力量"，便达不到改造世界之目的。毛泽东同志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②这样，毛泽东同志便正确地规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不但在于正确地认识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最终目的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同志严厉地批判了那种停留在认识上、理论不为实践服务、为认识而认识的空谈家，那种手里拿着箭，只会连声说"好箭！好箭！"的古董鉴赏家，强调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原理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主要是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为了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主体本身也应当改造。马克思曾说过，在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中"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③。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4页。

实践中也总结出一条重要原则，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他说："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①因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的思想认识指导下的实践活动，这些思想认识是否正确，对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的成败，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而改造认识主体（人）的主观世界，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对于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实践是认识的目的这个论断的精髓所在。

我们党十二大的报告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路线，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角度非常精辟地阐明了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科学概念及其辩证关系。胡耀邦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和社会。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因此，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事业的实践中，我们一定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立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有这样，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目标才能胜利实现。

① 《毛泽东选集》第272—273页。

坚持主体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学习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体会

凌 厚 锋

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思想，对于指导当前的实践，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主体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根本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认识的本质就是主体反映客体。作为揭示认识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论，就是要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主客体的矛盾是人类生活中最普遍、最根本的矛盾，也是认识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但它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具体过程中，就体现为认识和实践的矛盾。主客体矛盾虽然是基本矛盾，然而认识论更为重要也更为本质的问题是怎样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也讲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但是由于离开实践去研究人的认识，因而对于二者究竟怎样统一没有能够解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指出以生产活动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实践是人类认识的基础，主体（人）的认识活动正是在社会实践中进行的。人的思维能否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能否达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①。就是说，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通过实践这一中介把主体和客体连接起来，使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达到主体和客体在行动中的一致。由于作为客体的客观事物总是具体的、发展的，主体的认识活动又总是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主客体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同样，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而实践总是具体的社会实践，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它只能产生相应的理论，因而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是具体、历史的。这样，在主体反映客体时，我们首先注意的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②。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在《实践论》中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③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建立在这一科学结论上面的。我们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然而从一九二一年党的成立到抗日战争时期所经历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事实表明，光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仍然无法保证我们的行动取得成功。这是因为，它毕竟是一种理论原则，只有这些原则，并不能代替对于客体——中国实际的具体了解，因而也就无法保证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进行革命的具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1页。

③ 《毛泽东全集》第272页。

指导思想也一定正确。事实上，主体要想正确地认识客体，必须经过实践、认识的反复过程。在中国就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在实践中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中国的实际，找出它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理论、路线和革命进程各个阶段的战略和策略。

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倾向之所以同党的思想路线是相对立的，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背离了主客体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主观主义虽然未以唯心论或机械唯物论这样系统的哲学形态出现，但从它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错误态度看，却是同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一样，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①。毛泽东同志在清算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时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②党内具有主观主义倾向的人，特别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其根本错误在于，一方面，他们所赖以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中国的实际，而是共产国际的某些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结论；另一方面，他们又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根本道理。这样就使自己在解决主体和客体这一基本矛盾时，陷进了唯心主义的泥坑。因此，他们虽然置身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却无法获得对于中国情况的真正了解，由此产生的“左”倾盲动，曾使中国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63页。

总之，坚持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是贯穿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根本点。整个毛泽东认识论思想就是紧紧围绕这个中心而展开。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正确认识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重大理论价值及其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作的贡献。

二、毛泽东同志对认识辩证过程的深入、具体的分析，为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从而揭示了认识运动的辩证法。恩格斯说："……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①，"从个别到特殊并从特殊到普遍的上升运动，并不是在一种样式中，而是在许多种样式中实现的"②。列宁发挥了这个思想，指出思想和客体的一致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③，并且概括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的认识的辩证途径。但他没有来得及进一步阐发。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漫长征程中，总结认识的经验，抓住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运动，对上述思想作了丰富和发展。他曾经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69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 在认识论领域内情况也是这样。如果只提出认识的任务，而不解决认识的方法和途径，那末这个任务也就不可能完成。党内主观主义者在认识上不仅离开了唯物论或者没有把唯物论坚持到底，而且不懂得辩证法，他们把认识过程的某一个环节加以绝对化。经验主义者固守感性经验，不上升到理论；教条主义者则使理性认识脱离感性经验。这样，他们就无法解决实现主客体统一、到达真理“彼岸”的“桥和船”，也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因此，毛泽东同志以极大的注意力十分详尽地分析了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提出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和认识总过程的思想。指出，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表现为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两次飞跃，而一个正确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

主体的认识究竟怎样发生？客体不能直接变为观念的东西，而是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通过感官把客观事物反映入人脑，并经过改造而变为主观精神。开始时，人们“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②。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即感性阶段。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多了，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就起了认识过程的一个飞跃，产生了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反映的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各个片面及外部联系，而是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的联系了。毛泽东同志认为，为了实现从实践到认识的飞跃，获得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必须具备两个条

---

① 《毛泽东选集》第1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61页。

件，即占有十分丰富和合乎实际的感觉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改造和制作。正是依据这些原理，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建国初期，又在他的建议下，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而他晚年错误地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它的形成，从认识过程来说，恰恰是由于缺少上述这两个条件所致。

实现了第一个飞跃，认识运动并没有结束，还应将第一个飞跃得来的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实现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毛泽东同志指出，这次飞跃比起第一个飞跃更为重要，意义更伟大。这是因为：只有经过这一飞跃，才能证实第一个飞跃得来的认识是否正确，以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推动认识向前发展；也只有经过这一飞跃，才能实现改造世界的任务。他并且阐述了实现这一飞跃的条件，主要是：把理论化为具体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提出更加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以此来指导实践；动员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自觉能动性；通过典型试验，取得经验，推动全面。

与以上论述相联系，毛泽东同志还揭示了认识运动的秩序。他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

殊。”①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即经过对大量的感性材料进行思维加工，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规律性指的是事物的内部、本质的联系，由于客观事物的联系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因此，当我们在对一个事物作出规律性的说明时就必须谨慎从事。从理性认识到实践就是从一般到特殊。当我们把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拿去指导实践时，面对的是大量具体事物、具体情况，因而不能从原则出发。俗话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把原则、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同实际结合起来。如果不从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就势必导致共性和个性相分裂，不可能达到主客体的统一，就会在工作中犯错误。例如中央规定我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方针，怎样贯彻落实，就有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我省自然条件好，有人才，海外华侨多，这是有利条件。但我省经济比较落后，工农业基础差，财政底子薄，商品经济不发达，人口增长率较高，加上交通运输、通讯设备等基础设施也跟不上，大量引进外资，多搞几个大型项目的条件也不具备。根据这种实际，我们只能稳步前进，不能搞高指标，盲目追求高速度。

从认识过程两个飞跃的原理出发，毛泽东同志把认识方法和领导方法一致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之上的。但这不是说，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仅仅表现在认识基础问题上。事实上，诸如主体、客体以及两者关系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离开了历史唯物论同样是得不到正确解决的。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认识论运用于现实的革命斗争，将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极为巧妙地结合起来。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

① 《毛泽东选集》第284—285页。

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这说明，领导方法的群众路线同认识方法的群众路线是完全一致的。他又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②所谓“个别指导”就是“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而“一般号召”就是“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从一般号召到个别指导”，就是“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这又体现了“从个别指导到一般号召”，再“从一般号召到个别指导”同“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这样两个过程的一致。毛泽东同志通过领导方法的群众路线同认识方法的群众路线的有机结合，把认识论从理论领域转向实践，真正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同志还依据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和反复性，提出了认识运动总过程的思想。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这是一个认识周期。在个别情况下，如果主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正确，认识的对象又比较简单，那末经过两次飞跃就可以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但也只是基本正确。在通常情况下，由于“从事变革现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854、855页。

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①。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就是说，实现主体和客观的统一要经过一个反复的过程。譬如，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之所以到去年才比较系统而具体地提出，而不能提得更早一些，就因为以往的实践还不够，国民经济的各种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暴露得还不够充分，以致不可能从中得到应有的认识，做出应有的判断和结论。

毛泽东同志指出，经过实践、认识的多次反复之后，主体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然而就过程的推移而言，主体的认识运动又是没有完成，它将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向前推移。据此，他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总过程。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②这个概括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过程原理的极好发挥。我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正是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实践已经证明，要把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一项摆在整个中华民族面前的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又不能机械搬用。我们只能在马列主义指引下，经过不懈的努力去认识我国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在实践中探索着前进。正是在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73页。

结建国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从三中全会以来，才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遵循毛泽东同志阐明的认识的总过程的思想，在实践中进一步充实和发展这条道路，我们就能不断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三、毛泽东同志发展了主体能动性的原理，从而为主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强调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主体的能动作用，可以说是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毛泽东同志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突出方面。

众所周知，关于主体能动性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完成的。马克思在批评旧唯物主义对认识过程的直观的解释，因而看不到主体能动性的同时，也揭露了唯心主义对主体能动性的曲解，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①就是说，实践是主客体统一的基础，是二者相互作用的交错点，认识的主体同时而且首先是实践的主体，认识的对象（客体）同时而且首先是实践的对象，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是通过实践活动实现的。后来列宁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发挥。他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

如果说上述思想是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展主体能动性原理的理论依据的话，那么中国革命特有的艰巨性，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人民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则为他推进主体能动性理论提供了现实的依据。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新的开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主体能动性的含义予以更加科学的规定。他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①这里除了说明自觉能动性是人（主体）所特有，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点外，毛泽东同志突出地指明：其一，主体能动性包括意识能动性和实践能动性，即主体能动性表现在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不是互为独立，而是相互交叉；其二，主体能动性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其标准就看是否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或是否根据正确的思想。以上两点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于主体能动性最为科学的解说。

其次，阐明了正确发挥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性和条件性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②又说：

① 《毛泽东选集》第4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54页。

“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①这些论述深刻地说明：就主体和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而言，主体处于能动的方面，客体处于被决定的受动的方面。然而主体能动性的规模、程度却要受到客体那些先前已被人们所了解和把握的规律性的制约，受到当时所能许可的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制约。现在较之建国初期，所以有高得多的实践水平，就因为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有更多的认识，我们的物质基础也雄厚得多的缘故。另一方面，客体形态的变化固然需要一定的客观因素，即必要的物质条件，然而这仅仅为改变客体形态提供一种可能性，只有经过主体的努力，即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才能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从而实现对客体的改造。由于毛泽东同志对上述两方面辩证关系的分析都是紧紧结合实际斗争进行，因而使它对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具有更为直接的指导意义。

当前，我们正在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应当清醒地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还有许多障碍和困难，不能只看光明一面，不看困难一面，甚至把主观愿望当成客观事实，盲目冒进；同时，也决不能害怕困难，被困难所吓倒。一定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满腔热情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在深入群众和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振奋精神，开拓前进，在斗争中创造新的局面。

再次，强调主体改造的重要性，指出了实现主体改造的正确途径。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②问题是在实际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6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72页。

们认识客观规律的正误、深浅有很大的差别，在客观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会产生十分不同的实践结果。这里涉及到主体状态的差异性。我们知道，主体总是以一定的状态进入认识客体和改造客体的过程的。在客观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主体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取决于主体的状态。那么主体状态又是包括哪些因素呢？从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论述来看，大致是：主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体的文化素养（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科学知识水平），主体的勤奋程度以及生理条件等等。由于这几个方面的不同，造成了主体状态的差异，形成了主体的不同的认识能力。这样就很自然地提出了主体改造的任务。早在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①这里清楚地表明，主体的改造决不仅指主体思想意识的改造，而且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首先是改造主体的认识能力。建国以后，针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强调了主体改造的意义，认为如果不进行这项工作，那么"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②，"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③，尤其是对于作为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说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更为重要，因为"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④。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指明了实现主体改造的正确途径。这就是：一要学习，二要实践，三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是学习。他说："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

① 《毛泽东选集》第272—27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326页。

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①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②。其次是参加实践，“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③这里毛泽东同志深刻揭示了主体改造同实践的内在关系，指出主体认识能力的改造和认识水平的提高，都只有通过实践才有可能。再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改造主体的认识能力还包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改造。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应当采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④。只有这样，才能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做好各项工作。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这就给主体改造提出了更高也更加明确的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部分，其核心是共产主义思想。这就需要我们牢固树立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努力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同时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养，使自己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

当前，我们的任务是奋发勇为，坚毅不拔，保证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的胜利完成。为此，就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8—4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7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8页。

因为实事求是就是要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就是要不拘成法，使思想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对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这样做下去，就一定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四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实现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学习毛泽东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思想

姚 经 桃

自觉的能动性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

毛泽东同志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时，对自觉的能动性作了科学的规定，并特别强调要在实践中正确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

今天，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斗争中，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思想，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这也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而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人民大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政治、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

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等等，错综复杂，斗争十分尖锐。面对这种形势，如何认清中国的国情，从客观实际出发，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把革命引向胜利，革命的领导者就要充分地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但是，在严酷斗争面前，各种思潮的斗争表现得十分突出，尤其是革命遭受挫折，处于困难和低潮的时候。当时，在我们党内和革命队伍中出现的悲观主义、盲动主义就是各种思潮斗争的集中表现。

悲观主义者，不论是对革命的客观条件，还是对革命的主观条件的分析和估计都是错误的。他们被敌人一时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不敢斗争，放弃革命，这就谈不上发挥什么自觉的能动性了。而盲动主义者，从主观愿望出发，不切实际地夸大主观的能动作用，轻举妄动，盲目蛮干，他们离开了唯物主义立场，把主观的能动作用绝对化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就是这种悲观主义和盲动主义的典型表现。针对盲动主义和悲观主义，针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同志从理论上阐述了坚持发挥自觉能动性的重要意义。指出，要发挥自觉的能动性，首先要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①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坚持主客观的统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认识当时中国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科学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他强调指出，作为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仅要能动地认识中国的国情，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认识革命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而且要敢于斗争，勇于实践，能动地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163页。

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唯心主义片面地夸大了精神、意识、主观的能动作用。机械唯物主义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唯物又辩证地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篇著作中，在批判一切旧唯物主义的错误时，科学地阐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①结果，“**能动**的方面”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②。在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上，旧唯物主义者只知道自然、环境作用于人，而不知道人也作用于自然和环境，“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③。接着，马克思指出，唯心主义也并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他们在离开物质第一性，主张精神决定一切的前提下，抽象地、片面地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主观能动性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新的贡献。

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〇年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④，这是坚持唯物主义，洗刷唯心精神，发扬自觉能动性的根本前提。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对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既是一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0页。

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也是一篇内容十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这篇著作着重反对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强调在革命战争中，应当充分注意主观指导能力的作用。他说："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①这就明确指出了在客观诸条件的基础上，主观指导能力即主观能动作用的决定意义。

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写的《实践论》中，反复谈到"认识的能动作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问题。他在谈到认识运动时说："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②并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③"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④，从而达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其中，不论是认识的环节，还是实践的环节及其二者的统一，都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就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说明了主观能动性。

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同志写作了另一本重要的哲学专著《矛盾论》，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问题，同时阐述了精神与物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指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166、269、26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73页。

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①。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就是精神、意识的能动作用。这里，反对了唯心论特别是反对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一九三八年五月，伟大的抗日战争经过了十个月，为了总结经验，找出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批判当时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即“速胜论”和“亡国论”，制定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原则，毛泽东同志写出了《论持久战》这一光辉著作。这不仅是一部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著作，而且是一部生动而具体地运用并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同志集中地论述了“自觉的能动性”的思想，指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②

到这时候，毛泽东同志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已经作了比较系统、比较明确的概括。这个思想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实践中提出，在实践中运用，在实践中完善。

毛泽东同志后来的许多著作也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程度上继续补充和丰富这一思想。例如，《战争和战略问题》、《〈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论

---

① 《毛泽东选集》第300—30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45页。

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这些著作强调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反对离开实际而主观地决定工作方针的错误；同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反复强调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亿万干部和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即自觉的能动性，去争取革命和建设的不断胜利。

二

毛泽东同志关于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什么是自觉的能动性。

毛泽东同志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①。简单地说，自觉的能动性包括想和做，即思想和行动两大方面。列宁曾经说过："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②即人们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认识客观世界，并且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创造客观世界。人们能动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人们发挥自觉的能动性的过程。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二者同在实践中实现其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事情都是要人去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③这就是说，人们要做好某件事，就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

---

① 《毛泽东选集》第44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45页。

引出思想、道理、意见，使主客观相符合，即能动地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性；然后根据正确的认识，提出计划、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等等，付诸于实践，即做或行动。这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实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

第二，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说，“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人类社会发展史同自然的发展史有一点是根本不同的。在自然界中发生作用的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②，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③人类这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是区别于物的主要特点。由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尽管出现了对人脑、人的智能相当精确的模拟，制造出电子计算机（电脑）、机器人（包括对人手动作的精确模拟）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在许多领域，甚至一些人们自己难以到达的领域（例如，高温、剧毒等条件下）发生过、发生着巨大的、奇妙的作用和威力，但是，它们仍然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是人手和人脑的延伸和放大。它本身看起来很神奇，其实不是什么神物，它正是人们正确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产物，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和表现。离开了人的实践，离开了具有高度能动性，即特殊的、自觉的能动性的主体——人，电脑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电脑等等任何智能机离开了人的设计、研制就不可能产生；它的使用和控制同样也离不开人，离

① 《毛泽东选集》第4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开了人，它们就仅仅是一堆废物而已。马克思说："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① 智能机也不例外。应该说，人是人，物是物，二者固然是有联系的，但更有其本质的区别。那种认为机器也能独立地思维，机器可以比人更聪明的观点，甚至认为机器将统治人类，以至于毁灭人类的悲观论调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人类所具有的"自觉的"、"特殊的"能动性也是动物所不具有的。动物的活动，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有某种预定的目标和计划等等，其实不然。例如蜜蜂筑巢、蜘蛛织网等，看上去好象"心"中有数，好象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其实，它们的操作纯粹是无目的、无意识的本能活动而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蜜蜂的活动和建筑师的工作相比较，指出：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的高明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还高明的地方，那就是在他建筑房屋以前，已经先在自己的头脑中有了房屋的观念和构想。② 马克思在谈到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时，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能动关系。恩格斯说，人"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③"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④ 动物通过自己的活动也改变外部自然界，但是，那只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⑤。动物在吃掉（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7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6页。

这样做，更不知道要如何做。它们“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①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贵在“自觉”二字。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②

第三，自觉的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

从实际出发，这是正确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的唯物主义前提。凭空想象，那是主观随意性。毛泽东同志在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即超越客观条件允许的限度去期求胜利，片面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在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不去争取胜利，否定主观能动性的无所作为的形而上学错误观点，揭示并论证了自觉的能动性与客观物质条件及其规律性的关系。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③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④客观事物都有它的内在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不能消灭规律，也不能改变规律，更不能创造规律。但是，人们可以在实践中发挥自觉的能动性，能动地认识客观事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5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4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68页。

及其规律性，能动地掌握并利用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达到自己的目的。列宁说过，人的实践面对着客观世界，以客观世界及其规律作为人们活动的基础。① 如果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与客观外界及其规律不合，就不能得到预期的结果，就将在实践中失败。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都是不能违背、不可抗拒的。人们只能老老实实地按客观规律办事。自然规律对于人们活动的制约性比较易于被人们所理解、所注意；而社会规律，由于它的特点，它对于人们活动的制约性就不容易被人们所理解、所重视，人们往往被一些复杂的社会现象所迷惑。因为，在社会上从事活动的人，全是具有意识、意志、计划和目的的。表面地看，似乎可以不受任何东西制约而为所欲为，似乎纯粹是由偶然性起支配作用。但是，实际上人们在社会上、历史上的活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不能得到预期的结果的，甚至恰恰与原来的愿望相反。人们抱有自觉的目的、期望，为什么往往不能如愿以偿，甚至事与愿违呢？这是因为，人们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也跟在自然界中活动一样，受着一般规律的支配。恩格斯深刻地指出，不论你如何研究历史，“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② 这一点，更要自觉地去认识它、把握它，从而严格地按历史发展的规律办事。总之，正确发挥自觉的能动性是不能离开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离开了它就将在实践中受到惩罚。

第四，要充分发扬广大群众的自觉能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神。

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充分发扬自觉的能动性的思想，不只是指领导者，更重要的是要发扬广大群众的自觉的能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这里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体现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同志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①群众是历史的主人，革命的事业是群众的事业，"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②只有调动全体军民的"全部积极性"，"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③历史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断。在抗日战争中，我党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发扬他们的自觉能动性，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本侵略者在我数万万的人民面前，就象一匹野牛冲入火海，非被烧死不可。八年艰苦抗战，最后以日本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而告终结。这是全面、正确、充分地发扬自觉的能动性的一个光辉范例。

三

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目标和战斗任务，首要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

福建如何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两千五百多万福建人民共同关心并且要很好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又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853、478、445页。

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按照自己的情况，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来说应该这样做，对于一个省来说也应该这样做。福建要牢牢树立起这样的思想，在党中央领导下，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按照本省的情况，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加速福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要做到按照自己的情况，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己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正确地发挥自觉的能动作用。福建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优越，中央决定在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这对发展福建经济具有战略意义。在这同时，福建省委提出，要发挥福建山海优势，念好“山海经”，这对于把福建经济搞上去，同样具有战略意义。这里，着重谈谈念好“山海经”问题。

发挥自觉能动性，念好“山海经”，福建必振兴。福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福建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有的山区县社山地则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山多是福建的一大特点。山地广阔，森林资源丰富，开发山地资源，发展多种经营，应当成为福建建设的一大特色。

发展林业。福建是全国重点林区之一，森林覆盖率居全国第二位。在发展建设用材、木材综合利用、林产化工等方面都有广阔的前景。福建还盛产油茶、油桐、松脂、紫胶以及果、茶、竹等，价值也很大。

发展畜牧业。福建有三千三百多万亩草坡地，二百多万亩海滩地和二千多万亩水面，可发展牧草和放牧场，畜养牛、羊、马等食草动物和发展猪、鸡、鸭等都大有可为。

此外，纵横交错的溪河山涧，蕴藏着巨大的水力资源；地下

埋藏的矿产品种繁多，都很有经济价值。

福建海域辽阔，海岸线长，水产资源丰富，这是福建的又一大特点。全省海岸线长达三千三百多公里，约占全国海岸线总长的五分之一。海岸曲折，有许多天然的优良港湾、港口，岛屿星罗棋布。现有的渔场总面积比全省的总面积还大得多。还有许许多多可供海水、淡水养殖的滩途、浅海和水面。发展海洋捕捞、海洋化工等潜力很大。沿海渔民说："我们家门口就有'金饭碗'"。

发展海洋运输，开发海上资源，促进对外贸易等都有广阔前途。

福建的江河湖海，碧波荡漾；福建的山峦，绿树成荫。山连山，水连水，山山水水紧相连。山青水秀，江山如此多娇，怎不令人向往！福建的山海条件如此优越，这是搞好福建经济建设的有利条件，具备了把福建经济搞上去的可能性。但是，如何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呢？发挥自觉的能动作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同志说："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① 山河大地，依照自然规律，是在不停地运动着、变化着，但是，它毕竟不是瞬息万变的，而是可以认识的，有规律可寻的。条件、环境是重要的因素，并且是客观地存在着的，关键就看我们能不能正确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能动地认识它、利用它来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如果不能正确发挥自觉的能动作用，再好的条件也得不到合理的、充分的利用。其结果，或是江河依然如故，或是反而造成种种自然灾害，危及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是无数事实早已证明了的。马克思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② 这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454—4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者不懂得人的主观能动性时说的。同时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①人的活动、实践是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更为重要的方面和表现。毛泽东同志不但重视条件的作用，而且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②指挥战争是这样，指挥生产、领导经济建设也是这样。战争与经济建设虽然有着各自的特殊性，但是，就主观指导要符合客观，要充分发挥主观指导能力即发挥自觉的能动作用这一点来说则是共同的。要真正认识国情、省情，认识各种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没有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也是做不到的，更不用说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思想懒惰，又坐着不动，凭主观臆想，胡思乱想。不但不能获得真知灼见，其结果必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福建省委提出念好"山海经"这个口号，是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跑遍福建的山山水水、县县社社，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邀集许多专家学者共同分析福建的自然条件以及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后才作出的正确的结论。

一个好的口号的提出是重要的，它能起到鼓动人们的革命热情，调动人们建设四化的积极性、能动性。但是这毕竟只是纸上的东西，要付诸实践，还要作出艰苦的努力。这就要求我们在正确认识、正确口号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计划方案和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措施，并把领导的决心变成广大群众的行动，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才能搞好福建的经济建设。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46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初步的实践表明，念好“山海经”这个口号是正确的。许多地处山区和沿海的县社，由于大念“山海经”已经取得可喜的成果。例如：

永泰县，山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百分之八十五。大念“山字经”，多种经营蒸蒸日上，群众说：这样念“山经”，黄土也能变成金。县委总结发挥山区优势的经验是：要使永泰富，得从山上找出路；一部“山字经”，“创业”二字要记熟。

霞浦县，山多海宽，更是发展多种经营的好条件，一九八一年，全县山海面积的利用比一九七九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一，社员收入增加了五十多万元。

全省的海运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港口建设，船舶运输能力的增长速度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同过去二十九年相比，增加了二倍以上。现已建成一支初具规模的外贸运输船队，海上客运也有一定发展。这对于搞活经济，促进对外贸易和经济文化交流都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念好“山海经”的口号提得好，提得正确。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福建有许多好的、有利的条件。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利、困难的条件，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例如，目前“左”的思想影响尚未彻底肃清，一些干部、群众对现行政策还不甚了解，因而贯彻还不够有力；由于过去长期忽视山林和环境的保护、片面毁林垦荒、挖山填海造田，使自然条件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在交通、港口、能源方面，基础设施薄弱；在统一规划、综合平衡、经营管理等方面也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念好“山海经”，发展福建经济是不利的困难的条件。这是需要认真地加以分析和正确地对待的。马克思主义对待条件的态度是：有条件论，但不唯条件论。正确地发挥能动性，实事求是地分析、认识条件，促进不利条件、困难条件向着有利条件、顺利条件方面转

化，创造条件，变害为利。发挥能动性不能离开条件。离开了条件，不讲条件，就会片面地夸大主观能动作用，陷入主观随意性，那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所讲的错误的能动性。但是，如果把条件强调得过头，见物不见人，就会忽视或否认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会陷入机械唯物论、宿命论。因此不讲条件不对，把条件强调得过分也不对。目前，有的同志似乎把条件看得过重以至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他们借口要遵重客观规律，事实上在正确的口号下，消极观望，坐等时期，无所事事。这种精神状态怎么能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需要呢？这就谈不上发挥自觉的能动性，倒是十足的惰性、消极性、被动性。开创经济建设新局面，非克服这种精神状态不可。毛泽东同志说过，人要有点精神。还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十分艰巨而长期的任务，没有这种革命精神是绝对不行的。科学的态度与革命精神相结合，并统一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就是正确、充分地发挥自觉的能动性的最好体现。党的十二大号召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振奋革命精神，埋头苦干，为夺取新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福建经济建设的基础与全国水平比较有差距，与先进的兄弟省市相比，距离更大，这说明我们的任务更艰巨，这就要求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更要正确地、大力地发挥全省人民的自觉能动性，团结奋战，把福建经济很快搞上去，为全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试论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作方法的思想

丘 一 平

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作方法的思想，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革命具体实践问题中的一种创造性成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的论述。列宁虽然提及，但也没有毛泽东同志论述的那样全面、深刻，具有独特的理论性。因此，毛泽东工作方法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些思想在过去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发挥过极大的指导作用，对今后党的实际工作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很有研究的必要。由于这一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本文仅就管见所及，初步探讨其中的一些问题。

研究工作方法的意义和出发点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十分重视对工作方法的研究，从而提出一整套科学的工作方法。这是同中国革命所遇到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革命的任务极其艰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其斗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是亘古未见的。在这极端险恶的环境中，要战胜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不能不讲究工作方法和斗争艺术。毛泽东同志说："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

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①。

其次，毛泽东同志认为研究工作方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重要的课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②。而“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③。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着重点是在于改造世界，在于将对世界的正确认识作为改造世界实践的指导、作为实践的方法，达到正确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十分重视对方法论，对工作方法的研究，把这种研究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课题和根本任务。

毛泽东同志不仅自己重视对工作方法的研究，而且反复向全党说明研究工作方法的重要性。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指出研究工作方法是完成工作任务的基本前提。他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只是瞎说一顿。”④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者不仅要解决制定方针政策的问题，还要制定贯彻执行方针政策的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⑤事实上，不仅仅革命工作要研究工作方法，任何一项事业，任何一门科学，都要讲究方法，都有一个方法论问题。方法对头，事半功倍；方法不对头，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85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25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330页。

那么，怎么研究工作方法呢？毛泽东同志认为它的出发点和立脚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工作方法的统一。他说：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的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单独的方法论。所以毛泽东同志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这种一致性说明方法论是世界观的实际运用。工作方法，作战方法，教学方法等等具体方法，是以世界观为基础，是世界观和一般方法论的具体化。因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产生什么样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只能来自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工作方法，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毛泽东同志的科学工作方法，正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践问题中创造的。现在，我们要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作方法的理论，首先就必须切实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端正自己的世界观入手，真正尊重唯物论，按辩证法办事。

当然，我们讲世界观、方法论和工作方法的一致性，并不认为它们是等同的，以为一旦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就能自然而然地使工作方法科学化，并运用自如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只是说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科学的工作方法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前提；但它不是也不可能代替科学的工作方法本身。因为，从世界观、方法论到工作方法，有一个从理论回到实践的过程，有一个由一般回到个别、和个别相结合的过程。

几项主要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不仅论述了研究工作方法的意义和指导思想，而

且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写了许多关于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专门著作，提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较完整的工作方法原则，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运用开拓了新的领域，作出了新的贡献。这里只着重介绍如下几项：

一、实事求是的方法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精辟概括，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创造，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成就。它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科学的世界观，同时又是科学的方法论。近年来，对实事求是的世界观方面的论述已有不少了，但对于它作为我们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性的工作方法阐述的并不多。我认为，根据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科学含义的论述，还必须充分认识它的工作方法方面的意义。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深刻的说明。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①这一大段论述，描绘了实事求是如何成为我们党分析问题、制定方针政策的科学方法。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工作方法上的具体运用，既有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辩证法的方法，

① 《毛泽东选集》第759页。

又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论的原则。毛泽东同志就是运用这种科学方法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同时，他也要求全党同志学会运用这一科学方法，较正确地解决各自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根据毛泽东同志以上论述，运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需要掌握四个环节：

第一，从国情、省情、县社队情出发，即从实际出发。这是正确分析、认识事物，决定政策的根本前提。毛泽东同志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①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强调从国情出发是决定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所谓国情，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就是旧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民主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前途都是由这个国情决定的。所以，毛泽东同志从国情出发，就能够正确地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违背客观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工作曾发生过"左"的错误，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当时经济工作在指导思想上违背了中国国情，不是从我国人口多、农民占我国人口中的绝大部分、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基本国情出发，所以制定了过高的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和指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重要原因也是我们首先弄清了国情，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路子。就是党在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方针政策过程中，力求符合客观实际。

全国要从国情出发，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县、社、队，

① 《毛泽东选集》第1203页。

一个单位，也都要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如中央决定福建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充分利用外资，开辟经济特区；省委提出福建要念“山海经”的经济发展方针等，都是从福建的具体情况出发，因而是正确的。近年来，在贯彻执行这些方针政策中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第二，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找出其规律性。这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分析客观事物矛盾双方的特点及其运动，从中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这个方法是正确分析、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将它运用于社会领域，主要是分析社会各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双方的特点及其变化；运用于战争，主要是分析敌我双方的特点及其运动；运用于经济建设中，主要是分析各种经济关系的特点和变化。这种分析法既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也能为解决矛盾找出方法。党中央能够提出当前“四化”建设中比较正确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也是在分析我国经济建设各方面的矛盾运动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所以赵紫阳总理指出：“这些方针之所以今天才能够比较系统地，具体地提出，而不能提得早些，是因为过去我们的实践还不够，国民经济的现实发展还没有把各种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暴露得现在这样充分，以致人们不可能从中得到应有的认识，做出应有的判断和结论。”

第三，根据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制定出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按这种办法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一般地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比较容易被群众所接受的。在这一环节中，重要的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否则制定出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也会是错误的。譬如，从福建的具体特点出发，发挥有

利条件，应该充分利用外资。但如何利用，采用什么办法，这既要勇于在实践中探索，又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忘记必须以有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为前提。如果忘记这些根本原则，只是想挣钱，象有些部门那样利用借来的外汇，去购买国外高挡消费品在国内推销，这种作法虽能为本地区积累资金，但却帮助外国资本家在国内倾销商品，打击本国的民族工业，这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了，自然也就行不通。

总起来说，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分析客观事物矛盾双方的特点及其变化，找出其中的规律性，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制定方针、政策、措施，并在实行中不断补充完善的方法。这是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的基本方法。如果全党同志真正学会运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来研究问题、处理问题，制订和实施方针政策，那末全党的领导水平将会大大提高一步。

二、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①这说明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是党的基本的工作方法之一。一般地说，任何人要正确认识事物，都必须遵循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认识方法，先是认识一个个具体的事物，再进而抽象出事物的一般，然后再在一般认识的指导下，深入认识个别的事物，以丰富充实已有的一般的认识。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就是经过这样不断循环往复

① 《毛泽东选集》第852页。

而达到的。

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在领导方法上则体现为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将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但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在若干组织中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因此，两者要相结合。

经验说明，一个领导者，提出一般号召，开一个大会，发一个通知，出一个告示，定一个法规，是比较容易的；但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做个别指导却往往不容易真正做到，或做得不好，致使领导工作停留于一般化，不能取得成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下，着重对如何实现个别指导，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方法，如：“蹲点”、“解剖麻雀”、“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一切经过试验”等等。而实行这些具体的工作方法时，仍不能离开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基本方法。为什么深入一点，解剖麻雀就能了解到面的经验呢？因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深入研究一个典型，弄清这个点的经验，自然会了解到与其他点上共同具有的一般的本质的内容。总结出点上的典型经验，也自然会对其他点，整个面的工作有指导作用，达到“以点带面”的目的。当要进行一项工作，却还缺乏工作经验的情况下，如果能够经过在点上的试验，不管它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为今后点上或面上的工作提供经验。因此提倡“一切经过试验”。毛泽东同志总结出的这些科学的工作方法已多年了，有许多同志过去实行它，取得了很大成功，推动了党的事业。但是也有些同志实行得不好，主要的原

因还是不懂得这些工作方法的科学依据，违背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理。例如，有的同志在抓点、培养典型、树样板的过程中，忘记了个别是一般的个别，而采用了脱离一般的特别方法和手段，如给吃“小灶”、“实行大兵团作战法”等等去抓点、培养典型，结果使点上的情况与面上的情况相脱离，典型失去典型性，样板不能成为榜样，“经验虽好，但学不到”，点上经验无法推广，起不了“带面”的作用。这种做法不仅失去指导作用，还会给点上工作造成损失。这正是有些地方和单位不敢当典型、作重点；或者当了重点或先进典型后，反而变落后的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的是把点上的经验绝对化、神圣化、到处生搬硬套，结果点面的工作都造成损失。其原因还是由于违背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理，把个别和一般完全等同起来，不懂得它们既一致又不一致。一般概括了个别的本质，但不包含个别的全部内容。点上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但又有它的特殊本质。因此在推广点的经验时，必须坚持和各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在一个点上学习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时，不加分析、不加区别、不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去搬用先进地区的经验，没有不失败的。

总之，贯彻实行好毛泽东同志的上述具体的工作方法，必须以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为指导。

三、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这也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基本工作方法之一。它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辩证法原则的进一步发挥，同时又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基础上的。所以，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将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统一起来的一个创造。

毛泽东同志认为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是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高到高级的程度。”①然而群众的积极性主要是靠领导骨干去组织发动的。所以一个单位工作能否搞好，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②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些论断，至今仍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党的“十二大”把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作为顺利进行“四化”建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保证。

二是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凡是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③，“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④讲得具体一点，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⑤这里讲的从群众中来，就是从实践中来，因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一个领导者要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重要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853、853—854页。

③⑤ 《毛泽东选集》第85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855页。

的是要做到深入到群众的实践中去，虚心地、广泛地听取群众的意见，细心地考察群众实践的客观效果，然后将这些意见进行辩证的分析、研究、概括、综合、形成领导者的意见。而要做好“到群众中去”，重要的则在于将领导者的意见拿到群众中去时，不是向群众一宣布就了事，而是要作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让群众真正接受，化为他们自己的思想，使其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实践的过程中考察这些意见，在这基础上补充、丰富、发展已有的意见。

怎么样才能执行好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呢？毛泽东同志认为，首先要树立起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一切为了群众，就是要承认共产党是适应人民群众、工人阶级的历史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工人阶级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工具。因此，我们党的一切活动都要为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切切实实当人民的勤务员，做人民的公仆。一切依靠群众，就是要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幼稚可笑。因此，要老老实实当群众的小学生，有事同群众商量，真正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可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应用。只有树立唯物史观，才能切实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其次，要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反对不要群众，不相信群众的高高在上、独断专行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也要反对否定领导的“群众决定论”、“尾巴主义”。在十年内乱的年代，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打着群众路线的旗号，鼓吹“群众决定论”，破坏各级党的领导，否定党的领导作用，这些流毒至今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必须彻底肃清。总之，只有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才不会曲解毛泽东同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四、一系列辩证法的具体工作方法

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年代，总结党的工作方法经验时曾指出，党的工作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也就是说，工作方法是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指导下产生的。所以他根据唯物辩证的思想，提出了一整套辩证法的具体工作方法，如“务虚和务实相结合”、“全局和局部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抓住中心和‘弹钢琴’相结合”、“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以及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提出并经实践证实了的科学方法，是我们党完成各项任务，搞好各种工作所不可缺少的，它们对当前四个现代化建设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如全局和局部相结合的方法，是当前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全局和局部是对立统一的。全局由局部组成，因此，离开了局部也无谓全局；全局代表了局部的利益，但全局又不是各个局部的简单相加，它是各个局部有机的组合。所以在某一个时候，某件事对全局有利，但对某一局部可能不利。反之，对某一局部有利的东西，对全局不一定有利。处理这对矛盾时，应当提倡顾全大局和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同志称之为“通观全局”或“全国一盘棋”。根据这个原则，要求指导全局工作的同志，不能只强调全局，不顾局部利益，无视特殊。否则，就会犯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的错误，不利于调动局部的积极性，对全局工作也不利；而对指导局部工作的同志，就要提倡顾全大局，不能脱离全局，仅顾局部利益而不顾整体利益。特别是在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相抵触时，应该有照顾全局，服从全局需要的观点，暂时牺牲局部利益。决不能犯那种不顾全局，偏面强

调局部利益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强调发挥地方优势，实行财政包干、扩大自主权、对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发展生产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有些地方，在实行中也出现盲目性。譬如，有的地方，建立了许多小工厂，同大厂争原料，以小挤大，造成了地方得利影响国家建设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或企业，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对外贸易中，互相杀价，让外国资本家从中得利，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这些都是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的错误造成的。

我们强调局部服从大局，为顾全大局应暂时牺牲局部利益等，还是从全局和局部相结合和兼顾的要求出发的。因为以暂时的、局部的损失换来了全局的整体的利益的巩固和发展。这样，巩固和发展了的全局就有可能帮助受损失的局部更快地恢复和发展。如果用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来破坏整体利益，整体受了损失，最后也必然影响局部的利益。正如胡耀邦同志所指出的："如果国家的重点建设得不到保证，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上不去，国民经济的全局活不了，各个局部的发展就必然受到很大限制，即使一时一地有某些发展，也难以实现供产销平衡，因而不能持久。我们必须牢固地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毛泽东同志认为全局和局部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如，一个省，对全国来说，它是局部；而对全省的各地、县来说，它又是一个全局。另外，还有一些局部是带有全局性的，它对全局具有决定意义。对这样的局部，"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① 因此从全局着眼来抓局部，是指导全局工作的同志具有战略眼光和高度的领导艺术的重要表现，也是全局和局部相结合的重要问题。

再如务虚和务实相结合，也是毛泽东同志倡导多年的科学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96页。

法。“实”是指客观事物、实际情况、实际工作。“虚”是指思想、理论、方针、计划等。务实就是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进行实际工作，搞经济建设等等。务虚就是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开展理论研究，制定方针政策等等。务实和务虚相结合，既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要求，又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要求。虚和实互相依存，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实是虚的基础，虚是实的概括和总结；虚依赖于实又对实起指导作用。如果光务虚不务实，只讲思想理论问题，不去实践，不解决实际问题，不发展生产，不讲究经济效益，这样的务虚就失去基础，缺少动力，成为空头政治或空洞的理论，它对实是无法起指导和促进作用的，结果虚、实都务不好。反过来，如果光务实不务虚，务实就会失去科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成为盲目的鲁莽汉，结果同样是实虚都务不好。因此，务虚与务实必须相结合。当然，虚和实既有矛盾，又有差别，在实际贯彻中，不同时期，不同单位，其着重点会有不同，这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但是使两者恰当地有节奏地结合起来，是搞好革命事业必须实行的科学方法。

抓中心和“弹钢琴”相结合的方法，是建立在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理论、重点论和两点论相结合的辩证法原理基础上的科学方法。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解决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决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①后来又说：要“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党委要抓

① 《毛泽东选集》第856页。

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①这就是要求既要抓紧中心工作，突出重点，同时又要照顾其他工作，各方面有秩序有节奏地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既要防止仅抓中心，忽视放松其他次要工作，“以纲代目”，用重点论否定两点论的片面性；又要避免在许多工作任务面前找不到要领，抓不住中心、关键，如坠入茫茫烟海，陷入忙忙碌碌无所作为的事务主义泥坑。我们党经历了十年内乱之后，积累的问题非常之多，应兴应革的事项头绪纷繁，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秩序地进行工作，逐步解决各种问题，取得重大胜利呢？其重要的经验，就是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基本上也是采取这种抓住中心环节以带动其他的方法。”可见，毛泽东同志关于抓中心和“弹钢琴”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五、调查研究的方法

调查研究是一切革命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是进行任何一项工作的第一步。是了解情况的唯一和基本的方法。这个科学的工作方法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的。人的认识，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脑子里固有的，而是人们通过社会实践、接触客观事物才能发生，并经过反复实践，积累大量的感性认识，再经人们科学抽象才能形成的，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有可能自觉地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

毛泽东同志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十分重视社会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当时最杰出的代表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身体力行作出典范，并且反复地向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332页。

党说明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提出调查研究是增长知识、增长才干、解决问题、克服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好办法。抗日战争时期，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党中央专门作出全党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在以后的革命进程中，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毛泽东同志总是号召全党要开展调查研究。

在毛泽东同志的大力倡导下，调查研究早已成为我们党的干部改进作风和方法的基本途径，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凡是调查研究之风得到发扬的时期，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较正确，党的事业就发展；反之，党的事业就受到挫折或损失。因此调查研究这一种科学方法的重大意义是人们所不难理解的。我们认为，要搞好调查研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研究不能一劳永逸，而是需要不断地反复进行的。因为客观事物不断地在发展，情况不断地在变化。胡耀邦同志说：“要把中国这样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这个事业的许多课题，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和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各个领域的实际中去，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了解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创造新理论，解决新问题，才能不断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飞跃发展的今天，知识老化加快了，更要求我们不断地进行各方面的调查研究，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变化了的情况。

第二，调查研究需要占有大量的、丰富的，确实的材料，尤其是第一手的材料和确切的数据，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这就要求调查者，要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反面的、批评的意见。需要的是谦虚的态度、艰苦的精神、耐心细致的作

风。要深入到工作、生产、生活的第一线，特别是要到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场所、艰苦的地方和老大难单位去。而那些只喜欢赞扬，听不得不同意见和批评的人，是难得真情的；那些只到小汽车能到的地方，只会走马观花，不肯和不敢在基层多住几天的人，是难有真知灼见的。

第三，调查研究占有丰富材料之后，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就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因此，需要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学习各方面的先进经验、现代科学知识，学会使用现代化的研究工具，等等。对那些不愿意学习的人来说，即使有大量确实的材料摆在面前了，也难以作出科学的结论。

第四，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要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向实践学习，从中增长知识，求得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要求调查的同志切忌带有框框，更不能搞形式，走过场，作样子。否则只会败坏调查研究的声誉。这样的调查搞得越多，欺骗性越强，危害性越大，是必须坚决制止的。

总之，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作方法的思想，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本文只涉及到其中的一部分。由于这些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总结起来，并经过实践加以证实了的，因此，它们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对我们今天的“四化”建设仍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翁 世 盛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它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光辉运用和发展，构成了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工作的重点，规定了总政策，成为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能动性的强大理论武器。在十年内乱中，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遭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粗暴歪曲，被弄得面目全非。当前，在全国万众一心进行现代化建设中，认真阐明和学好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提出的客观依据和理论基础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在一九五七年初提出来的。这时正是我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的时刻。一九五六年，我国顺利地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私有

制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除了剥削的经济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此，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这时，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特别是如何认识它的矛盾，如何部署政治生活和政治工作，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建设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然而，由于人们对人民内部矛盾认识不足，处理不当，出现了不少问题，在其它因素影响下，甚至出现了个别人闹事的现象。这就更使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尖锐起来。

可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足够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分析过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如劳动者由于分配中“资产阶级权利”而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等。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分析过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之间、工人内部、劳动群众和官僚主义等矛盾。他强调：“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会消灭，矛盾还会存在。”①斯大林十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统一，认为实现合作化之后，“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构成苏联社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在友爱合作的基础上生活和工作的”，认定“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②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尽管他在农业集体化之前曾提出区分“结合外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之间的矛盾）”和“结合内部的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的问题，但是，他在苏联进入社会主义后并没有进一步发展结合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

② 《列宁主义问题》第601、688页。

内部的矛盾的思想，相反在实践上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在理论上突出地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提供成熟的经验。这也成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五十年代曾经动荡不安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并抓住了这个重要问题，认真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对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来的政治生活的经验，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并解决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种种矛盾和关系，如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是非关系等。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正式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①同年二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演，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系统理论，确定了新时期政治生活的重点和主题，规定了处理各种问题的总政策，为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首先，毛泽东同志深刻地阐明了为什么要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理论上论证了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揭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指明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正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1、357页。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

第一，毛泽东同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论证了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指导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就要揭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析它们的斗争形式，探索其解决方法。可是，有些人却不愿意正视社会主义的矛盾，以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就是否认它的优越性，把它同旧社会等量齐观，认为只有团结、统一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① 社会主义的团结统一决不排斥矛盾的存在，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只会在矛盾面前陷于被动，束手无策，损害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说：尽管对于对立统一规律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3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因此，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正视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促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和发展。

第二，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运动，揭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

在分析社会及其矛盾时，马克思主义一贯首先揭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以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并由此揭示作为它们表现的阶级矛盾。毛泽东同志坚持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思想，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并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他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① 在民主革命时期，旧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生产力处于尖锐的对抗之中，表现为激烈的阶级斗争。不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不消灭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所有制，就根本谈不上解放生产力。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所有制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矛盾，以及同人民民主专政的矛盾则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改造和反改造的阶级斗争。只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才解决了这个矛盾。此后，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总的来说是相互适应的，但也有不相适应即相矛盾的一面。不过，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不断克服这些不相适应的方面，从而得到巩固和发展。这些不相适应的方面，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因此，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的解决不仅不损害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使社会主义经济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制度和政治制度日趋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事业日益迅速前进。

第三，毛泽东同志还深刻地指出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上升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和重点。

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由于阶级敌人的残酷镇压和反扑，阶级斗争采取了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形式。这时人民内部矛盾固然存在，但是只处于从属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所以被不少人感到是一个新问题，“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不象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① 随着社会主义对私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人民民主专政的不断巩固，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②。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时社会矛盾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毛泽东同志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而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视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

此外，毛泽东同志还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要求，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③ 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7页。

的目的。他强调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①

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对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它的根源和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目的，都作了深刻的论证，这就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出了新的贡献。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

正确区分敌我，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很早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时，毛泽东同志首先科学地分析了人民和敌人这两个对立的范畴及其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中的含义。他指出，人民这个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时代的区别和革命任务的相异，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人民的范围。这是毛泽东同志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7、375页。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所作出的结论，这一思想为制定革命战略和方针奠定了基础，也提供了区别打击对象和团结对象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同志也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和确定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敌我范围问题，明确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①

这个定义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属于人民范畴的有广大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以及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其中包括原来属于剥削阶级但已接受改造而转化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广大爱国华侨等。而属于敌人的是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其中包括没有肃清的反革命分子、国外反动势力派遣的敌特分子、新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以及进行贪污盗窃、投机诈骗等新生剥削分子，等等。对于反革命分子，毛泽东同志有个总的估计："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②既要看到还有反革命，一定要提高警惕，又要看到反革命确实不多了，不可估计得过于严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喧嚷遍地都是反革命，这是根本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它首先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如"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类。当时由于定息的存在，第二类是"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8页。

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此外还有第三类，即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①，等等。这些矛盾所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定息的存在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是重要的方面，还有不同经济成分之间不协调，积累和消费安排不当，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的影响，认识水平的不同而造成的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以及思想方法甚至爱好情趣不同、地位不同等因素。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因此认真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种表现和原因也就成为重要的理论课题。

毛泽东同志认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必须严加区分。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在敌对阶级之间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则不然。毛泽东同志指出：“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②因此，它们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种种矛盾，不论在经济利益、政治倾向、思想认识上多么突出，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是一致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始终是他们共同的要求。毛泽东同志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的是是非问题，而敌我矛盾解决的是敌我问题。虽然敌我之间也有是非问题，但这是和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即通常所说的大是大非问题。显然，如果混淆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将出现路线上、战略上的错误。

如何认识建国初期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有关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根据我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365、365页。

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它们在性质上有对抗的一面，又有非对抗的一面。在民主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种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本来是对抗性的，但在我国条件下，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条件则是我们的政策得当和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我们的政策。不然，这个矛盾就会变为敌我矛盾。事实上，在一九五六年，资产阶级接受了社会主义对其私有制的改造，他们和工人阶级矛盾的对抗性的一面已迅速向非对抗性方面转化了。随着定息的结束，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也就不复存在了。

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间的矛盾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关于人民内部存在一定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教导我们既不能忽视阶级斗争的存在，又必须在阶级斗争现象中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决不可把一切阶级斗争现象都视为敌我矛盾，也不可由于问题出于人民内部而否认其可能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国内外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经验总结，也是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如何认识思想领域中不同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一个重要问题。资产阶级的和其它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其残余，将在我国长期存在，因此，思想领域中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也将长期存在。关于思想斗争的性质，毛泽东同志区别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分子，他们的敌对思想也是敌我矛盾；另一种情况是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包括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都属人民内部矛盾。他强调："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

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①。为了辨别正确和错误，香花和毒草，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有名的政治上的六条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的某个思想、作品、言论犯了错误，并不说明他本人的矛盾性质有了变化。只要不是明显地破坏社会主义事业，他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同志还认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它们之间也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抗性矛盾的一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就是例证。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②因此，我们要提高警觉，做好工作，防止人民内部矛盾发生对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则要积极创造条件，制定正确的适当的政策，争取变敌我的对抗性矛盾为非对抗性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动员最广大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至为重要，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严重错误就在于严重混淆了敌我，混淆了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文化大革命”中所打倒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0页。

“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也多是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人民内部的一员。至于广大群众中的一般认识问题，也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然而，“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极端扩大化，冤假错案遍及全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疯狂残害革命力量，终于造成了一场内乱，破坏了人民的团结，严重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给党和国家带来了灾难。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是要永远铭记，引以为戒的，

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基础上，还必须对它们分别作出正确的处理，才能在不断解决矛盾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对待敌我矛盾，应当采用专政的方法来处理。当时，毛泽东同志认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首先就是用来“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① 对于那些贪污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都必须实行专政。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接受改造，成为新人。

现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社会已经不存在，但是还有形形色色的敌对分子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着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我国现阶段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人民同这些敌对分子的斗争。对这些敌对分子实行专政，是当前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6页。

怎样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呢？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深刻地阐明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思想、总方针和具体的方针、政策。

首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什么叫做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①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如实认识客观的情况和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是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同时掌握客观发展的规律，按客观的需要和可能来解决矛盾。群众路线，就是相信广大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要相信群众是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的，也是能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的，因而坚决依靠群众来解决矛盾，使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路线还包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和工作方法，研究群众反映的情况，听取群众的意见，集中群众的意志，从而确定解决矛盾的方案，带领群众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其次，毛泽东同志确定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即用民主的方法处理问题，解决矛盾，对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尤其需要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人民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主人，是对敌专政的行使者。在人民内部决不能实行专政制度，而必须实行民主制度。人民内部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这同对敌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民主专制制度中，用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决不是无政府状态。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都是高度统一的。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用社会主义纪律来约束自己。毛泽东同志强调必须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用强制的、压服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4页。

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同时，他也指出，为了保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以利于社会生活，领导机关必须发布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不然，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说服教育和适当的行政命令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行政命令在一定条件下是说服教育的必要的补充，同时，它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才能得到良好地实施。

再次，毛泽东同志就如何在不同领域中具体贯彻民主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表现了运用辩证法的杰出才能。第一，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和政策。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般公式。具体一点说，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首先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成功实践的总结。是在克服“左”倾教条主义所采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中形成的。它是经历了长期历史的检验而被证明为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同志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统一和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矛盾的思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并以达到更紧密的团结为目的，因为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又是解决矛盾的基础，解决矛盾的目的正在于加强团结促进建设。如果不是从团结愿望出发，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一种斗争方式。先进和落后、不同意见、不同选择之间都存在斗争。人民内部的斗争必须是和风细雨的，充分说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把批评、自我批评同残酷斗争混为一谈，是十分错误的。

第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认为，我国的民主党派作为民族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在抗日斗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在社会主义时期，仍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调动它们的积极性，发表意见，对党和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都是有利的，民主党派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这就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不仅需要听取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的意见，而且也需要听取其他各方面的意见，接受他们的监督，这样更利于联系群众，开展工作。共产党既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也对他们实行监督。“互相监督”的政治基础就是政治上的六条标准。因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积极的方针，有利于解决党和非党的矛盾，有利于各民主党派及其群众的学习提高和发挥作用，也有利于党的发展，加强党的领导，加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第三，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十分重要的方针。它的提出是以承认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各种矛盾为基础，而以迅速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为目的，在科学、文化、艺术等不同方面，在思想上是存在各种矛盾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应该提倡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科学、艺术上的是非，应通过科学、艺术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科学和艺术的实践去解决。用行政的力量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只会损害科学、艺术的发展。这个重要方针是对科学、艺术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也是指导科学、艺术发展历史经验的总结。正确的东西，真善美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同假恶丑的东西作斗争中发展的。而且正确的东西往往一开始并得不到公认，相反被误认为是错误。这种情况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

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①所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符合辩证法的促使社会主义科学文艺迅速发展的方针。

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否允许批评马克思主义呢？这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对此作出了科学的回答。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从来就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今后也将在斗争中发展。因此，非马克思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个客观事实，不存在允许不允许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只会在批评中，在斗争的风雨中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所以，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方针。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各种错误思想以至毒草，决不是漠不关心、不闻不问的，相反的是需要进行必要的斗争，战而胜之。问题在于如何进行斗争最为有效。不让错误思想表现是不可能的，用简单粗暴的压制方法也并不能真正战胜它们。只有让它们表现，同时展开有效的说理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②所以，百家争鸣决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而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方针。它最有利于真理战胜错误，香花战胜毒草，马克思主义战胜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理解和贯彻这个方针中，不论以为它将导致毒草泛滥而拒绝执行，或是在错误和毒草面前放弃斗争，都是错误的。

---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2页。

第四，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人民内部在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是大量存在的。我们国家在迅速发展中，同时又有困难。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确定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要求一切从我国全体人民出发，照顾各民族、阶级、阶层、部分，使矛盾得到妥善的解决。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上也存在着矛盾，如积累和消费的安排，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自主的关系，集体管理费用和个人收入的确定等都有矛盾。这就需要兼顾三者的利益，使广大人民随着生产的发展能逐步改善生活，积累保持一定的科学的比例，管理费用力求节约等。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①

此外，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处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领导和群众的矛盾等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它们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理论武器。然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思想在长时期中没有得到全面的、准确的宣传和贯彻。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初期，就出现了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点，这已经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原意有所背离。后来，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升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也日益成为阶级斗争思想的一个部分，这就基本上违背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因为它正是在强调阶级斗争不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最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

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显然是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歪曲和嘲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才得到认真的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停止了使用，大量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各项政策如干部政策、民族政策、统战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都得到了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了实际的保证，全国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贯彻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在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总纲中明确强调“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它提到了纲领的高度。今后，我们要认真研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种问题，总结经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夺取新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

陈 金 振

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思想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使它形成完整的理论，并且把它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

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社会革命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的。而我们要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就要研究社会的内部矛盾。马克思首先取得了这项研究的“总的结果”，这就是一八五九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作的简要表述。马克思这样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历史进程，找到了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真正动因，指出由社会内部固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发展，推动社会发展引起社会革命。这是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对社会基本矛盾思想作经典的论述。它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列宁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这个理论。列宁批驳了“那种把社会看作可按长官的意志……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②，指出必须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③。可见，他十分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中的作用。列宁也分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总的来说，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

毛泽东同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九三七年，他在《矛盾论》中批判了外因论，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①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具体分析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路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在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之后，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概念。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一起概括为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思想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概念，更全面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首先是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它推动着生产方式的发展；其次是指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同社会的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矛盾。在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的、决定的因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也是重要的和不可忽视的。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解决。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如果不首先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就不能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就不能解放生产力。可见，把这两对矛盾概括为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科学概念，它不仅能更好地反映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77页。

这两对矛盾的辩证关系，而且能更正确地反映社会历史发展的全貌。

为什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呢？首先，这两对矛盾贯串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各个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这两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①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②这两对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其次，这两对矛盾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因素，是社会存在（物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精神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展开，它们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把握了这两对矛盾，也就基本把握了社会的全貌。第三，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也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正由于这两对矛盾的运动，才形成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过渡的一般过程。

毛泽东同志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不是把两者并列，把两者地位和作用等同起来。他早在《矛盾论》中对这个问题就说得非常清楚：“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8—319页。

命。”①由此可见，两对社会基本矛盾，虽然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但是，两者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等同。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基本的，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从属的，是由前者派生的。所以，我们决不能把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并列，更不能把后者置于前者之上，那样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如果那样去指导工作，一定会造成严重错误和损失。

把生产力状况作为认识社会的基础和制定、检验方针政策的最后根据

毛泽东同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认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后的决定的力量，而且以这个思想指导革命斗争，把它具体化了。早从民主革命时期开始，毛泽东同志就把认清社会生产力状况作为认识社会的基础和制定、检验方针政策的最后根据。

首先，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问题，即要解决认清敌我友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就是从分析社会各阶级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入手的。他确定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为革命的对象，就是因为“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确定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就是根据他们“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确定广大贫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军，就是由于他们与落后的生产力结合在一起，不代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不能充当革命领导者，但他们人数众多，加上深受反动统治的压迫、剥削，因此他们富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蕴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而且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可

① 《毛泽东选集》第292页。

作为革命的同盟军。在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时，毛泽东同志是严格地从分析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的。他强调说："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①

第二，他制定"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战略方针，也是以中国生产力落后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条件为根据的。

第三，他制定我党的经济政策，同样是从我国生产力状况出发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指出，全国大约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

第四，他强调指出，检验方针、政策的好坏，必须以生产力发展状况作为最后的根据。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

建国以后，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又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③在这之后，毛泽东同志还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他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150、9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7页。

算充分巩固。”①可是，他后来没有坚持自己这个正确的思想，又重新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又把注意力转移到抓阶级斗争、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上去了，犯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又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没有得到比较快的发展。这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坚决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们党努力恢复、坚持和发展科学的毛泽东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三中全会以后，巨大变化的事实雄辩地说明，我们党和国家已经取得了拨乱反正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几年来，工农业生产已有较快的发展。

党的十二大，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看作是社会主义的特征。这反映了我们党能够自觉地把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紧密联系起来的新的认识高度。大量事实说明，现在我们党的成熟程度，党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规律的程度，都已超过了建国以来的任何历史时期。

提出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原理

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他们根据当时的历史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2页。

条件，深刻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着重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方式决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本思想，这是必要的。因为历史唯心主义长期统治着社会历史的思想，他们不得不着重阐明被历史唯心主义所否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马克思、恩格斯也论述过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问题。如马克思说："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①他还说过，"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指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引者注），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②恩格斯在驳斥论敌攻击马克思的学说是"经济决定论"时，在许多文章和书信中论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恩格斯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③

列宁在许多著作中也论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面临着这样的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列宁说："诸如此类的矛盾在实践上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靠这种循环的中断，群众情绪的转变，个别集团的英勇首创精神来解决的，而首创精神在这种转变中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①

斯大林在许多论述中也肯定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如斯大林说：“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②。他还说过：“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③

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原理。他在《矛盾论》一书中说，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④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是在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就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说的。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同前面所引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论述对照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生产关系对生产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5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85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0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00页。

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继承和发展，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贡献。

为了正确地理解和掌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原理，我们认为必须认识两种意义、两种范围的“决定作用”。

第一种意义：在谁是本原的、第一性的意义上，生产力、经济基础永远是本原的、第一性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永远是派生的、第二性的。这是绝对的、始终一贯的，不能转化的。这里的“决定”一词，正如列宁所讲的在谁是本原的，谁是派生的范围之内来使用的。也就是在这个范围、这个意义上，划分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

第二种意义：在矛盾的地位和作用中，即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中，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导方面，谁是次要方面、从属方面的意义上，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导方面，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可以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导方面，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是属于反作用，但它达到了起主要作用的程度，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决定性的反作用”。这里所讲的“决定”一词，在谁是本原的，谁是派生的范围之外来使用的，这就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解决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

在《矛盾论》中，“一定条件”是指这样的情况：“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

济基础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这就是说“一定条件”是指转变的关节点。从历史上看，这样的情况又分为两种。（一）由于反动政权的统治，生产关系严重地落后于生产力，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推翻反动政权，变更生产关系，就成了加快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以前的人类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二）由于“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水平和要求，同生产力严重不适应，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这时，纠正“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就成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两种情况其性质根本不同，前者要靠革命才能改变，而后者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整即可解决。

我国建国三十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原理。当推翻了反动统治，改变了旧中国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有了迅速的发展；当发生了“左”倾指导思想错误，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生产力发展就遭到了严重挫折或破坏；当纠正了“左”倾指导思想错误，调整了生产关系，使它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生产力又获得了迅速发展。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经验都使我们深刻体会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个原理是正确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鼓吹“上层建筑决定论”，以强调反作用为借口，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推向极端，完全脱离或不顾生产力状况，随心所欲地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所谓“革命”或“变革”。他们把“一定条件下”夸大为“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从而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上都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种根本否认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荒谬理论，是历史唯心主义"权力意志决定论"的再版，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的原理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并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学说，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贡献。大家知道，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论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曾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 列宁曾经提出"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② 他还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存在两种经济结构的特点，以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逝世过早，因此，他们都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具体分析。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但由于理论上不承认苏联在农业集体化后还存在矛盾，所以，他长期地片面地认为"生产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②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

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①]，没有矛盾了。他还认为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也没有矛盾。他说："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②]既然上层建筑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那么，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当然也就没有矛盾了。直至他逝世的前一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存在，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③]斯大林的这种观点，对当时的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

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到底还有没有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也被历史地提出来。毛泽东同志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也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于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科学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动力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学说。简要地说，它有三个方面。

---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9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501—50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6页。

一、深刻地批判了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彻底地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中去

毛泽东同志坚持唯物辩证法，强调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他写道："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① 并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矛盾"的，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天真想法。"毛泽东同志认为，看不到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是形而上学观点，并指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为了克服形而上学，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号召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学习辩证法，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毛泽东同志坚决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② "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③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动力的论述，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典范。他运用彻底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的唯物辩证法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原理的普遍意义，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二、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和特点

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①

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是基本上适应的。这主要表现在：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由分离变为结合，全体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实现了为自己劳动的权利，从而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提高。公有制的建立，还使整个国民经济有可能根据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统一安排，合理地使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它铲除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起同志式的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并实现了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使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管理，既有集中统一的领导，也便于发挥各个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除了相适应的一面外，还有相矛盾的一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新事物，不可避免地在自身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因为它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还会带有某些旧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前进，由于人们经验不足，如指导思想上有了错误，难免发生工作上的失误，使生产力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形式和某些环节，也会由原来的适合变为不适合，需要加以调整和改革。

毛泽东同志指出："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①。

我国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基本适应的。这表现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强有力工具，它还担负着对外防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和颠覆，对内镇压敌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任务；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正确领导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保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除了相适应的一面之外，还有相矛盾的一面。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因而某些环节上的不完善就会与经济基础的发展要求相矛盾。如，民主集中制、法制不够健全，规章制度不够完善，国家机构臃肿，工作效率不高等等，就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生矛盾，影响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第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原来与它相适应的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4页。

层建筑也会发生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经济基础虽然是相对稳定的，但也会发生量的变化和部分质变，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能立即反映这些变化。因此，如果不经常注意调整、改革上层建筑中那些因为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为不相适应的部分，就会与生产力发生矛盾。

第三，由于社会主义脱胎于旧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存在着作为旧上层建筑残余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小生产的传统观念，它们必然会对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发生侵蚀和影响，因而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生矛盾；由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腐蚀，还会出现新的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

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由于前两种情况而引起的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完全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第三种情况又分为两类，广大人民与敌视、破坏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这是小量的；在人民内部由于受到某些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意识的影响或某些旧传统观念、旧习惯的束缚而造成的矛盾，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是大量的。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非对抗性的矛盾与对抗性的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并在一定条件下会互相转化。所以，情况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虽然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但是其中相适应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相矛盾是次要的、非基本的方面，并且也不是表现在根本制度方面。矛盾经常产生，又被不断克服，这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相比，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

这一方面可以概括为三点来说明：第一，矛盾的性质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并不象旧社会那样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这是因为广大工农劳动者既是首要的劳动力，又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上层建筑又是保护劳动人民的。在劳动者内部，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虽然也有一些矛盾，但都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并不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

第二，矛盾的表现不同。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属于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矛盾，所以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社会表现。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也存在少量的敌我矛盾，还存在阶级斗争，但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本身的直接表现，一般地说，它仍是旧社会基本矛盾的社会表现的残余。

第三，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它不象旧社会的矛盾那样，必须经过推翻整个制度的革命才能解决，而是完全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整、改革，不断得到解决。这是因为那些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发展的，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某些具体制度或制度中的某些环节不完善，以及旧社会的残余造成的。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优越性并不是说它没有矛盾了，而是说它的矛盾与旧社会根本不同，因而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不断解决中得到巩固和发展的。

总之，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学说，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它已成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理论

周勇胜　洪成得

阶级斗争问题在毛泽东同志一生的理论和实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把接受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为他自己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半个多世纪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从事革命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同志晚年又恰好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可以说，毛泽东同志一生的功过都是同阶级斗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理论，科学地分析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如实地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

毛泽东同志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他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各种矛盾极其错综复杂的国度里，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

法，科学地解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找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和正确的革命道路。

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既不同于西欧各国，也不同于俄国，无论哪一部共产主义的书本里都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也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解决的。毛泽东同志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就立即把它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从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他坚决批判那种企图躺在马克思主义本本上吃现成饭和光靠主观冥思苦想的错误态度，强调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①，“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知识。”②而毛泽东同志自己则身体力行，十分注意作社会调查，把调查研究贯彻于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成为全党调查研究的模范。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制定的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上面。第一，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各阶级的经济分析，认为各阶级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决定着它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是区分敌我友的根本依据。在分析各阶级的经济情况时，他坚持了列宁关于划分阶级的经济标准，又把这个标准大大具体化了。比如对农村阶级的分析，不仅考察了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

---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747页。

（土地、耕牛、农具、资金的有无、多少），而且考察了在劳动组织中的作用（劳动、不劳动、全劳动、半劳动、附带劳动），不仅考察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且考察了剥削量、出卖劳动力、半出卖劳动力与不出卖劳动力以及实际生活水平等多种情况，从而具体地划分了剥削阶级、被剥削阶级、中间阶级，并在各阶级中区分出若干不同阶层，由此引出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的动力（包括依靠对象、团结对象、争取对象）和革命的对象，为党制定在农村土地革命的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同志不仅分析了各阶级的经济地位，而且还全面地分析了它们之间力量的对比，指出了反革命营垒力量之强大和它们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据此引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党领导的武装的农民战争，革命的道路是不同于俄国的首先从城市武装起义进而夺取政权，而是通过在农村实行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革命力量的长期积累，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结论。

第二，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总是通观全局，考察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及其相互影响，考察了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和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具体地、历史地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各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例如，毛泽东同志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条件下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殊的国际国内关系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提出买办资产阶级是完全依赖于国际帝国主义而生存和发展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人民的走狗，是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反动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一个带有两面性的阶级，

虽然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又有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一面。因而民族资产阶级既可以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又不能充当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科学的分析，为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以及为制定我们党在各个时期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第三，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从运动中、从历史的发展中，特别是革命的转折关头分析和把握主要矛盾的转化以及由此规定和影响的整个阶级关系的变化，并据此决定党的政策、策略的变化。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说来，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侵略中国的不是只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而是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买办资产阶级分属于各个不同的帝国主义集团，他们之间又存在着经济利益的矛盾。封建地主阶级整个说来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社会基础，但他们之间利益也不完全一致。在不同的革命时期，主要矛盾不同，受主要矛盾规定和影响的其它矛盾也会发生变化，各个阶级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当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那些属于其它帝国主义集团的买办资产阶级和那部分受损害的地主阶级也会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正是基于这种变化，及时地调整党的策略，成功地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的阶级斗争又上升为主要矛盾，斗争的焦点“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①。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这种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制定了以革命的两手去对付蒋介石的反革命两手的策略，当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内战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坚决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武装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28页。

斗争，彻底地摧毁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运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工具，在剥夺了原来属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银行等之后，又采取了赎买的方式，和平变革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消灭了资产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并把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成员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逐步消灭了这个阶级；同时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有制，铲除了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在各条战线上开展了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并继续为最终造成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产生创造条件。在这个伟大的实践中，毛泽东同志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这里只着重分析和说明阶级斗争与两类矛盾学说的关系问题。

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是直接从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的科学分析中提出来的。我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国际斗争也面临着一种新的形势。毛泽东同志立即向全党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①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了我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2页。

的阶级状况和社会矛盾，明确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社会矛盾。敌我矛盾是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则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同志指出：“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①毛泽东同志这个论断是对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新特点的科学概括。毛泽东同志把人民、敌人看成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②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解释“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时，不用“阶级”，而用“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如实地反映了我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正是根据这一变化，他明确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③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时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已经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它与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有着根本的区别。

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中国革命看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在认真研究国内的实际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十分注意研究国际的实际阶级斗争。在每个重要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总是纵观全局，密切注意国际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世界范围内各种经济政治力量作出正确的估量和分析，提出了一系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36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5页。

列著名论断，为建立党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同样是毛泽东同志阶级斗争理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①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国际斗争的丰富经验，提出了革命人民和反动派所遵循的两种逻辑。他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②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当前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客观现实作了科学概括，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重要理论。他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同志创立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的科学总结，是他以前关于中间地带理论③、关于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理论④ 的进一步发展。这个理论指明了当前国际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明确了谁是主要的革命力量，谁是主要的敌人，谁是可以联合的中间力量，为国际无产阶级建立最广泛的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有力地推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375—1376页。
③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089页。
④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1页。

革命事业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蓬勃发展。毛泽东同志的光辉业绩是不可磨灭的。

二

无庸讳言，毛泽东同志晚年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确实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失误。这就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并且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剥削阶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已经被消灭，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的情况下，仍然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资产阶级还存在并将长期地继续存在，把社会上许多已不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问题统统看成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党内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分歧统统都当成社会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从而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继续搞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还说今后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所有这一切，集中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阶级斗争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长期性的全局性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决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具有特定含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了全面地、从历史的发展中看问题的原则，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和国家发展中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又指出了他晚年所犯的

严重错误，并对他犯错误的原因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决议》还郑重指出，必须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以他为代表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今后仍将长期地指导我们的行动，是我们党的不可动摇的指导思想。这一切无疑都是完全正确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处在实现消灭阶级的过程中。当然，阶级的消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会有许多阶段，例如，从剥削阶级的政治制度被推翻到剥削阶级的经济制度及一切私有制度（即产生阶级的经济基础）被消灭，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到剥削阶级分子最终被改造和一切剥削行为被消灭，最后到一切阶级差别的经济基础和一切阶级差别包括阶级意识最终被消灭，使资产阶级（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这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总而言之，社会主义社会是一切阶级处于消灭过程中的社会，虽然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还会有阶级斗争的存在，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阶级社会，并且自从剥削阶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被消灭、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已经从变革旧的经济政治制度转变为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从解放生产力转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我国，一九五六年就是这种转变的时刻。毛泽东同志过去曾经讲过这种转变的必要性，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还说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向地球开战，是技术革命；但他后来又否认了这些适应社会主义新阶段的正确主张，把前一个发展阶段的一套理论、口号和方法又搬到社会主义新阶段来，因而犯了错误。

造成毛泽东同志晚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失误的重要原因之

一，是由于他的理论和实践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阐明了自己的阶级斗争学说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的根本区别，强调了他所作的三点新贡献："（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毛泽东同志当然不会不熟悉马克思这封通信，但是在他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上，他的的确确是逐步偏离了这封通信的基本思想的。这突出表现在这几个问题上：

第一，阶级的存在问题。马克思强调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列宁进一步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②马克思主义当然认为，在阶级产生之后，阶级不仅限于经济范畴，也包括由它的经济派生出来的政治范畴和思想范畴，要最终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当然也不仅要消灭一切产生阶级的生产关系，同时也包括要消灭一切由阶级存在而产生出来的社会关系和思想关系。但是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阶级是从生产中即从经济中产生出来的，阶级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划分阶级只能以它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作为唯一的标准，当一个阶级的经济制度被摧毁之后，就不能说这个阶级还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了。长期以来，我们党都是坚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马克思、列宁这个基本观点来观察阶级问题的。党的“八大”指出：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除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正在消灭中；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大会正式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段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剥削阶级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这个论断是完全符合我国阶级关系的实际情况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却逐步否定了这个正确论断，对我国社会阶级状况作了另一种分析。“八大”召开一年后的一九五七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就认为“八大”“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这就在理论上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造成极大的混乱。此后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我国存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等等理论，就是这个错误的延续和发展。后来甚至把按劳分配的工资收入的差别也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把政治思想观点、小私有观念以及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都作为阶级存在的标志。这不能不是理论上的一个严重失足。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经历许多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许多发展阶段，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主要矛盾，因而也有不同的主要任务，只有依据阶级斗争进程的客观规律，才能推进这个斗争，达到消灭阶级的目的。混淆不同的发展阶段，不管是把未来阶段的任务提到现阶段来完成，或者把过去阶段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任务、斗争方法搬用于新的发展阶段，都是主观的，都只能阻碍这个进程的发展。无产阶级在推翻了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夺取了政权，废除了剥削阶级的经济制度和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阶级斗争就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因而就必须把发展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提到首位，因为这是社会主义新制度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旧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保证，是最后消灭阶级，进入无产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毛泽东同志曾经坚持过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在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多次强调要团结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亲自向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作了调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问题，力求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可是后来，由于毛泽东同志否认了剥削制度被推翻之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了这个基本事实，把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仍然看成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因而又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他甚至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存在着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继续搬用过去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旧经验和旧方法，直至最后发动了一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毛泽东同志晚年都一直关心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作了可贵的努力，但总的说来他并没有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错误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建设成了从属于阶级斗争的“目”，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也被置于脑后而不顾了。

第三，消灭阶级问题。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

阶级，使人类进入无产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它的根本任务是为无产阶级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创造条件。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共产主义者，他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目标艰苦卓绝地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是，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消灭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要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将其提高到共产主义公有制。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完善，公有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向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过渡的实现“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① 这个“物质条件”就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至高度发达，没有生产力高度发达、发展这个条件，这种过渡是不可能的，也不是历史的必然，不是“经济上的进步。”② 要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消灭旧式的分工，必须消灭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要实现这一点，也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因此，一切热心于共产主义，热心于消灭阶级的人就应该首先热心于发展生产力，这才是按照消灭阶级的客观规律办事。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否定在社会主义社会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长期存在，也不否定抓阶级斗争的必要性。但只有按照实际情况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开展必要的正确的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为生产的发展创造安定团结的环境，才能促进阶级的最终消灭，这同样是按照消灭阶级的客观规律办事所必需的。毛泽东同志晚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了发展生产对于消灭阶级的重要性，离开了一定的经济条件，企图用人为地加剧斗争的办法来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317页。

达到加速阶级消灭的目的。他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制度的变革方面，集中在人的思想变化方面；他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急于“过渡”，企图通过不停顿的“革命”和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来促使生产关系向高、公、大过渡，使剥削阶级的思想和私有观念消灭，使三大差别消灭；他甚至错误地开展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把发展生产力看成是修正主义路线。这些想法和做法，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都是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了消灭阶级的客观规律。尽管他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其结果不仅没有推进消灭阶级的客观进程，相反却阻碍了这个进程，甚至使得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分子得以利用他的错误，在某些地方、部门篡夺领导权，复辟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的挫折。

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是在研究和探索如何把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过程中，由于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设想和论断加以误解和教条化所造成的。而且他还把这种误解和由此造成的错误当作马克思主义正确的东西加以强调和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坚决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应该坚决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这丝毫不意

味着可以否定毛泽东同志前期正确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包括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说的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贡献），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否定社会主义时期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还必须继续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上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这也丝毫不意味着在剥削阶级已被消灭、阶级斗争已不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可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把它看成越来越不重要的东西。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极其丰富内容，它阐述了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是指导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实现最终消灭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在无产阶级尚未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以前，这个理论武器是万万不可弃置不用的。这也就是说，不能因为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而根本否定他过去正确的东西，不能轻率地想当然地把他以前正确的东西说成是他晚年犯错误的根源。如果那样，我们就不仅不能坚持正确的东西，也不能真正纠正错误的东西，还可能犯新的错误。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科学地总结了我国三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分析和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斗纲领。“十二大”提出的各项任务，都是为了逐步创造条件，最后向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目标前进。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一定要努力学习、贯彻“十二大”精神，树立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所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精华

沈 志 俊

毛泽东伦理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有关共产主义道德问题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它不仅在战争年代，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提高革命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今天，党的十二大已经明确地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战略目标提出来，我们重新学习毛泽东伦理思想，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伦理思想，内容丰富，而其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论述，是整个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精华，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经过千锤百炼而得以形成的一个光荣革命传统。

毛泽东同志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命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含义。其一，指在为人民、为社会尽义务和履行职责时，不是以享受某种权利或为了追求某种个人利益为前提，而是完全自觉自愿地履行自己对人民、对社会的职责和义务，并以此为光荣。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绝不满足于一般地完成任务，而是为人民多做贡献，自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在切身利益面前，不应计较个人得失，而想到的是集体和他人。忘己济人，舍己救人，这是一种崇高的道德行为。其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要求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为绝大多数

人民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或个人私利服务。这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道德的阶级实质。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基础的共产主义道德，才真正要求人们为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服务。在个人利益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或民族利益不能两全的时候，要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或民族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以至牺牲个人的生命。为公舍生，为国捐躯，为人民而死，这是道德的最高要求。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很多论述，都体现了这个共产主义道德原则。

毛泽东同志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哲学基础和现实基础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由我们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决定的，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根本点是把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出发，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新陈代谢的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任何时候，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始终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毛泽东同志把这个原理通俗地概括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既然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那么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历史发展向共产主义道德提出的客观要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共产主义事业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而把这个科学的理论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932页。

现，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命题的，则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主义道德最基本的行为规范，首先是共产党人的道德规范，进而推广为全体人民的社会公德。社会主义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对社会尽职时，既是服务者，也是被服务者；人人都对社会负有义务，同时也有从社会得到福利的权利。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服务和被服务，义务和权利是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这不仅是社会所提倡的公德，而且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核心。共产主义道德所提出的一系列行为规范，都是以为人民谋利益、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为基本出发点而贯彻始终的。

第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道德同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根本区别点。

“人民”这个概念，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民是由具有不同利益的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组成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范围；但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劳动群众都是人民的主体。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的具体历史情况，曾经对不同历史时期划分“人民”这个概念作了科学的阐述，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① 在现阶段，只有把“人民”这个概念的科学含义弄清楚了，才能正确地把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行为规范的精神实质。

一般说来，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实质上都是要求多数人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

少数人或个人利益服务。阶级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剥削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剥削阶级的利益是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剥削阶级的道德无论表现为什么样的具体形式，都不可能脱离这个基本事实，不可能离开剥削阶级利益的要求。尽管历史上有些哲学家或政治家也提出过“个人利益服从公利”、“公而无私”等等，实际上都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他们所提倡的“公”不外乎是少数人的小“公”而已，绝不是广大劳动人民这个大“公”，原因就是道德本身归根到底是具有阶级性的。

在过去的历史上，有些人可能为了君国之事，父子之义，手足之情，知己之交，师友之谊，以及为了邻里乡曲，为了父老子弟，做出不少舍己为人的好事来，甚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身家性命在所不顾，表现出了比较高的道德节操，但同无产阶级所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毕竟是有区别的。因为在私有制的社会中，人们是被划分为阶级、阶层和集团的，这就不能不给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打上了阶级的烙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①无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它不能依靠个人来解放自己，必须依靠整个阶级的团结才能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是无产阶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客观必然性及其阶级实质所在。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归结的一句话：“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995页。

第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党，除了谋求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利益。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①又说：“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②这些著名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座右铭。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谋取私利、搞特殊化的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自己的国家工作人员“追求升官发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③。列宁进一步解释说，所谓防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就是要“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④。作为一个执政的党，如何防止自己的党员、干部由社会公仆变成官僚，这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党的领导者必须严肃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群众的领导者；人民群众之所以那样拥护我们党，正是因为我们党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求解放的工具。党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处理得好，亲密无间，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处理得不好，遭到破坏，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和损失。因此，恢复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具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995—996、94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5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6页。

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以上是从无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的阶级实质和无产阶级政党本质特征上说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精华，我认为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怎样体现在毛泽东伦理思想的丰富内容之中的。

众所周知，伦理学被称为“道德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古往今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形成各种伦理思想。中国古代有孔子的“仁”，墨子的“兼爱”，孟子的“性善”，荀子的“性恶”等学说；西方有快乐论、功利论、禁欲论等。这些学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不同的作用，但它们都是离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来考察道德问题的。它们或者认为人们的道德规范是上帝规定的，是上帝的命令，或者认为道德规范是“永恒的人类本性”，因此都不能科学地阐明道德现象。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才对道德的本质予以科学的说明，第一次提出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起源的“经济基础决定论”。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观点，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并论述了两者的辩证关系，“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① 毛泽东伦理思想就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基石上的。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论述了道德同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道德的阶级性、道德的继承性、道德同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道德的评价、道德的教

① 《毛泽东选集》第300—301页。

育、人性、人道主义等等问题。尤其是作为共产主义道德核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青年运动的方向》、《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等著作中占相当突出的地位，表现了无产阶级思想的先进性，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支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精华，是一条总的指导思想，象一条红线，贯串始终。

第一，毛泽东同志基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

任何伦理思想体系中所提出的根本道德原则，不论采取怎样抽象的思维形式，总是和利益有关，在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问题的一种回答，总是一定的阶级利益的反映。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所谓“义利之辨”或“理欲之争”，就是关于调整人们之间关系，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的根本原则的争论。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中，许多人公开将“利益”作为道德的出发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就以个人利益作为道德的出发点。道德终究离不开物质利益。但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同以往的伦理学相比较，对道德与物质利益关系问题上的根本不同点有两点。其一，以往的伦理学是从个人肉体感官的生理需要出发，即把人只看作自然的人、生物学上的人，并以此来谈论利益的。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是把人看作社会的人，看作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人，是从人们的经济关系来谈论利益的；其二，以往的伦理学是以个人利益、利己主义作为根本出发点，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则以社会利益，即人民的利益、集体主义作为根本出发点，主张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统一的原则。毛泽东同志从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观点

出发，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的问题。他在一九四二年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① 从这一论述中，说明了这样两个问题。首先，指明了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功利主义是没有的，因为任何类型的道德，都是阶级利益的反映，都不能脱离实际存在着的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因而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伦理学家或思想家所提出的功利主义原则，都是为本阶级利益服务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是这个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个阶级的功利主义"。其次，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是以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是长远利益高于眼前利益，全局利益高于局部利益。毛泽东同志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这一科学概括，更明确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道德准则中个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的辩证关系，更鲜明地表现出无产阶级道德准则的革命实质。"功利主义"一般是指资产阶级的一种伦理学说，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点，是把个人利益作为社会道德的标准和人类行为的基础。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伦理学家边沁，就竭力鼓吹公共利益应该服从个人利益。企图以此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

① 《毛泽东选集》第821页。

下，私有制是合乎大多数人的利益。针对这种极端错误的理论，毛泽东同志给予有力的驳斥，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这个命题。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观点，反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的原则。也为我们从思想上划清与一切剥削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界限提供了理想武器。

第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核心。

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历来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原则和道德原则，即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是私有制的产物，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原则。资产阶级在"人类的爱"等名义下，提出一切为了个人幸福、个人利益、个人满足，认为只有个人利益才是唯一现实的，所谓公共利益、社会利益等一概都是虚构的，所以资产阶级奉行的道德原则是极端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道德原则相反，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是集体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就是一切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使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在维护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无产阶级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必须通过集体的奋斗去谋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离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集体力量，就没有无产者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解放。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① 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则正是这种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核心。哪里还有比广大人民、整个民族、整个人类再大的集体呢？全心全意为人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488页。

服务，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不是为小集团的利益服务，而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服务。而且不是三心二意，不是半心半意，而是全心全意地服务。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同时，并不否认个人的利益，而是在强调集体利益的同时，也十分注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①共产党人要取得群众的拥护，首先"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服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②在《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同志再一次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③可见毛泽东同志在强调集体利益的同时，从不抹煞个人的物质利益，而是要求辩证地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个方面的关系，调动三个方面的积极性，以争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

第三，"为人民服务"是崇高的道德标准。

我们评价一个人的行为的好坏，是看他的行为的动机，还是看他的行为的效果？这在伦理学史上是关于道德评价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之后，才使伦理学的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紧密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对伦理学的道德评价问题，即动机和效果问题作出了科学的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122、12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

论断，使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获得了明确的科学答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① 这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对人们的行为所作出的科学结论。毛泽东同志说："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讲究方法"②。"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吗？"③"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④这就是说，好心人作了坏事，必须悔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自觉地选择正确行为。所以，在进行道德评价时，毛泽东同志既反对唯心主义的"善良意志"，又反对了机械唯物论的效果论。并且特别突出强调了："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那种只"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⑤也是不好的。这里所说的大众，当然是人民大众。对人民大众有益，还是有害，这是我们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825页。

②③④ 《毛泽东选集》第830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825页。

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又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当然，这里并不意味着每一件具体工作上的错误都是道德上的问题，都是恶，而是说，社会对每个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时都必须坚持一定的阶级标准。无产阶级是以人民利益为标准的。凡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行为，就是善的，也就是道德的；反之，违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行为，就是恶的，就是不道德的。如果不以“为人民服务”这一崇高的道德作为标准，那就不能使具体工作贯串着革命责任感，“为人民服务”的善良愿望，将成为空洞的没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所以毛泽东同志讲，事前应该顾及事后的效果，事后对自己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应认真检查，就是要树立起对人民、对革命事业负责的责任感。当然对待一个人的行为的评价，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绝不能简单从事。

第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的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的道德境界。

在研究人生观和道德理想，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和道德评价时，往往牵涉到道德境界的问题。从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来看，人们在修养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从一个高度到另一个高度，即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以至达到最高的理想。人们处在每个阶段中，都以一定的道德观念作指导，并用以处理对人、对事的各种关系，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不同的觉悟水平。这个高低不同的觉悟水平，就构成了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825、997、995—996页。

所谓道德的境界。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重视道德境界的提高。并且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作为整个人类最高的道德境界，从而成为无产阶级的理想道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给吴老的一封信》、《给徐老的信》、《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著作中，从各个方面对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作了深刻的经典性的论述和规定。毛泽东同志认为，无产阶级的理想人格，应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他强调一个革命者应当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①他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他还提出要“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要“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以及“实事求是、远见卓识”等等，并把它们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道德境界要求和理想人格的特征。

除了从道德规范上提出人们的道德理想以外，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以鲁迅、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等共产主义战士为榜样，把他们看作是人们道德理想的化身。他号召大家要学习鲁迅，“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②他高度赞扬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要求“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③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道德理想的论述反映了先进阶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621、83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620页。

级的人生观和道德观。这种理想人格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大力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境界，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完全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理想人格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又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实践证明，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千千万万的人在这种道德理想的鼓舞下，为推翻"三座大山"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它对提高全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觉悟，提高全社会的伦理水平都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伦理思想远不止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在这里不过是择其要者而言之罢了。毛泽东伦理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一样，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正象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青年时代有一个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一样，毛泽东同志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青年毛泽东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如磐。毛泽东同志耳濡目染工农大众的苦难生活，立誓要实意做事，真心求学，他的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追求真理之心与日俱增。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六年，走完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世界上许多探求真理的思想家，特别是近代中国进步的思想家所走过的路程。他以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德国二元论伦理学家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作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这是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阶段。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大量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伦理思想无论是在新民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都起了重大的作用，成了革命和建设的巨大精神力量。当前我们建设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样离不开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指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心集体，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等等，是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的重要内容。这些精神都是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的，也是毛泽东伦理思想中主要的部分。所以认真学习毛泽东伦理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后　　记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总任务，也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们约请了我省部分哲学工作者，编写了这本论文集。这是我省哲学工作者团结协作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全书收入论文十七篇，是按照文章的内容分类和编排的。

本书的编辑过程是这样的：今年上半年，先由我所研究人员潘叔明等会同我所特约研究人员池超波、林可济等几位同志，进行了选题和组稿工作。在各位作者写出初稿后，九月份在我院副院长陈以一、单曙光同志的主持下，于福州召开了审稿会议。参加审稿会议的有：丘一平、池超波、沈忠俊、林仑山、林可济、陈军、姚经桃、翁世盛、商英伟等同志。根据审稿会议的决定，由池超波、林可济、姚经桃、翁世盛等同志对各篇论文又进行了若干必要的修改，最后由池超波、林可济、姚经桃进行统稿工作。在整个组稿、编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列室、政教系等单位和许多有关同志的积极支持。福建人民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和研究还十分不够，成书时间比较匆促，书中的缺点、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恳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福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